

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回忆录

ANSWER

对历史的回答

HISTORY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出版说明

《对历史的回答》是前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去世（1980年7月21日）前不久完成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作者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记述了统治伊朗达53年之久的巴列维王朝的建立、兴起、衰败、直至最后覆灭的过程。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从作者登基之前到其即位之后直至被迫出走这半个多世纪中伊朗的内政、外交、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作者还以相当的篇幅记叙了伊朗与美、苏的关系和矛盾以及他自己流亡期间的悲惨处境。本书于1980年在美国出版后，深得国际上研究伊朗问题的专家和广大读者的重视。

伊朗盛产石油，战略地位重要，长期以来是美、苏两霸激烈争夺的目标之一。巴列维国王倒台后几年来，伊朗局势的发展仍为举世瞩目。本书对了解和研究伊朗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和变化，了解这个曾经是中东最强大的“宪兵”的巴列维王朝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被霍梅尼所领导的宗教势力推翻，以及近几年来伊朗事态演变的原因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生前的政治观点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保留原书的本来面貌，我们未加删改。请读者注意鉴别和分析。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年8月

# 目 录

	页次
一. 我的流放 .....	1
二. 过去的教训 .....	29
三. 从强大到沉沦 .....	34
四. 通向印度和石油的道路 .....	38
五. 我的父亲 .....	42
六. 年轻人 .....	57
七. 摩萨台 .....	75
八. 从石油时代到原子时代 .....	91
九. 白色革命 .....	99
十. 外交政策 .....	132
十一. 不光彩的红黑同盟 .....	146
十二. 从希望到绝望 .....	182
十三. 恐怖 .....	187
十四. 结束语 .....	196

## 一、我的流放

1979年9月16日，我在墨西哥完成了《对历史的回答》这部书的第一稿，从没有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补充进去。完成这部作品的初稿如同和时间赛跑。前几个月，我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高烧、发冷和剧痛。在奎尔纳瓦卡，医生最初诊断是肝炎和疟疾，最后才确诊为我的淋巴瘤可能复发了。在伊朗我曾与它搏斗了6年而且看来它已暂时不再活动了。如果我仍留在墨西哥，那么每隔几天就得从休斯敦用飞机运来专用同位素为我治疗。由于不能最后确诊，为我治病的墨西哥、法国、美国医生催促我到美国进行全面检查。这种检查只有在休斯敦或纽约的大医院里才能进行。

我不大愿意去。自从1979年1月我离开德黑兰，华盛顿对我去美国并不热情。但是，有一点美国人讲得很清楚：一旦我的生命有危险，我可以去美国治疗并得到帮助。这些保证最后一次是美国驻巴哈马群岛大使向我重申的，当时我认为巴哈马政府是在英国的压力下拒绝延长我的旅游签证。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居住。我不是那种人，非要去一个不欢迎我的地方。但是，我有权让我的孩子们在美国受教育，我也有权享受美国医学方面的卓越成就。我在位时曾认为我与西方的联盟是建立在实力、忠诚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大概那种信任是用错了地方。

10月，由于病情太重我不能再犹豫了。我决定去纽约治疗。我的随从做了必要的准备，10月22日这一天，我穿过墨

西哥机场的跑道向等候的“海湾潮流”喷气机走去。美国驻墨西哥城的总领事等候在飞机旁准备办必要的入境文件。我注意到了他看见我时的那副惊讶神情。这不是那个他所想象的国王，那个被新闻界长期描绘的人权践踏者和人民的压迫者。十分清楚，我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手续办完以后，我那为数很少的随行人员登上飞机。我们计划在劳德代尔堡停留办入境手续，然后直飞拉瓜迪亚机场，再从那里乘车前往纽约医院。我和我的随从希望能在佛罗里达办理入境手续，从而可以避免在纽约受到新闻界的缠扰和引起安全问题。

我离开伊朗已经9个月了，这是痛苦、震惊、失望和思考的9个月。当我看到我国发生的一切，我的心都要碎了。每天都得到有关暗杀、流血、处决以及友人和无辜人民死亡报道。所有这些恐怖活动都是霍梅尼摧毁我在位37年里呕心沥血为我们民族奠定的社会结构的有计划行动。然而，从美国人权鼓吹者那里却听不到任何抗议的声音，相反，他们对我的“暴虐”统治却肆无忌惮地攻击！我想作出这样的评论是可悲的：美国、的确大部分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对国际道德采取了双重标准：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管它多么残忍和卑鄙，它都可以接受；而社会主义、温和主义和右翼政府的政策则不然。

在我流放的最初几个月中我特别感到惊讶，西方竟不能清楚地认识和理解苏联扩张主义的巨大野心。我作为克里姆林宫主子的邻居度过了我的整个成年，在40年里，我从未看到过俄国对于其政治目标有过任何动摇：不懈地为称霸世界而努力。莫斯科有时间，它可以等上50年，可以接受一、两步的后退，可以接受交易和调停；但是它决不忘记它的最终目标。我曾热衷于缓和与和解，但并非出于美国和欧洲政府

政策的那种软弱性和优柔寡断的立场。如果它们的政策不改变，3年之内，欧洲就可能“芬兰化”。西方只有从实力或者至少从均势地位出发进行谈判，缓和才有意义。80年代看来是极其危险的年代。1983年，俄国将达到它力量的最高点，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美国将衰弱到它成为世界大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最低点。

当前，实力及其在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应用已不是政治分析的流行题材。现在，一些著名的理论家都轻蔑地把国家安全看作是国际讨论的关键问题的思想说成是“装煤港”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英国海军在各大洋为其船舶争到了装煤港的时候，世界是一个安全得多的地方。甚至在核对抗的导弹时代，常规力量仍是国家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实力必须包括国外基地和坚定的外国盟友。二者我都曾相信过。1968年，英国把它的军队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之后，我就愉快地担负起保卫波斯湾的重任。为了履行我们的新责任，伊朗不得不成为第一流的、拥有自己的基地和设施，并且有能力保卫它们的军事强国。我相信，我们的美国和英国盟友会坚决支持这些努力。然而，我却多么错误地选择了我信任的对象！

在流放的最初几个月中，我确信西方国家政府会有某种打算，有某种庞大的设想或总的看法，在这个对自由世界的幸福和繁荣如此至关重要的地区，它们会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和疯狂的仇外情绪。在我离开伊朗的最初几天里，我在阿斯旺考虑过这个问题并曾同萨达特总统讨论过。但是，在流放的最初几个月里先在埃及，后在摩洛哥发生的纷乱使我没有时间作出清晰的分析。

在离开伊朗之后不久，我曾打算去美国，但是，在摩洛

哥时我开始收到与政府有关系的美国朋友和来自卡特政府内部的奇怪而又扰人心绪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并不是不友好的，但却非常谨慎：或许眼下不是你来这里的最好时机；或许你还是晚一些时候再来为好；或许我们应该等等看。大约在我离开伊朗一个月之后，信息的口气变得热情一些，他们表示，如果我实在想来，我当然可以来美国。但是，我已不太想去了。我怎么能到一个败坏我事业的地方去呢？渐渐地，我开始相信，美国恰恰在这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

这一信念在我辗转到达巴哈马群岛以后的日子里得到了证实。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这是一个短期度假的地方，而不会给萨达特总统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这样的朋友造成更大的压力。我急于走自己的路。虽然我决定离开摩洛哥去访问巴哈马是仓促的，但进展相当顺利，至少最初是如此。为了巴哈马之行，哈桑国王好心地派一架飞机供我全家使用。当我们到达拿骚国际机场时，我的新任顾问们（我的好友纳尔逊·洛克菲勒原来的同事）早已把一切安排就绪。在与巴哈马政府的代表寒暄之后，我和我全家朝着准备送我们去“天堂岛”的三架直升飞机走去。我感到轻松愉快并充满信心。我们降落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停机坪已用几个白色的大型×标志。我们度假的住地是在一个舒适的包括旅馆、网球场和游泳池的海滨别墅。主人是“国际别墅”组织的主席。三间卧室的住房远非豪华，但足够我们使用。在进行了必不可少的拍照和与等候在那里的记者们简短的交谈之后，我便进房休息了。

我们在巴哈马群岛的逗留并不轻松。我花去许多时间收听德黑兰广播电台令人沮丧的新闻。霍梅尼的革命法庭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每天都有有关我国新暴行的报道。行刑队在处

决我的朋友和同事。我的支持者的家庭遭到洗劫和抢掠，他们的银行存款遭到抢劫，汽车和私人财产被偷窃一空。几周之前处决长期担任我的首相，埃米尔·阿巴斯·胡维达使我陷入极度悲痛之中，霍梅尼的刽子手们已开始动手。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每天都对我的政府成员及其家眷进行无缘无故的折磨和污辱，这些活生生的报道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有多么野蛮描绘得淋漓尽致。

当我出现在我的住宅外边的时候，我被游客们包围了。人们是友好的。许多人要求我签名并对我和我的家人表示支持。新闻界做了各种猜测性报道，后来就谣传说我打算买下这个群岛的股份。我的随从人员一直忙于否认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传言。

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我在巴哈马的日子根本不是度假。

我在巴哈马与美国的接触极少。美国大使施瓦茨在我停留的最后几天才来看我。但是，我的随从人员却与大使馆的各种人进行了接触。通过各种渠道，我得知我的家庭任何时候在美国都是受欢迎的，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到那里进行治疗。然而，华盛顿渐渐对我去发出某些不安的信号。或许那种感情传染了巴哈马政府。那里的态度无懈可击但却是有距离的。我们的签证到期3周前，我的随从人员提出延长签证。官员们说他们将在一周内答复我们。申请提交到更高一级的官员，在签证到期前10天我们得知签证不能再延期了。我们必须要在10天之内离开巴哈马！我们没有解释，没有表示遗憾，也没有同巴哈马官员进一步商谈。

现在我对他们态度的变化有了自己的看法。当初，对他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离开仅仅是模糊地疑惑。虽然海滨娱乐场的



利润是巴哈马财政的主要依靠，但是如同在其它英国殖民地一样，英国在这块过去的领地上仍然有很大影响。长期以来，我对英国的意图和政策持怀疑态度，而且一直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这种态度。由于美国的疏远和冷漠以及英国一贯的不友好态度，巴哈马总理平德林要我离去，尽管我耗费巨资在那里逗留了10周。

在我们即将离开之前的两天，“国际别墅”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与我的一位助手马克·莫尔斯进行了接触，打听我对继续呆在巴哈马是否有兴趣。这种变化多端的两面政策，我在流放中经常遇到。在伊朗的最后几个月它曾使我陷入困境，当天我根本不知道第二天美国的政策会是怎样，它的可靠性如何。

然而，眼前的问题是下一步到哪里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确实得到了巴拿马的恳切邀请。巴拿马驻美国的前大使加布里埃·刘易斯到巴哈马来拜访过我，并邀请我去巴拿马。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我并不感兴趣。但是，我却派了我的儿子礼萨王储进行了访问。他会见了托里乔斯将军并在那里进行了短促的旅行，其中包括孔塔多拉岛，这个岛屿后来成为我居住的地方。

墨西哥在我自己选择的流放地点中名列前茅。我在位时，曾经访问过这个国家并很欣赏当地的风景，喜欢那里的人民，同时与当时的财政部长洛佩斯·波蒂略建立了友谊。于是我全力以赴地探索是否有可能在墨西哥找到一处避难所。我在美国的几位朋友给予了帮助。亨利·基辛格与洛佩斯·波蒂略总统进行了联系，包括卡特政府的官员在内的其他人也出了力。巴哈马签证期满两天前，我们接到访问墨西哥的邀请。为了安排住所助手们先行飞往那里，他们在奎尔纳瓦卡的一条不起眼的街上找到了一所住处，从那里到墨西

哥城乘车只需一个半小时。这是一所大房子，多年来没有人居住。房屋下边几百码有一条小河，座座葱翠的花园鳞次栉比，向河边倾斜，河对岸是一大片起伏的村庄伸向远方。虽然这个地方蚊虫成灾，但风景却十分秀丽。

6月10日，我们飞抵墨西哥，一列小型车队把我们从小机场护送到奎尔纳瓦卡。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为我们采取了许多必要的安全措施。不受干扰对我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我在巴哈马未能得到这种享受，在那里，我们成为众多人们感兴趣的中心，并经常受到人们的包围。那时，我的健康状况还算好，我所见到的人们是友好的，周围的气氛是轻松的。我拜会了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并且重新开始了平静的社会生活。现在，我有时间在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思考最近伊朗事件的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并根据我国发生的一切重新清理我对自由世界未来的看法。

许多朋友来看望我，他们促进了这一工作。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来看望我，对此，我很感动，十分感激他们。他们两位都是我珍视的老朋友，他们的来访表明他们不仅仅仍然关心我本人，而重要的是关心我们长期协力解决的问题。我和他们两位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且发现我们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观点仍旧一致，就象我们执政时，伊、美两国关系非常密切时期一样观点一致。

我与理查德·尼克松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53年，那时他是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他担任美国总统后，我们的关系不论是作为朋友还是盟友都得到了加强。在外交事务方面，尼克松总统对人对事有一种非凡的远见和理解。他从越南脱身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是出自理智、常识和深谋远虑。他对世界力量平衡的严谨概念毫无疑问提高了美

国的声望。

在他担任总统之前，我们曾在德黑兰讨论过许多有关地缘政治的问题，而且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一致。例如我们一致认为一国必须寻求同“天然盟友”联盟，这些盟友指的是依靠共同和长远利益保持结盟的国家。必须注意防止那些靠不住的、潜伏着麻烦的联盟。坚定可靠的盟友要比在关键时刻软下来的许多伙伴更有价值。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这种盟友，他来奎尔纳瓦卡看望我表明了他对老朋友的忠诚。

我在几种不同的情况下认识了亨利·基辛格，最初他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随后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他是一位才艺高超的政治家，对美国和国际事务有着广阔的、非凡的见解。他一贯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始终深知美国维护体面的世界和平的责任，以此服务于国家。除高超的才智外，他还有两方面的品质：能够倾听他人的意见以及极为敏锐的幽默感。遗憾的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名人身上却缺少这种品质。

我们一致同意，作为一种变通办法以欧洲共产主义代替共产党在西方接管政权的神话已经开始消失。在法国，乔治·马歇与弗朗西斯·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的伙伴关系已经有所疏远。我们对这一变化，并不感到意外。1977年底，我访问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不论在华沙还是在布拉格，我都听到忧心忡忡的共产党官员们对法国左翼联盟可能在1978年3月法国议会选举中获胜表示关心。有人告诉我，没有比这更不可取的事了。共产党人几乎没有兴趣与其他人分享权力，他们希望控制一切。不论是诸如法国的马歇、意大利的贝林格和西班牙的卡里略等主张的联盟或者是联合，他们都不满意。只有葡萄牙的库尼亚尔毫不妥协的立场才是可以接

受的。他曾差一点掌权，后来在竞选中又拒绝与人谈判。

共产党的不妥协态度在其它地方也可以看到。4万多名古巴雇佣军从安哥拉到埃塞俄比亚到处煽动战争、叛乱和共产主义，他们开始了瓜分非洲的苦难历程。非洲是一个有前途的大陆，目前西方的工业极其需要它的原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料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并越来越受到威胁。敌对的部落把自己说成是民族国家，它们把这块大陆搞得四分五裂；南部非洲已经深深地陷入冲突和种族战争之中。中国在工业方面仍然薄弱。日本不愿从她那巨大的新财富中拿出哪怕是一点点资金在自卫方面投资。东京仍然依靠美国的保护伞。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知道，那种保护伞是多么漏洞百出。

同时，伊朗正在不知不觉地陷入混乱。我曾领导跨入进步、强大和自信大门的国家处在分裂和血泊之中。一位衰弱而又狂热的老人正反复地对伊朗人民说他们是多么卑贱、痛苦和贫困。我曾煞费苦心建立在尊严和自尊基础上的妇女权利付诸东流碾成了中世纪的尘埃。我已经开始的许多工程项目无法完成而被弃之不用。毛拉们对我计划和建立的核反应堆能有什么兴趣呢？第一批建设中的两座反应堆将给伊朗的电力网增加2,500兆瓦的能力，它们座落在北部沙漠，将保证人们不受放射性废物的损害。中小学校、医院、大学、其它社会设施，以及还有我们正在兴建的工厂会怎么样呢？我曾计划把伊朗建成世界最大的化肥生产国。这一切都不过是一枕黄粱！

在我们离开墨西哥到纽约去治疗的当天夜里，这些夙愿是那样强烈地折磨着我。当我们到达佛罗里达的海湾沿岸时，天已黄昏。飞机掠过半岛降落在劳德代尔堡飞机场上——

遗憾的是没有降落在真正的劳德代尔堡机场上。我的随从人员原来安排在公务机场着陆，而我们却飞抵该城市国际机场的公务喷气机场。待命在小型机场迎接我们的官员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穿过市区来接我们。而在我们等待的时候一位美国官员走上前来询问驾驶员我们是否打算倒垃圾，是否携带了植物。他原来是一个农业检查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等待的两小时期间，王后走下飞机在附近溜达。我感到疲劳，还有些发烧，又不知道在纽约会受到怎样的接待。我离开消息在墨西哥已经泄漏出去了，墨西哥机场上有不少摄影记者。最后在佛罗里达办完手续，我们继续飞往纽约。午夜前我们到达拉瓜迪亚。飞机降落在机场偏僻的角落，远离其它飞机。那里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纽约的警察到处可见。一列小型车队停在柏油碎石路上。没有电视摄影机，真是谢天谢地。

到了纽约，我得到了宽慰，从此有了接受最好医疗的保障，到处都有人给我出主意。我们乘车出发了。起先，我打算在曼哈顿我妹妹的住所作短暂停留，与那里的人员见见面。当警方的无线电步话机报告说有一名摄影师正等候在住宅前时，我决定径直到纽约医院去。我被领进17层的两个房间，这儿的环境是熟悉的。大约30年前的1949年，我在访问杜鲁门总统期间，曾住进这家医院的这两个房间作定期的体格检查。

医疗小组以本杰明·基恩博士为首，他在墨西哥就为我作过检查并建议我来纽约。第二天上午，医疗小组为我进行了全面检查并做了一系列的化验。大约24小时之后，于10月24日，我接受了外科手术。

手术后，我发表了病情公报，在公报中，我承认我的淋

巴癌已有6年的历史，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在这之前，我隐瞒了这个情况。最近，我已经发展到周期梗阻性黄疸——其原因还不能确定。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亟待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分析。在纽约医院，我的内科医生们诊断黄疸是由于胆结石造成的。那天早上8点钟，我的胆囊和结石经手术摘除了。在我的胆道中也发现了结石，两周后施行了半手术性质的摘除。

手术两天后，我同家人一起庆祝了我60岁生日，我感到自己体力在恢复。全世界对我表露的友好情意使我感到欢欣鼓舞。我的房间装扮得如同花店一般。最后，多余的花束不得不放在另一幢楼的候诊室里，我让人把这些花束分送给医院的其他病人，希望他们也同享花儿的美丽，使他们精神愉快。电话、信件和电报潮水般地涌进医院。成千上万的信件堆集着。许多是来自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向我祝福并提出给予帮助。我记得有一人写信给我，向我提供一所湖滨别墅“在那里你将会很安全”。提供类似这种帮助的人很多。有的人则劝我“安心地住在这个国家”。

美国公民对我表示的友好情意常常使我兴奋和激动。这与新闻报道和政府的政策真有天壤之别！当发生反对我的游行时，情形往往被夸大，而对于支持我的表示则予以驱散或漠然置之。我记得，1977年在我最后一次访问美国时，当时威廉斯堡大约有50人示威反对我，而500人则游行支持我。宣传工具却换掉了数字并夸张地问谁花钱雇用了国王的支持者上街游行，这时却没有人愿意出来回答我的问题：是谁雇来了反对国王的示威者？毫无疑问，他们是雇来的。因为，这不是伊朗人的示威。人群中掺杂着黑皮肤的面孔和亚麻色长头发的人，这在伊朗是少见的。

我在纽约住院期间，很少与美国当局接触。卡特总统从未打过电话或来过信，其他的美国高级官员也是如此。然而，当我恢复了体力的时候，川流不息的人们前来看望我。我看到一些电视节目，宣传工具这样热衷于报道少数反国王的示威者在医院附近游行再一次使我感到惊讶。与往常一样，他们对表示支持的情形很少注意：人们朝我的随从乘坐的小型飞机欢呼雀跃，飞机漂着写有“国王万岁！”的横幅在东河上空飞行。

11月4日，在我到达纽约两周之后，德黑兰好斗的狂热分子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留了50多名人质。对于这种恶劣行为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据称他们是为了“惩罚”美国为我提供了一处以治病为名的庇护所。即使在今天，任何详细的评论都还不恰当。然而，这一事件对我本人的生活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华盛顿仍然未与我直接联系，但是信号却明白无误。当局希望我在身体情况可能的条件下尽快地离开这个国家。对我来说，除非万不得已，我也不愿再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

因此，11月8日我公开表示愿意离开美国以求释放被扣留的美国人质。然而，我的医生们的态度是：在这个时候，任何旅行对我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我一再申明，我与美国的友谊将不受损害，并指出，在我当政期间，在伊朗曾有45,000名美国人生活在“和平、安宁和繁荣”之中。

对我的申明最早做出反映的不是华盛顿，而是开罗。萨达特总统指示他驻美国大使阿希里夫·戈赫尔巴尔来医院请我回开罗进一步治疗。我确实深受感动，但是，我不愿意在那个时刻再一次使我的善意和慷慨的朋友承受压力。奎尔纳瓦卡的住所足够我们用的。虽然我到墨西哥的签证12月9日就

到期，但是我预料在延长签证上不会遇到麻烦。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曾两次亲自对我说过，“你把墨西哥当作自己的家吧，在这儿你是受欢迎的”。据报纸报道，墨西哥政府已经悄悄地通知了美国，我回去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再一次相信他说的一切。尽管我对西方的幻想日益破灭，但我仍然还有信心。

我当时拒绝批评西方，即使现在批评时仍然很犹豫。现在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西方在伊朗乃至全世界的政策都是缺乏远见并且是危险的，它常常不适当，有时纯粹是愚蠢的。通过近期的许多观察使我得出这些结论。只举一例：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人质危机的电视广播节目。我在屏幕上看到了英国现任驻联合国代表安东尼·帕森斯。一年前，他曾任英国女王驻德黑兰的使节。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只能回忆起他讲话的要点：“让这些人来吧”让他们向我们说明他们的革命——他指的是那些屠杀了许多无辜人民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同是这个帕森斯，1978年秋天，在我计划举行自由选举时对我说，如果我在选举中失败——并失去王位，我将被作为一个实现了民主理想的统治者载入史册。

这种行为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典型例子。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然而，这个愚弄了所有西方理想的所谓伊斯兰共和国却被真诚地邀请到联合国讲坛上用所谓的伊斯兰革命的新“道德”教育代表们。

当我观看帕森斯的不可思议的表演时，我开始怀疑，除了成功地毁掉了我之外，西方对伊朗的政策前后是否一致过。英国人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伊朗实行了压迫。这种情况自美国人进入之后也没有真正的改变。西方在支持我统治的同时总是要对我加以充分的控制。的确“充分”的界限随



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同，但是，西方竭力“剪掉我的翅膀”可以追溯到摩萨台时代。每当我独立自主地干些事情时，他们就要这样钳制我。

长期以来，国际石油公司一直同我作对。摩萨台失败之后，我和意大利的恩里科·马太签订协议激怒了它们。马太把国家碳氢化合物公司建成为了意大利的一个大石油公司，它独树一帜成为国际大公司的竞争者。我们的协议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协议，但其条款意义深远。与我们过去对半分利不同，马太同意自己只拿25%的利润，而伊朗拿75%。此后不久，我又与印地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签订了同样的协议。对半分的原则被打破了。大石油公司从未宽恕过我。与国家碳氢化合物公司签订协议两年之后，1959年美国各地第一次举行了反对我的学生示威游行。我怀疑示威游行是大石油公司资助、中央情报局组织的。我清楚，这听起来好象矛盾，因为这两个强大的势力都支持我的政权。但是，我现在确信，每当我的政策与他们的政策相悖时，西方就结成一个有组织的阵线反对我。20年前，我就应该相信这些，当时我的首相沙里夫·埃马米提醒我说，无论是在伊朗国内还是国外，美国都在背后鼓动学生闹事，并且在积极制造其它麻烦。

此时，埃马米首相由于履行其合法职责首当其冲成了憎恶的对象。美国想把他赶下台而让追随自己的人担任首相。此人就是阿里·阿米尼。当时，特别是在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我抵御不了如此巨大的压力。约翰·肯尼迪从未反对过我。虽然我们接触很少，但是我把他当成朋友。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在白宫会见肯尼迪夫妇的情景：杰奎琳·肯尼迪谈起阿米尼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并说她多么希望我

能任命他为首相。我终于给予阿米尼这个职位。曾有谣言说肯尼迪向我提供了一笔3,500万美元的援助作为诱饵。这些谣言完全没有根据，因为阿米尼担任首相之后，是他拿了美国这笔钱。但是，由于他管理实在无能，以至没有多久他又向美国人要求6,000万美元的援助，结果遭到了拒绝。

阿米尼失败之后，我发动了以“白色革命”而著称的一系列改革。有10年西方不再激烈地反对我了。然而在1973年石油禁运以及我决定提高世界石油价格以后，西方再一次突然全力地对我大肆攻击。在整个70年代，对我的反对日益加剧，最终各种利益集团奇异地同流合污了，它们是国际石油财团。英国和美国政府，国际新闻工具，我国的反动宗教集团以及共产党进行的恶劣活动，他们设法打进伊朗的某些机构。我不相信这些力量的组合构成了配合默契反对我的阴谋。但是无可置疑，有关的各种势力都出于各自的原因要把我撵下台。整个1978年石油财团拒绝和伊朗签订购买石油的新协定。这种协调一致的行动——或者不采取行动——有其不可思议的意义。我认为他们多少已经预先知道了那一年后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卡特政府的某些成员——尤其是国务院第二梯队的麦戈文分子急切地想看到我下台，以有利于这个新的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他们的战略，如果确实有的话，看来是认为伊斯兰有能力挫败苏联对这一地区的野心。我不知道依靠什么来挫败苏联。而新闻工具却集中宣扬人权活动分子，他们诋毁我的统治，不断地迫使我进行改革，而这些改革最终导致了灾难。

如果我的朋友和盟友采取的混乱和矛盾行动背后还有某些一致的政策，那么我认为所有这一切还较为容易忍受。几个月以来，我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计划。我反复考虑了西方

的意图和政策，但没有得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结论。尽管有事实根据，但我仍然难以相信伊朗的灾难仅仅是由于美国缺乏远见或缺乏政策以及美国政府内部无法解决的冲突造成的。然而不论是对过去的分析，还是对扣留人质以来的事件的分析都不能使我得出任何其它结论。看看我本人的命运吧！

到了1979年11月底，美国几乎不顾一切希望我离开这个国家，而我同样渴望离开。27日，我的医生报告说我颈部的放射治疗已经完成，高烧胆道炎发作得到了控制。胆道里的一块结石已破碎，碎末也已取了出来。虽然我的医生认为对前景应持“谨慎的”态度，但是我正在恢复之中。我希望尽快返回墨西哥。

两天之后，11月29日墨西哥突然投下了另一颗炸弹。那天早上，我派驻墨西哥的助手从墨西哥当局得到确认说对我的邀请仍然有效。他一方面为迎接我做了最后安排，同时与我在纽约的助手联系进行核实。然而，此后不久，我在纽约的助手得到墨西哥总领事馆的通知，说计划有了变化。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里，墨西哥人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取消了对我的邀请。当时，外交部长若热·卡斯特纳达在墨西哥城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这个消息。说我回去与墨西哥的“至关重要的利益”相违背。他没有解释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含义。新闻报道后来援引了墨西哥官员的话说是由于他们害怕他们驻中东和欧洲的使馆遭到激进分子的袭击。这种解释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墨西哥改变政策。他们有充足的石油足够需要，因此无须害怕中东的石油生产国。也许墨西哥政府希望在第三世界的各个组织中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害怕由于我而使希望破灭。我听说古巴提

出做一笔交易：阻止国王去墨西哥，在已经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卡斯特罗将放弃争夺安理会的席位，转而支持墨西哥。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古巴中途退出了竞争，而墨西哥当选了。

下一步怎么办？我没有就离开美国的问题与卡特政府争吵，但是我几乎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除我自己对回埃及犹豫不决之外，美国政府也担心我去将不利于萨达特总统与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后的事态表明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忧虑。到巴拿马去是一种可能，再回到巴哈马也是一种可能，尽管两地看来都没有多大吸引力。于是，华盛顿提出让我在圣安东尼奥附近的拉克兰空军基地休养，我接受了。12月2日，一架美国空军飞机把我们送到得克萨斯。我们离开医院的情景就象30年代强盗片中“逃跑”镜头一样，大约50名全副武装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守卫着所有大门和出口，部置在街道上和过道里。

拉克兰空军基地是一个训练场所，许多伊朗飞行员在这里进行过飞行训练。它可能是美国最不保密的基地之一。每天有3万人象在商业区一样出入这个军事基地。这里没有围墙，没有禁区。为了安排我的到来，五角大楼发出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指示。基地指挥部一点也不知道我的病情，也不知道需要采取哪些安全措施。因此，我们一到这里就被装进医院的一辆大汽车里，驶入医院最安全的地方——精神病病房。房间的窗户上装有栏杆，房门紧锁着。我们看上去就象被监禁了一样。王后越来越感到惶恐不安。我们简直不能再呆在那个地方了。基地司令官表示歉意，他很友好。他让给我们住进了来访军官的住所。

我们一旦在军官住宅安顿下来，情况就改善了。基地司

令阿克将军和他的高级官员颇有些不寻常，他们对我们表示友好并提供帮助。气候很好，我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我出去散步并有几次与将军和他的助手一起进餐。王后是一个体育积极分子，她爱好网球，阿克将军为她安排了几场值得一看的比赛。基地的一些军人曾在伊朗服过役，所以我们有机会重叙旧情。没有人反对我居住在这里。我们在纽约感到的压力开始平息下来。

的确，我仍然没有地方可去，现在帮助我们找地方成了华盛顿的问题。所有从前考虑过的选择又重新试探一遍。请求奥地利和瑞士接受我们，两国都说不行，虽然我与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卡赖斯基的关系一直很好，并且多年来在瑞士拥有一所房子。同南非和英国也都商谈过。我离开伊朗不久，便得到通知说，玛格丽特·撒切尔向我们保证，只要她在即将到来的英国大选中获胜，我们将在英国得到庇护。她担任首相之后却告诉我们，我们去英国将使她很尴尬。这种立场一直没有改变。

卡特政府提出了一个选择的对象，竟然是我已经得到了邀请要去的巴拿马。12月的一天，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从巴拿马城直接到了拉克兰。在巴拿马他与托里乔斯将军讨论了我去那里的问题，托里乔斯同意这个意见。我与我的随从人员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决定派我的助手罗伯特·阿尔马奥和我的伊朗安全主任与乔丹一同前往巴拿马进一步商谈。他们去看了距巴拿马城4小时路程的偏远山区休憩地和首都的一处地方以及孔塔多拉群岛。他们发现山区虽然很美，但与世隔绝，而巴拿马城又太拥挤和喧闹。现在看来孔塔多拉岛是最佳的选择，我的助手们回来时带来托里乔斯将军的亲笔信，他表示热烈欢迎我。

后来,乔丹和白宫特别顾问劳埃德·卡特勒一起来见我和我的随从,作各种必要的安排。我的律师威廉·杰克逊,基恩博士和我的助手们同白宫官员一起把我离开的计划最后定下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达成了口头协议,保证一旦医疗需要和安全发生问题,美国将全力支持我:卡特勒和乔丹称白宫对此已完全表示同意。他们保证我可以在前运河区的戈尔加斯医院就医,这是一所具有现代化和最新设备的美国军事设施。虽然基恩博士对医院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有些疑虑,但是他说这家医院曾是最好的医院之一。政府官员还说,在派蒂拉的巴拿马医院也是第一流的,一旦真有紧急情况,我仍可以回美国去。乔丹向我保证这是卡特总统完全同意的。美国仍在巴拿马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我感到这是我的安全和照顾的又一层保证。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乔丹和卡特勒都很友好和彬彬有礼。他们提出去巴拿马的建议有道理。除了美国的势力和随时可用美国医疗设备以外,巴拿马对西方持同情态度。它与伊朗没有外交关系,对霍梅尼的威胁可以置之不理。既然我们没有其它的选择,那么这似乎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在我们与白宫达成协议之后,卡特总统打来电话。他热情地为我祝福并重申他的助手所作的保证。自1978年元旦这位总统访问德黑兰我与他话别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与他通话。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收拾行装。12月15日,星期五,天亮之前,我们的车队从拉克兰出发来到附近的凯利机场,有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等候把我们送往巴拿马。7点刚过,我们就起飞了。美国人的许诺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着。

我们在孔塔多拉的最初几周是非常愉快的。居住的院落

有些象天堂岛。我们被安置在刘易斯大使有4间一套卧室的海边住宅。岛屿座落在太平洋上距巴拿马海岸线30英里的地方，我们在房子里可以眺望到太平洋壮丽的景色。气温和湿度对我的喉咙大有裨益，由于放射治疗我的喉咙一直疼痛。我会见了一些巴拿马领导人：托里乔斯将军和罗伊斯总统邀请我和我的家人到他们家去做客并多次来孔塔多拉看望我。他们两位经常来岛上，是午宴席上的常客。

戴维·弗罗斯特带来了一组电视人员到岛上来，他们拍摄了几个月前在墨西哥安排的一次采访节目。我很喜欢采访提出的问题和对智力的启发，这是采访的价值。多年来，我喜欢与新闻界进行友好的争论。在德黑兰，主要新闻工具的记者无论什么时候来采访都不会遇到麻烦。与外国记者的谈话，无论他们的问题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却总是使我有机会阐明我对主要问题的看法。另外，争执和辩论使人头脑敏捷，有助于澄清一个人的思想。弗罗斯特是一位精明的采访记者。

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象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对复杂问题作出随随便便的回答比根本不回答还要糟糕。

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它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越南的例子总是缠扰着我。美国人不象法国人知道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他们按自己的模子着手在越南建设一个新国家。吴庭艳拒绝按照年轻的教条主义记者们的想法将自己的政策屈从于不现实的

民主理想。很明显，是肯尼迪政府下令将吴庭艳搞掉的。值得注意的是，吴庭艳在死的那一天还在向共产党发动攻势，此后，主动权便转到了越共和北越手里。在以后的12年里，美国人和南越人再没有重新获得这种主动权。

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这样做可以有时间进行调整。甚至我的最严厉的批评家们再也不说，今天伊朗毛拉们的野蛮政权比我的政府更民主，更正义或更有效。这种蛊惑人心的政权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到的。实际上，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西方几乎不把我们作一些比较，很少人看到其不同。国王被置于一个箱子中，霍梅尼被放在另一个箱子中，似乎我们管辖的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到1980年1月17日美国播放弗罗斯特的采访的时候，我在孔塔多拉早期的宁静生活开始消失。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已经前往德黑兰履行其灾难性的使命，他的努力换来的仅仅是轻视和嘲笑。霍梅尼和他的亲信从未认真对待过瓦尔德海姆的建议：由联合国对指控我的罪行进行调查，以此换回美国人质。瓦尔德海姆一连两个月抱着这种幻想不放，只有当他3月派往德黑兰的代表团两手空空地回到纽约时，他才放弃这个想法。代表团甚至都未见到人质，更谈不上释放他们了。然而，戈特布扎德和其他人通过电视台举办的小型讨论会和电视节目向全世界散布了无数的谎言。任何新闻单位都没有调查过，那些据说受到我的警察拷打和致残的儿童是否实际上是事故和先天缺陷等悲剧造成的。

1月12日，伊朗的新统治者对历史以及对我本人发动的冷酷无情的战争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他们要求巴拿马政府



逮捕我。这一行动并不使我惊讶，然而我的主人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却使我吃惊。巴拿马当局非但不对此要求采取蔑视的态度，反而开始传播谣言说他们确实在与德黑兰联系并且在谈判，希望找到一个较联合国提出的更好安排。一出奇特的含有不祥预兆的双簧戏开场了。因为，在流传这一说法的同时，巴拿马人急急忙忙地向我们保证——秘密地——不会引渡我，因为这种引渡违反巴拿马法律。在弗罗斯特采访一周后，戈特布扎德又向我开火了。他宣称，我在巴拿马被软禁了。1月24日，巴拿马政府正式否认此事。而几天之后，政府又吞吞吐吐地在报刊上登载各种关于引渡我的“技术可能性”的报道。而私下我们再次得到保证，让我们不要理睬这些报道。

这个谜一直持续到2月份。2月7日，巴拿马外交部长说，我“实际上”是一个被监禁的人，因为不经巴拿马的允许，我就没有离开孔塔多拉的自由。政府渐渐直接和间接地增加了压力。我的随从人员注意到，安全措施越来越不严格，窃听我们电话的事情屡屡发生。有一次，我的助手在电话上谈到我们居住的费用极高，第二天，巴拿马人抱怨说，在电话里太详细地谈论了钱的事。一台售价400美元的录音机——我们被迫付的钱——安装在房子里录制我们在电话里的所有谈话。金钱的压力决不是小的。我的随从抱怨帐单开的钱数太高。托里乔斯将军的朋友们告诉我，孔塔多拉可出售，价格是1,000万美元。同在巴哈马一样，我们看了房产，也是抬高了的价格。然而，我们不考虑购置任何东西。白宫和托里乔斯都曾向我的随从保证，不会让我们上物价骗子的当。托里乔斯还特意交待，如有什么意见可直接告诉他的办公室。

我开始逐渐意识到有人正试图使我与世隔绝。有一次，

我飞往巴拿马城去秘密会见美国大使，他说他带来卡特总统的口信。我的顾问罗伯特·阿尔马奥原计划同我一起去首都，但巴拿马官员拒绝让他参加会见。美国或许同巴拿马一样不愿让人看见我同我的顾问们在一起，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卡特的口信叫我不要担心，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我再一次得到了“重复的保证”。

压力转移到了我的美籍工作人员身上。巴拿马官员指责他们向美国报纸泄漏假消息。然而他们又说不出假消息的内容。那时有关我的任何消息大概都是由美国政府官员制造的。这样，在我们抱怨收费过高以后，华盛顿各报详细报道我对返回美国颇有兴趣。当然，我没有这种计划，尤其最近我有了在美国的那段经历之后更没有这个计划了。然而新闻界的推测继续不断，我们的巴拿马主人也不时给我们一些小小的烦恼。我看得出来，巴拿马不是久留之地。

巴拿马政府仍在与伊朗玩弄引渡的把戏。霍梅尼雇佣了一位法国和一位阿根廷律师处理法律事务，两人都住在巴黎。他们起草了一份450页的东西，并到世界各地游说寻求支持，在文明国家里这个文件将作为笑料而被拒之法庭之外。然而，巴拿马人是否能轻易地推倒那些指控是值得怀疑的。霍梅尼的巴拿马律师说，如果德黑兰政府答应不处死我，可将我引渡过去。

3月初，我的一名美国助手马克·莫尔斯被巴拿马当局逮捕，并拘留了几个小时，只是在美国大使馆的压力之下方得以获释。他被指控干涉了巴拿马的安全。实际上，当局对莫尔斯一再抱怨收费过高和报假帐感到恼火。

我的疾病终于笼罩上了死亡的阴霾。2月份，癌症再次发作，并且扩散到脾脏。基恩博士几次从纽约赶来为我检

查，与我的法国内科医生弗兰德林博士一起会诊。他们两人都建议进行手术，请休斯敦的迈克尔·德巴基博士到美国运河区的军医院戈尔加斯医院施行手术。当然，在拉克兰军事基地，我的随从与卡特勒和乔丹也讨论过去的问题。然而，又出现了其它的问题。表面上美国一直允许我们去戈尔加斯医院就医。然而，巴拿马人现在却要求手术在他们的派蒂拉医院进行。

这场怪剧的下一幕就象医学连续剧。我的医疗小组和顾问会见了派蒂拉医院的股东之一、托里乔斯将军的私人医生加西亚博士。他十分强硬地说，手术必须在派蒂拉进行。基恩博士争辩说，那里的设备不齐全，合乎标准的血液设备和实验室都在戈尔加斯医院。血液不得不急切地从派蒂拉送往戈尔加斯进行分析。讨论越来越激烈。巴拿马医生情绪激昂，脾气暴躁，他们对外国医生干预极为不满。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专业医务工作者能够允许虚伪的民族主义的自尊心超越一个病人的福利。加西亚博士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只执行卡特总统的命令，”说他不管我们是怎么想的，还说我们必须听从安排。最后，加西亚博士发出最后通牒：

“就这样，你们没有别的选择。要么你们去派蒂拉，要么去机场。你们非用我的医院不可。”

我的随从非常恼火，可是当时我们毫无办法。很清楚，美国希望我们继续呆在巴拿马，其目的是与伊朗继续讨价还价，利用我作为换回人质的诱饵。我将继续是一名呆在美丽的孔塔多拉岛上的“受人尊敬的美囚人”。

3月11日，我们决定进行在所难免的手术。德巴基博士已同意在派蒂拉为我进行手术。已作好准备把我的随行人员从孔塔多拉迁移到巴拿马城。我的三个姐妹已飞抵巴拿马伴随

我。3月14日，我办理了手续住进医院。

不一会儿，德巴基博士、基恩博士和他们的美国医疗小组来到了。遗憾的是，看来不成问题的事情又出了问题。这时，巴拿马医生们不让德巴基博士做手术。他们声称德巴基仅仅是一名巡回外科医生，这种常规手术毫无疑问能够由巴拿马医生进行。他们傲慢到了极点。我不能由美国医生来做手术，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极其愚蠢。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我不打算把我这条命丧在不顾人身安全的巴拿马人手中。我的医生们反对我在派蒂拉进行手术，他们同意手术可以推迟两周而不致立即出现危险。第二天上午我离开了医院，回到孔塔多拉。

此刻全世界的新闻报道开始详细谈论我的境况。幸运的是，萨达特夫人给王后打来电话，对我的健康和安全表示关切。她代表萨达特总统邀请我们到埃及去进行极为需要的医疗，说我可带去我愿意带的医生。萨达特总统将立即派飞机来接我们。

我决定接受萨达特总统的盛情邀请——这是一个自从我离开祖国以来一直有效的邀请。我一直把萨达特视为尊贵的朋友和高尚的人。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再次对我和我的家人表达了这种感情。我在巴拿马逗留期间，他和他的夫人多次打来电话。电话内容大都如此：“你为什么不来埃及？欢迎你们到这里来。”

3月21日，汉密尔顿·乔丹来到巴拿马。他一下飞机就打来电话说他要来看我。然而，乔丹一直没来。与此同时，他与劳埃德·卡特勒取得了联系，卡特勒后来与美国国务卿万斯的高级助手阿诺德·拉菲尔一同飞抵巴拿马。卡特勒一

到巴拿马就打电话说他带来了卡特总统的口信，问能否到孔塔多拉来。尽管我知道王后已经与萨达特夫人谈妥，表示我愿意去埃及，但我们还是同意见卡特勒。

卡特勒来后，他坚持在没有我的助手在场的情况下见我。我勉强同意了。在拉克兰谈判时我曾与卡特勒打过交道，那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的和机智的人，在外交往来的崎岖小道上是一个稳当的人。眼下在孔塔多拉，他巧妙地、超然地阐述了美国的立场。他说，我到埃及去可能危及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地位。当然，我可选择休斯敦进行手术，拉克兰协议的条款对这一点有具体规定。然而，现在，在进行微妙的谈判期间采取任何这类行动都可能危及人质危机的解决。很清楚，对卡特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继续留在巴拿马。现在，很快就妥协了。当然，手术可以在戈尔加斯进行，巴拿马医生急于向德巴基博士道歉。虽然卡特勒的话有说服力，但是，我事实上已经决定去埃及。尽管如此，我仍同意考虑他的建议并答应第二天上午与他见面。

我没有认真地考虑美国人的建议。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美国人的许诺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他们已经使我失去了王位，再相信他们只能意味着要付出我的生命。第二天上午，当卡特勒来到我房间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我那收拾好了的提包上，他明白了一切。他不再费口舌劝说我改变主意。相反，他给白宫打电话商谈必要的后勤事宜。他建议使用美国包机，这要比等待萨达特的飞机更好，后者有个加油问题和着陆权的问题。接着又打了几个电话。卡特勒和他的助手们设法租了一架飞机。飞机将在巴拿马城国际机场等我们。

在我做出离开决定之后，巴拿马的举动有了变化。他们表现得格外热心。警卫们现在乐于帮助我们。从医疗方面看，时间是最重要的：我正在发烧，血球计数低到了危险的程度，血小板指数下降到不足正常值的10%。横越大西洋的飞行将是冒险的，如果我在这样的高度上不慎碰破皮的话，那么我可能因出血不止而死亡。

我们在巴拿马城登上了飞机。这是一次很不舒适的漫长飞行，因为座位很窄而且很挤。我们降落在亚速尔群岛加油。一位葡萄牙将军和一位美国领事在机场等候我们。尽管我很虚弱并发着烧，但我仍按礼节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准备接见他们。

最后，我们在开罗着陆，萨达特总统和夫人在明媚的阳光下等候着迎接我们。一支仪仗队站在他们的后面。我步出机舱走向萨达特总统和夫人，热烈地同他们拥抱。

“谢天谢地，你平安无事。”萨达特说。的确，我感到安全了。

我们乘直升飞机从机场来到位于开罗郊外、尼罗河畔的马阿迪军事医院。医生们立即开始工作，给我退烧并提高我的血球计数。几天之后，德巴基博士和他的医疗小组带着先进的医疗设备来到开罗。手术已势在必行，X射线显示我的脾脏已经肿大，非常危险。

手术于3月28日进行。摘除有癌细胞的脾脏重4.5磅，其大如足球，正常的脾脏只有人的拳头大小。

当我身体完全复原离开医院时，我回到家人中间，我的家安置在距离开罗6英里的克而白宫。这是所有来埃及访问的国家元首下榻的地方，它座落在一座大公园的中心，园内到处是果树和花圃，周围有一道围墙，极为安全。自我离开

伊朗以来，这处可爱的住宅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和平、宁静和安全的环境。在我身体恢复健康期间，这儿美丽的景致成为我力量的源泉。自从我到墨西哥以来，我从没有这样好地渡过时光，进行思考。

当然，我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祖国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上。无疑，我曾在伊朗做过错事，然而，我不认为这些错误成为我下台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是可以纠正的。我的祖国已接近成为一个伟大文明的国家。

然而，反对我的势力是强大的，尽管他们没有一致的目的或更大的目标。

西方的许多反对意见似乎是出于无知和对伊朗应该是怎样一个国家的错误看法。西方人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忽视。当我们重新进入现代觉醒的行列之中时，我们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们仅仅是东方通道上的一名卫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体现在政治现实之中。我从未否认这些现实，但是永远也不理解英国和美国为什么不能承认伊朗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的土地上，它把近东和印度联系起来，而且，我们是西方对付俄国人世代梦想取得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

我认为，这里的问题是西方对伊朗历史缺乏兴趣，不理解波斯（古代的和现代的波斯）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个人对历史的回答必须从我的祖国三千年波斯文明史开始。这部文明史被曲解了，其结果导致了伊朗试图进入20世纪的失败，也许预示着那些我认为是朋友和盟友的国家更大的失败。

## 二、过去的教训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波斯的历史可追溯到无限遥远的过去。我们位于伟大西方文明发祥地的中东，处在连接欧洲和亚洲、印度次大陆和非洲的交叉路口。我国濒临三个海——北面的里海，西南的波斯湾和南面的阿曼湾。而且，除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相隔，我们与几世纪以来的文明世界中心地中海遥遥相望。这就是我们的有利地位。在历史的许多伟大时刻，它使我们能够征服邻国，与它们进行贸易，影响并使它们变成文明国家。

我们所处地位的弱点在于伊朗的中心是茫茫一片高原，在西北—东南的轴线上乃是山地和盐碱沙漠。高原的四周山脉连绵不断：厄尔布尔士山脉几乎贯穿了北部边界，西部有扎格罗斯山脉，东南部有俾路支山脉。除了几个大城镇外（伊斯法罕，克尔曼），我国的中部地域是空旷而又贫脊的。人口、活动、财富和文化都集中在周围的省份。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波斯都把它的一个又一个首都建在边缘的大城市里的缘故。在德黑兰之前，波斯王朝的首都在苏萨、艾克帕塔那、波斯波利和忒西封，萨非王朝时期，在大不里士和阿塞拜疆的阿尔达比勒，后来的伊斯法罕是一个例外，它是中部地区的一个大绿洲，有极好的地理特征。

在我们最伟大的时代里，单一领袖以他的活力、雄心壮志和聪明才智，有时是坚定的智慧长期保持了我国的统一。相反，在另外的时代里，外国为了维护它们的利益公开或不



公开地对我们发动了攻击，由于有或多或少有意识的和有组织的内部阴谋相配合，所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

对传说中事件的简要回顾，能使人们更容易理解迄今不为人所知的大部分历史事件的含义和影响。

在印度欧洲人米底和帕尔斯两个部族的推动下，在争吵了两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问题上我们成为了胜利者。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9年 - 330年)在黑海到中亚，印度到利比亚的地域创建了前所未有的最伟大帝国。

它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由一个统治者统治众多不同人群的帝国。为了实行革新，波斯人把帝国划分为若干个省，每一省都由“地方总督”即省督进行管辖，他们使用信号台或直观通讯系统：在山顶修建信号台，用点燃烽火的方法把消息从国家的一端迅速传到另一端。他们还创立了货币制度和财经事业，并使度量衡标准化。这样，波斯使古代世界懂得如何治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罗马帝国只不过是仿效了波斯帝国并且频频搬用了她的方式方法而已。

这一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称得上是“大帝”，因为他在宽容和公正的基础上创立了帝国。作为征服者，应该承认他是第一个提倡人权的人。他是古代社会第一个公布堪称自由宪章的人：宪章规定释放战俘，并给予他们土地；被征服的民族保持它们的权利和习俗，因为中央政权尊重它们的法律和宗教。居鲁士不仅饶恕他强悍的敌人，而且还毫不犹豫地信任他们并委以重任，因此，可以说他是平民的救星。这个政策符合波斯的特性。对主张和平有可能建立道德秩序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他们的政策。波斯以受迫害者可以在它的国土上避难而闻名。

居鲁士二世，大流士和泽尔士是我们的英雄国王；他们继续开拓我国的文学和艺术事业。然而，欧洲人大都得到的教育说大流士在马拉松战败，泽尔士在萨拉米斯（公元前480年）的海战中失利。由于这些小国对大国取得了感人的胜利，人们常常忘记了后来波斯成为了爱琴海的霸主（公元前394年）的情形。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衰落在一位非凡的人物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年—323年）手上告终。除庞特斯地区和科拉斯米亚外他占领了大流士帝国的全部领地，并且还稍微向东北方向延伸，把边界推移到锡尔河。他远不是瓜分这个帝国，也不是为了希腊的利益剥削它，而是效仿居鲁士，使波斯成为自己的帝国。

瓜分发生在他死后（公元前323年）。与我们在大部分西方历史书中读到的相反，波斯没有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当然我们的博物馆内仍然摆着一尊小巧玲珑的希腊雕像。实际上，亚历山大信奉波斯文明。后来的征服者也一再出现这种现象：波斯人屈服于他们，但波斯人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并且使他们的战胜者接受这种文化。

公元前250年，帕提亚人建立了安息王朝（公元前250年—224年），它大约延续了5个世纪，后来以波斯人阿尔达西尔战胜阿尔达旺而告终。在反对帕提亚人和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萨珊王朝（公元224年—651年）。阿尔达西尔曾是琐罗亚斯德寺院的看守。他建立的帝国从印度河和锡尔河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南岸。它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了两个重要作用——一个是在政治方面，另一个是在文化方面。

波斯帝国是阻挡原始或半原始游牧人从干旷草原或亚洲大山席卷而来的第一道障碍。几个世纪以来波斯人以血的代

价遏制了西徐亚人，白匈奴人，塞尔杜人和鄂托曼人的入侵。东罗马帝国的印度血统欧洲人没有表现一点感激之情。他们只想从我们在东面所处的困境中渔利，以便在冲突中占取优势：几千年来，这场冲突使我们与当时地中海的主要国家结下怨仇。

当波斯屏障被打破后，两个世界的接合处出现了空隙，于是，阿拉伯人从西面，尔后土耳其人和蒙古人从东面蜂涌而至。这样，东、西欧的历史，俄国、北非和印度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

至于萨珊文艺复兴，它类似1,200年以后的欧洲文艺复兴，是综合性的。据说，沙普尔一世（公元241年—272年）下令，不仅对拜占庭帝国，而且对印度的宗教、哲学、天文学和医学书籍进行收集和翻译。记得由于有了所谓的阿拉伯译文，欧洲才得以从十二世纪起重新获得伟大希腊著作的知识，这样，我们也许能够宣布说，如果没有波斯人的努力和老早作出的榜样（阿拉伯人以出众的才华仿效了它们），那么就不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或者说它会十分不同。

公元642年，伊朗受到阿拉伯的入侵。接着是几乎毁灭了伊朗的外国统治：这个国家处在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之下达几世纪之久。同希腊人遇到的情况一样，被征服者战胜了征服者。

最初，波斯人拒绝逊尼派教义和发展什叶派教义从而维护了他们的创见与独立。从政治上说，这意味着不承认巴格达世袭哈里发的精神主宰；被征服和被占领的国家除了她的精神生活外，再也没有有什么其它东西可以称为是自己的了。

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重新获得独立的决定因素是一位

阿拔斯使者(阿拔斯家族是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后代)阿布·穆斯林·霍拉桑取得了胜利。公元745年—750年,在伊朗人始终占多数的军队的帮助下,他解放了霍拉桑,占据了现在称之为伊拉克的地域。由于他的贡献,阿拔斯王朝接替了巴格达的倭马亚王朝。

科学和波斯艺术向东传到霍拉桑省,它们在那里得到了迄今为止最有气魄和最辉煌的发展。塔赫里王朝的尼沙普尔和萨曼王朝的萨马尔罕和布哈拉成为伊朗—伊斯兰文化的中心。这是波斯诗歌的黄金时代,著名的诗人有史诗之圣菲尔多西(公元935年—1020年)以及神秘主义者伽慈尼的萨纳伊和基拉尔德·J.鲁米(1273年逝世)。在劳齐家族和伊本西纳的努力下,医学和哲学也空前的繁荣。

到马姆罗克时期这一过程开始中断。蒙古的入侵只不过完成了业已发生的解体,并且彻底摧毁了帝国。没有什么能够掩盖这个既野蛮又惨无人道的征服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成吉思汗和旭烈兀摧毁了大多数城镇,尤其是霍拉桑,并杀戮了那里的居民:几百万伊朗人惨遭杀害。同时,保持伊朗—伊斯兰文化传统的组织被破坏,与真正波斯精神如此相悖的游牧精神却强化了。

最后,从1383年起,残存很少的城市文化也被跛足帖木儿一扫而光。历史学家们后来引证了他在巴格达用9万个割下的头颅树立起的可怕方尖碑。他饶恕了几个被他放逐到撒马尔罕的工匠,命令他们对此碑加以装饰。

### 三、从强大到沉沦

民间传说的帖木儿的暴行可能言过其实，但是，这是一个充满恐怖的王朝则是无法否认的。波斯似乎最终被吞并，永远从历史上抹掉了。然而，到萨非王朝（1501年—1722年）却出现了波斯的复兴。

萨非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伊斯玛尔（1487年—1524年）决意团结全国在东面对抗乌兹别克人，在西面对付鄂托曼人。他保证了全国的精神统一，大多数人团结在什叶派周围，什叶派成为了国教。

阿尔丰索·德阿尔布凯尔率领下的葡萄牙人占领了霍尔木兹岛和附近的沿海地区，伊斯玛尔准备退却。自从罗马帝国衰落以来，这是西方第一次向波斯发动进攻。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把我们引到东方的运动已经结束，崇尚西方不知不觉已经开始。

伊斯玛尔的曾孙阿巴斯大帝（1587年—1629年）使我国再度强大、繁荣昌盛和令人望而生畏。尽管他未能从鄂托曼帝国手中收复1534年永远丢失的美索不达米亚，然而，他修整了首都伊斯法罕，吸引了无数的艺术家和诗人，使之成为一座拥有60万居民、号称“半个世界”的巨大城市。这是建筑和绘画艺术的另一个黄金时代。

也是阿巴斯允许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波斯建立贸易站。东印度公司确实帮助他把葡萄牙人从霍尔木兹驱逐出去

(1622年)：我们并没有从这个安排中得到好处。

1629年到1736年是我们面对土耳其和俄国入侵的又一个退却的世纪。根据1724年协定，这两个国家瓜分了我们北方各省，同时，阿富汗的阿什拉芙占领了整个东部，并且掠掳了伊斯法罕。波斯被支解得四分五裂。所有的一切好象又一次丧失了。

萨非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苏丹·侯赛因的命运是悲惨的，他被阿富汗匪徒们凄苦地围困在首都内。波斯的命运好象永远就这样决定了。

然而，纳狄尔国王，历史称他是“波斯的拿破仑”，却恢复了我们的辉煌业绩和权力。他在平息了北方迈谢德和赫拉特的叛乱之后，又击败了阿什拉芙并重新夺回了伊斯法罕(1729年)，他很快赶走了土耳其人，之后又回过头来对付俄国人，俄国人不愿与之对抗，放弃了征服计划。

随后，纳狄尔国王攻克了坎大哈和喀布尔，穿过查错比山口——该山口与开伯尔山口不同，没有设防——出现在敌人后方并战胜了他们。纳狄尔带着俘虏向德里进军，于1739年3月到达了德里。对此，印度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348年积累的财富一转眼就倒手了。”依据战争财产的规定夺得的珠宝将成为波斯王国的财富，好年景作为国家的荣誉、坏年景则用来支撑我们的货币。我把它们放在国家银行的保管库里。只有真主知道，毛拉们用它们干了些什么。

奥伦泽布答应将孙女许配给纳狄尔的次子，于是他满意地撤走了，将王国交给了穆罕默德王。它不包括印度河右岸，因为这个地方已成为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一部分。

纳狄尔国王由于历次战役中屡胜不败，因而被比作拿破

仑。但是拿破仑最后被联军击败，而纳狄尔却一直战无不胜。尽管如此，这位法兰西帝王是一名杰出的管理者，而纳狄尔则不然。拿破仑设法帮助自己的家人，而纳狄尔王极端残暴，他竟挖掉了自己亲生儿子的眼珠。

桑德王朝的古里汗（1757年—1779年）继承了纳狄尔·阿弗沙尔王朝，古里汗以“奴隶的保护者”而闻名于世。这个王朝在一场新的内战中覆灭了，结果恺加王朝上台执政（1794年—1925年）。

就在这个时候，波斯开始瓦解处于无政府状态，时逢西方列强工业化，这越发促使它成为一个悲剧。为了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西方开始推行殖民主义。当西方列强在全世界实行经济、军事、政治侵略时，根据古利斯坦条约（1813年）和土库曼恰伊条约（1828年），我们把高加索诸省丢给了俄国人。由于大英帝国强迫我们接受1857年巴黎条约，我们又把赫拉特省给了阿富汗，在东北，把黠武\*给了俄国人。最后，于1872年，阿富汗和波斯分割了锡斯坦省。

1797年至1834年恺加王朝的法特赫·阿里王竭力想收复格鲁吉亚。他十分钦佩拿破仑并热烈地欢迎“加尔达内伯爵”和1807年法国皇帝派遣来德黑兰的军事—外交使团。该团考察了波斯的道路，其目的是派一个强大的法国远征军去印度。

在埃及，拿破仑仔细地研究了纳狄尔王1739年战役的胜利。现在看来他的计划仅仅是梦想。但是，从法特赫·阿里王、他的儿子阿巴斯·米尔扎和加尔达内将军与拿破仑以及法国外交大臣尚帕尼的通信档案中可以看出拿破仑皇帝的真实意

---

\* 即现在苏联的马雷。——译注

图。他把波斯既看成是西方的天然堡垒，又是通向东方的通道。他认为应当将“这个头等重要的战略地区”用于进攻和防御目的。这首先要遏制俄国人：“假如波斯人有两万支枪和一支精锐的炮兵”，他们就可以依靠了。

接着，有必要进行认真的训练和使用“这支为数144,000名的第一流波斯骑兵”作为法国远征印度的先头部队。加尔达内于1808年1月26日写道：“远征是德黑兰的每一个人都在考虑的事情。”

在德黑兰，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的法国指挥部预计“印度河战役”可能将持续5到7个月，这取决于拿破仑军队是沿陆路（通过阿勒颇、巴格达、巴士拉、设拉子和亚兹德）挺进，还是经由黑海和特立布松到达这里。一部分军队将取道埃尔祖鲁姆、哈马丹、亚兹德和赫拉特前进，另一部分军队将通过陶鲁斯、德黑兰和霍拉桑前进。

加尔达内补充说：“每两个人将需要一头能驮东西的牲口。……大炮、炮弹和火药将就地制造：波斯有质量极佳的硝酸钾……从与英国作战的印度锡克人中能够征集5万名骑兵。”

不幸的是，法特赫·阿里从法国盟友那里一无所获。俄国军队窜犯了波斯北部，加尔达内致信拿破仑：“一个由大恶棍和大富翁哈福德·琼斯爵士率领的英国代表团正出现在波斯湾。”

当时拿破仑皇帝正在西班牙追击英国的远征军，其意图是把他的哥哥约瑟夫扶上被废黜的西班牙王位。由于他的军队于1809年不得不在多瑙河打仗，3年后又在莫斯科打仗，他取道波斯远征印度的计划取消了。



## 四、通向印度和石油的道路

在法特赫·阿里的继承人（穆罕默德，1834年—1848年；纳赛尔丁王，1848年—1896年；穆扎法尔丁，1896年—1907年）统治下，波斯从软弱变得麻木不仁了。尽管从穆罕默德时代起我们就为收复原来属于我们的赫拉特省而战斗，但最后我们注定要放弃它，而且仅仅是由于英国的威胁而必定要承认阿富汗王国。为什么“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占领〔原文如此〕赫拉特是一个敌对行动呢？”不是因为 我们伊朗人构成了对印度的威胁，而是由于一旦重新征服了赫拉特，俄国要在那里建立领事馆。

从1857年巴黎条约起直到1921年，我们不幸的国家的任何一届政府如果没有取得英国大使或是俄国大使或是两位大使的同意、默许或者其它形式的表态，谁也不敢调动一兵一卒，批准一个特许权或者通过一项有关伊朗人的法律。我们的政策——如果这些能称之为政策的话——是在这两个大使馆里制定的，两国政府把波斯看成是某种“不可接触的”奴隶，它们从来不隐瞒这一事实。他们的外交信件就是我们要执行的命令，一旦我们有任何不服的表示，这些信件便成为威胁。为了压服我们，大不列颠将“入侵”我们：一支“远征军”（几百人）将在海湾登陆。除了象查汉塔希或者坦盖斯坦尼这样的部落会自动起来消灭远征军外，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无论如何，英国必须使通往印度的道路畅通无阻。

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两个法国科学家，地质学家科特和考古学家雅克·戴摩根发现了石油蕴藏的材料。自古以来波斯称它为“纳弗特”，拜火教徒们把它当作圣火！很久以来人们就知道波斯地下，尤其是东南部蕴藏着丰富的石油。1872年，一位名叫朱丽叶斯·冯·路透的英国男爵获得了范围很广的商业特权。他未能从中获利，他怕弄得倾家荡产，于是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努力。幸运的是，后来他建立了一家通讯社从中得到了安慰，该社直到今天仍很出名。

几年之后，前面说到的两个法国人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对他们来说，寻找一位对他们的发现感兴趣的金融家是比较容易的。在英国驻波斯公使亨利·德拉蒙德的帮助下，他们与住在伦敦的澳大利亚银行家威廉·诺克斯·达西取得了联系。

诺克斯·达西从开发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一个金矿中发了大财。出于冒险的热情和强烈的经营欲望，他认为黑色金子能使他的财产翻一番。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由于俄国人提出了带有威胁性的要求，谈判变得很复杂），1901年5月28日国王最终同意给予诺克斯·达西“勘探、开采、运输和经营天然气、石油、沥青和其它石油产品”60年的专有特许权，但与沙皇俄国接壤的省份除外。实际上，在这方面，诺克斯·达西表现得过分乐观。他必须投资的金额很快超过了他的财力，于是，他不得不把特权转让给英国-波斯石油公司。

直到1908年5月26日，石油才终于从马斯吉德苏莱曼（从苏莱曼清真寺附近到寺庙遗址）流出来。尽管诺克斯·达西从未到过伊朗甚至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见过一桶石油，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在石油史上就占有了一定地位。

与此同时，在1907年8月31日，英国和俄国签订了一项

瓜分波斯法令。

从1905年起，俄国革命兴起，第比利斯和巴库发生的起义激起了德黑兰的政治宗教运动。1906年，英国支持的这场运动强迫软弱的穆扎法尔丁王在去世的前几天颁布了一部宪法。但是，除了选举议会之外——选举完全被封建地主控制了——没有什么真正的改革。

波斯的社会和政治气氛十分令人不安。中央政府非常软弱以致它甚至都未管辖整个首都。几乎没有军队和警察。数量很少的士兵只得到微薄的薪金或根本拿不到薪金，因此，他们不得不打短工以维持生活。此外，他们在北边要听命于俄国军官，在南面听命于英国军官。

唯有力量才能统治。力量掌握在英国控制之下负责石油生产活动安全的大地主和地方部落首领的手里。在农村掌握在匪徒手中，在城镇则在窃贼手中。

波斯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了招待一位外国客人，政府不得不向商人们借款。唯有在国外经商的人是富裕的。外国人有权开采重要的国家资源和开设服务业：石油、渔业、电报、海关等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仍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奴隶制依然存在。

健康状况是骇人听闻的，不但平均寿命只有30岁，而且婴儿的死亡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营养不良和不卫生的状况折磨着曾经是健康和富有生气的人民。由于完全缺乏卫生条件，伤寒、疟疾和沙眼成为一些地区的地方病，鼠疫和霍乱也是常见病。在所谓的现政府领导下，霍乱又一次在我的祖国流行。

愚昧与贫穷和疾病分不开。不足百分之一的人有文化。

在德黑兰，只有一所公立中等学校。妇女不上学而且被剥夺一切权利。西方物质文明的一切特权在一定程度上传到了鄂托曼帝国、印度以及我们的其它邻国，但是在伊朗实际上是闻所未闻。这里没有铁路，没有象样的公路，没有轿车，没有电，没有电话。只要哪里有，那就是真正的豪华奢侈。物质和精神贫困是与盛行腐败、欺骗、虚伪、吸鸦片和迷信同时并存的。

这种腐败，部分是由于伊朗人软弱和愚昧，但是它首先来源于波斯当局的无能，封建贵族的自私自利以及外国殖民主义者蓄意所为。许多英国人忆及纳狄尔，他们都惧怕伊朗人。同时，他们要在俄国和印度之间建立一个无人地带。象一个失去一切希望的罪人，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等待着致命的一击，无论拳头是来自北方；还是南方都无关紧要。就在这一时刻，一个强有力的人站了出来：我的父亲。

## 五、我的父亲

当英国和俄国签订瓜分伊朗的1907年条约时，我父亲年近30岁。他堪称一个伟人，受到在他手下服役的伊朗哥萨克派士兵们的爱戴，并且使在乡村作恶多端、受雇于大地主的土匪头子们惊恐不安。家父是位传奇式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说故事数不胜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声望已誉满全国；他的绰号为礼萨·马克沁，这是对他使用这种老式机枪英勇作战的赞颂，当时我国仅有5、6挺这样的机枪。有一张当时的照片，他站在被敌人子弹刚刚击毁的马克沁机枪后边。但是，不论是马克沁机枪还是父亲的名望都不能使他有所作为，1915年他只能极度痛苦地看着波斯一方面成为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战场，另一方面成为英国人和俄国人的战场。我们的人民成为不能主宰自己历史的旁观者。

1919年，英-伊条约之后形势日趋恶化。实际上，英-伊条约把伊朗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同时，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北部省份鼓噪一时，他们好象马上就要宣告成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那个时期，家父和他的哥萨克族生活在战场上，以图保持残留下来的已经四分五裂的秩序。事实上已没有多少秩序可言。这是民族垂危的时刻，中央政府已经瘫痪；而强盗头子分别占据了我们的国家。当时同现在一样，伊朗没有法律，没有秩序，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愚昧无知和唯利是图的

神职人员行使司法权，他们同匪徒们“共同承担”这项任务，匪徒们的法庭迅速严厉地惩处伊朗人。然而，由于强加在波斯头上的一系列战后条约，它们对外国人，即便是公认的罪犯都免于起诉。夜晚，除了生病急诊，没有人出门；而医生又是常常找不到的。这种情况在德黑兰也是如此。人们在街头巷尾遭抢劫或被暗杀。

交通几乎陷入瘫痪。由于公路上有匪徒出没。德黑兰的旅客要取道俄国到东北部的迈谢德去。那些出差西南去胡齐斯坦省的人要绕道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

有个时候，我国明显的衰败使我的父亲义愤填膺和奋不顾身，他宁愿面对敌人的炮火。一次他率领士兵北上与一伙匪徒作战，他骑上大白马，飞马直取敌阵。起初，匪徒们对这个身材魁梧的白马勇士突如其来吓得一跳，愕然不知所措，当他们想到开枪的时候，他们却无的放矢地乱放一通。结果，我父亲策马穿过火力网而未受伤害。

或许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1919年10月26日，当我父亲刚刚从北方打了胜仗回来不久，我和我的孪生妹妹出生了。礼萨·汗与死神无缘，并有幸得到儿子和继承人，他决定活下去并继续战斗。首先，他策划把那些名义上是“白俄”的所有俄国官员革了职。之后，他把伊朗哥萨克旅掌握在手，1920年8月他指挥的军队达2,500人。至此，伊朗的形势已经更加恶化。礼萨·汗认识到对他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决定采取行动。

在自由派和民主派团体的支持下，1921年初，他率领1,200名骑兵离开加兹温司令部向德黑兰进军。他的哥萨克士兵包围了首都，1921年2月21日，礼萨·汗迫使统治者艾哈迈德王任命了新政府。政变进行得非常迅速，伤亡极小，据

说英军驻波斯的司令官艾恩赛得将军对他的朋友们说“礼萨·汗是唯一能够拯救伊朗的人”。

家父的一位同盟者赛义德·焦尔丁·塔巴塔巴依是一位年轻的政治记者。他是一个革命者，当我父亲运筹军事行动之时，他已作好充分准备对首都施加政治压力。焦尔丁出任首相，我父亲担任国防大臣。焦尔丁是个激进的改良主义者，他不可能实施他的任何计划。加上他日益亲英的倾向，仅仅3个月后，他不得不辞职，离开祖国。顺便提一下，直到1941年我父亲被流放以前，赛义德一直呆在国外。之后，他回国组织了一个反对党（民族意志党），这件事并未妨碍我们后来成为朋友。

焦尔丁离去后，我父亲劝说艾哈迈德王组织新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我父亲仍留任国防大臣。这届政府一上任，国王就去欧洲长期居住了。1923年，为了把我们四分五裂的国家更好地团结在一起，礼萨出任首相。当时，他没有废黜国王的意图。相反，他一再请求国王回国，当他终于同意回国时，家父亲临波斯湾的普什尔港迎接。但是，艾哈迈德王软弱，无心视事，并急于回欧洲去。当他再次离开祖国去法国时——他后来在那里去世——我父亲认识到折衷办法不足取，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元首是不能容忍的。

礼萨·汗受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实行改革的极大影响，长期以来，他就希望仿效邻国的成就，把伊朗变为一个现代化共和国。然而，所有努力都遭到神职人员、政治家和商人的极力反对，因为波斯与土耳其不同，是一个帝国，只有君王才能把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阿塞拜疆人、俾路支人和其它不同民族团结起来。于是，1925年10月31日，议会投票废止恺加王朝。接着又举行

了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有着2,500年历史的波斯王冠交给了总司令礼萨·汗,当时反对他的只有4票。

国王的桂冠使他有可能以更大的热情推行自1921年政变以后开始的改革。他做得怎样,他效仿的人阿塔图尔克对他有多么钦佩,这一点在加冕典礼之后几年他对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时恰好得到了证实,仪仗队的队长在他面前行了跪礼。政变后的第一步就是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取消以前各项条约的特权和条件。与此同时,宣布废除了从未被国会批准的1919年英-伊条约。这两个举动削弱了外国势力,并对伊朗政府的行动也产生了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他重建了国内团结和排除了外国对伊朗内部事务的干涉。例如,英国向一些部落首领出售英-伊石油公司的股份,作为交换,首领们同意在产油区维持法律和秩序。这明显地为英国的控制提供了良机。我的父亲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买下了所有公开发行并出售的股份并在国家的中部、南部和西南部一个接一个地制服了各个部落。

然而,他把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列为优先事项的首位。在进军德黑兰之后,他抱怨说:“但愿我有1,000支同样口径的枪就好了。”他指的是步枪而不是野战炮。他知道没有充足的武装力量,是不能持久维持国家统一的。在20年代,他把我们的武装部队扩大为一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一支公路特别巡逻队。此外,还在沿战略公路的各十字路口建造了碉堡。安全通行是国家统一的基本前提。此后,他建立了一支海军和一支空军。军官来自法国,伊朗的军校学员派往圣西尔,索米尔和圣梅克桑接受军官训练。后来,我得到了在圣西尔受过训的军官的指导。



他发动了一场快速工业化计划，开始在国内生产一些基本产品。虽然他考虑要实行农业改革计划，但却没有时间付诸实施。这项计划留给了我，在60年代，我开始了白色革命。

外国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垄断逐步被打破了，尽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利时掌管我们的关税机构，攫取了我们用以支付外债的全部税收。瑞典人掌管警察部队；我们的银行掌握在俄国人、英国人和土耳其人手里。英国人印制和发行我们的货币以及占有电报系统。我父亲大胆发行了波斯自己的货币。他以黄金和王室的珠宝作为后盾发行了新钞票，这些最珍贵的珠宝是纳狄尔王在印度打仗时的战利品。

英国王室拥有“光山”钻石，而我们拥有“光海”钻石，这或许是颗更加美丽的宝石。这颗大宝石同王室的其他珍宝一起保存在中央银行的保管库里。保管库的其它金库里也装满了珍珠和财宝。我们王朝总是用收到的礼品和买来的宝石充实这一财富。我们一直认为这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今天当有人有意识地从伊朗人的思想中抹去礼萨王的成就的时候，这一点值得一提。

在我被废黜之后，那些15、16岁的闹事者们在各城镇推倒了我父亲的塑像，他们对我父亲有什么了解呢？他白手起家建立了我们的国家——他建起了城市、学校、第一所大学、医院、工厂、公路、港口和第一座电站——这些所谓的革命者好象把这些事都置之脑后了。他是在发行自己的货币之前开始做所有这些事情的。这表明了他的勇气和决心。当1927年他开始修建横贯伊朗连接里海和波斯湾的铁路时，这两种品质再一次表现了出来。一千英里长的铁路于1938年竣

工。1932年，他第一次反抗国际石油列强，他取消了早在1901年给予达西的英-伊石油公司的特权，然后与英国达成一项新的交易。在他1921年执政时，伊朗石油产量仅为230万吨。到1938年产量上升到1,030万吨(后来石油产量猛增，与1977年的3亿吨相比，它当然相形见绌)。

1926年4月25日，为我父亲举行了加冕仪式，新国王号称礼萨·沙阿·巴列维。巴列维这个名字在我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这是萨珊王朝国王们口头和书面用的正式名字。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家姓，我又传给我的孩子们。在加冕仪式上，仅有7岁的我被宣布为王储和王位继承人。

我父亲深切真诚地爱着我们。他一共有11个孩子，一些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尽管我们敬畏他，但是我们对他的爱却充满着敬慕之情。他的肩膀宽阔，身材高大，有着一副突出和严峻的仪表，然而正是他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双眼睛可以使一个强健的人从内心感到不知所措。实际上，我什么话都敢向他诉说，他不会责怪和训斥我。但那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这样的。他是一位有权威和令人生畏的人，人们很难揣摩到他粗犷的骑兵外表里面隐藏着一副好心肠。甚至他的敌人都认识到，他是几世纪来真主派往人间拯救一个民族使它不致消亡的人中的一个。

他热情奔放，有决断力，这是他战胜王朝面临的重重困难所必需的品质。他是个文盲，不得不自学文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并不觉得从头学起难为情。每天，当履行了军事职责之后，他就坐在军营的书房里耐心地学习文化，有一位朋友专门帮助他。他在微弱的灯光下做功课，疲倦了就走出小房间，站在那里凝视德黑兰远处的烁烁亮光。他确实是靠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他的国家也同他一起站立了起来。作

为一个国王，他时时刻刻都和臣民在一起。他视察所有一切，而不仅仅是军队。我有时认为他甚至要查看堆放在一起的每一块石头。他不用东方君主的服饰打扮自己。相反，他把履行国王的职责视为服一种兵役。

他睡地铺，每天早上5点起床，7点半就看完一天的报告并开始接待来访的人。当时我还年轻，我每天上午11点左右去他的书房交谈约半小时，讨论国家存在的问题和我们感兴趣的事情。然后，11点半左右，我们全家一起共进午餐，午饭后，我父亲去休息。下午约两点，他便开始下午的工作，主要是视察部队和新的民事工程和机构。大臣委员会，现称内阁，经常在下午会议，他都要出席。之后，从6点到8点，他在做完所有工作之后，便研究一天来收到的各种报告。他8点整用晚餐，10点就寝。然而，他常常说，即便躺在床上，他也总是在反复考虑和制定计划。因此，可以说，他从来就不闲着。

除了与家人在一起消遣休息外，家父没有时间参加娱乐活动。一年有一、两次外出打猎两、三个小时。他主要是靠散步锻炼身体。在我的记忆中，他好象总是在走路，不是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就是步行去视察部队或工程，或者傍晚在花园里长时间地散步。散步时，他经常与人交谈，在这种情况下，来的人也要同他一起走来走去。无论何时，只要礼萨王在走路，他同时也在思考。

他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我国的工业和军事现代化，他对社会改革也很感兴趣。1926年和1927年年间，他模仿法国实行了一种司法制度。尽管我们缺乏能胜任的教师，但他仍然推行了义务和普通初等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他限制了神职人员宗教法庭的法律权限。

应当重视这一发展，后来在整个伊斯兰近东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我父亲建立和我发展的现政权剥夺了神职人员以往享有的大部分特权，这部分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什叶派的某些教士最初求助于古代有关权利实质的政治论点，认为一切世俗政权一定会被取代。其实他们本应利用形势来发展他们的精神生活，增加和扩大他们的道德和文明的影响。

必须承认，假如我父亲没有限制某些神职人员的政治努力，那么他的工作要困难得多。伊朗要成为现代国家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我父亲不太尊重某些特别狂热的教派统治者，有人非常错误地说，他不信教。事实上，他同我一样是虔诚的信徒，他的信仰是一个勇敢的和诚实的人所具有的信仰。

教士们的精神权威是无可否认和无人否认的。精神道德高于世俗道德是不容置疑的和无人置疑的。这是一个把伊朗带入20世纪的问题，而今天的努力却是使历史的车轮倒转。礼萨王断言，在20世纪，一个民族生存在愚昧无知之中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精神应该超出和高于政治和经济而存在。礼萨王是非常虔诚的信徒以至于不能把上帝当成某种超然的选举代理人或油田的总工程师。

他将所有的儿子都命名为伊玛姆·礼萨\*，只用教名来区别他们，因为他特别崇拜我们的圣人阿里\*\*相传来的这一称号。礼萨王经常去迈谢德朝觐伊玛姆·礼萨圣陵。礼萨王登基时，伊玛姆·礼萨基金会已无人问津并债务累累。礼萨恢复

---

\* 伊玛姆为历史上伊斯兰教国家元首哈里发的别称。又是什叶派拥戴的政治首领。——译注

\*\* 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四代哈里发和其后什叶教所宗奉的第一代伊玛姆。——译注

基金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基金会是创建的一个宗教机构，繁荣时期，它接受出于宗教或慈善目的而遗赠的土地和金钱。通常是由在位国王担任基金会的管理人或会长，但是，各个软弱的统治者使伊玛姆·礼萨基金会象国家的其它地方一样陷入了凄凉的境地。我父亲把这些纠正过来，使基金会在崭新的道路上前进。（或许应当说明一下，伊玛姆·礼萨基金会与我和我的家族在较晚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巴列维基金会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位时，伊玛姆·礼萨基金会是伊斯兰世界里最重要和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教徒们的赠礼，其中也有我自己的，已经把该基金会变成一个非同一般宗教联合体。它拥有工厂、机械化的农业合作社、医院和大量的慈善组织。顺便说一句，我还帮助恢复和装修了伊朗和外国许多纪念碑和清真寺。众所周知，对基金会的捐赠不会再恢复了。现在自命的德黑兰新政府已经将它们没收了。

我父亲也同样小心翼翼地不使我们的宗教受到偏狭的唯物主义宣传的影响。唯物主义要求“把清真寺夷为平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那些顽固地过着陈旧生活的宗教信徒们的一切主张。

当时，他决定公民应放弃东方服饰——肥大的裤子、头巾和帽子。一些人并不同意。当要求妇女抛弃黑面纱时，“出于好意采取”的措施遭到部分神职人员的激烈反对，我毫不妥协。在我执政期间，妇女和姑娘们戴不戴面纱要完全由她们自己决定。

我父亲在改革中削弱了神职人员非宗教事务方面的权力。因此，从1926年起，一部分教会统治集团成员公开反对改革也反对把伊朗建成为现代国家。1952年-1953年的起

义，1963年和1978年-1979年期间，再度出现了反对改革的浪潮。

由于家父做出了榜样，使我在年幼的时候便懂得了祈祷的力量，它决不仅仅是背诵教义条文。

许多编年史多多少少准确地描述过我童年的情况。在我父亲加冕典礼后不久，我患伤寒病倒了，在死亡线上我挣扎了好几个星期。大家担心出现最坏的事情。有一天夜里，我在梦里看到了阿里·在我们的宗教里，阿里是穆罕默德的主要代理人（很象基督教里耶稣基督的主要门徒圣彼得）。

我梦见阿里拿着那把著名的，经常在他画像中佩带的双峰剑。他跪在地上，手里端着一个装满液汁的碗。他让我把它喝下去，我照办了。第二天，我不再发烧了，身体开始恢复。

之后不久的一个夏日里，在到山区圣地伊玛姆扎迪·达乌德朝圣的途中，我从马上摔下来撞在岩石上昏过去了。大家以为我会摔死，然而我连皮都没有划破一点。当我从马上摔下来的一瞬间，我有一个幻觉，好象我们的一个圣人阿拔斯将我托住了。

在这个梦和幻觉之后不久，在希姆兰皇宫附近又出现过一次幽灵，它是穆罕默德的后代伊玛姆，根据我们的信仰，他一定会在地球上再现以拯救世界。梦境、幻觉、幽灵；西方读者可能认为这些都是虚幻而不相信，或者从心理学上作出一些解释。然而请记住，一种对非物质东西的信仰常常是东方各国人民的特点。我发现，许多西方人也是如此。

在我摆脱了童年幻想（某些读者也许认为这样称它更适宜）之后很久又发生了四件事，它们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

始终坚持童年的信仰。

第一件是1948年的一次飞机事故。我驾驶着一架虎蛾飞机在伊斯法罕附近飞行，那里正在修建一座水坝。一位骑兵军官，即伊斯法罕师的将军和我在一起。在飞行途中，我的发动机突然熄火了。我们不得不在山区山石林立的深谷里强行着陆。

每一个飞行员都知道，飞机有失速速度，一旦低于这个速度飞机就将打转儿。由于发动机已经熄火，我既不能减速，也不能在狭窄的深谷里活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持速度就地降落。就在我们触地之前，我拉起操纵杆使飞机的机头跷起，防止机头与正前方的一块巨岩相撞。飞机的速度仅能越过这个障碍，却无法飞过巨岩上面的一块大石头。当我们和石头相撞时，飞机的起落架整个撞下来了，但它减缓了飞机的速度。飞机开始用机身在布满乱石的地面上滑行。不一会螺旋桨就碰在一块巨石上，于是飞机缓缓地、不慌不忙地来了个倒栽葱，机身底部仰面朝天，停了下来。我们在敞开的座舱里被座位上的安全带悬吊着，没有人受伤，顶多是划破了一点皮。我记得，当时的场面太有趣了，我忍不住大声笑起来，但是我那位倒拴着的同伴并不认为有什么可笑。

另一架飞机一直尾随着我们，它降落在村庄的后面。与此同时，那些前来迎接我们的随行人员乘车赶到。他们多少有些惊慌。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连忙说：“哎，现在我要乘另一架飞机继续走！”我被那些极力反对的将军们包围着。他们看到我没有让步的意思，便躺倒在飞机前面：“不，陛下，你不能走！”

这样，我乘小轿车结束了我的旅程。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按时到达了伊斯法罕，没有耽误事。

又一次，同样的事故降临在我的头上。我驾驶飞机进入了一个极其狭窄的山谷。我突然意识到，穿过山口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在仪表表明我们正在失去速度的时候，我被迫转了半圈儿，并试图使飞机恢复正常，这时飞机的机翼成了垂直状，离地面仅有几米的距离，这样做出于一切意料之外，违抗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空气动力学规律。在做这个令人绝望的动作时，死神正等我们。按常理，我们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的。

和我在一起的年轻飞行员非常惊讶我们两个人竟活着着了陆。这时，这位飞行员想就地显示一下他的才能。我知道，他不愿意别人超过自己。他要在空中翻跟头，掠着地面再翻上天空并且在完成他的空中特技之前校正好飞机。

由于我知道他完全有能力完成难度这样大的飞行，因此我同意了。当机头朝下飞行时，不幸他未能把正飞机，飞机在我眼前坠毁了。如此残酷的命运再一次使我得出结论，我还没有到该见真主的时候。

1949年2月4日企图谋杀我的事件又一次使我相信我是受到保佑的。那天，中午刚过，我去参加德黑兰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庆仪式。我身着制服准备主持授予学位仪式。

三点刚过，我走上前站在官员队伍的最前面。当摄影师们集中准备拍照时，只见一个男子拨开人群向我冲来。在距离我不到10英尺的地方，他举枪朝我射击。三颗子弹飕飕地穿透我的帽子，帽子掉了却没有碰到我一根头发。第四颗子弹从面颊和鼻子底下穿过，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当他开第五枪时，我本能地感到这颗子弹对准的是我的心脏。霎那间，我稍稍挪动了一下身体，子弹打中我的肩膀。只剩下一颗子弹，可是刺客的枪卡壳了。尽管血流满脸，但我的敌手



后来还说，他用的是棉花子弹。

不幸的是，名叫法赫尔·阿尔艾的刺客当场被击毙。或许为了某些人的利益，他们不让他受到审问。很奇怪，我们发现的有关他的一点儿情况不足以能弄清楚要致他于死地的动机。阿尔艾加入了一个由最落后的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极端保守的宗教组织。我们还在他家中发现了与人民党即伊朗共产党有关的共产主义宣传品和小册子。不论是否有意义，人民党正好在图谋暗杀我的同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且还有第三条线索：阿尔艾的情妇是英国大使馆花匠的女儿。

英国人参与了一些奇特的事情。在他们想控制的国家里，他们总是有兴趣与各种团体建立联系，他们长期牢牢地控制着伊朗。毫无疑问，伦敦在各个方面都与人民党有联系，当然英国与我国最反动的神职人员也有联系。谋杀案发生在30年以前，然而，我不得不怀疑我是否在法赫尔·阿尔艾身上看到了后来的“伊斯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道火光。诚然，这两个概念是势不两立的——除非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并不理解自己的宗教，或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歪曲它。阿尔艾看来不是一个聪明人，他很可能是听信了狡猾的英国宣传而混淆了两种对立的概念。他可能是在这个使馆里接受的这种宣传。

我说过，所有这一切都是推测，但对我来说都是有说服力的推测。我垮台的根源很深而且是多方面的。1949年，我宣布修改宪法，使国王有权解散议会。这将摧毁当时统治伊朗的议会，大大加强王室的权力。这是英国绝不愿意的。英国的政策需要一个顺从的国王。

第四件事发生在许多年以后的1965年4月10日。一个手持机枪的士兵冲入大理石宫。当枪击开始的时候，我在二楼

的书房里工作。由于大厅里机枪声的回音，我以为大概有上千支步枪在开火。那些日子，我的书房里没放武器。于是我只好站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一颗子弹直穿过我书房的门差一点击中我。突然，射击停止了。当我打开门时，我看见了我的两个便衣警卫和这名刺客倒在地板上死了。一个花匠和一个男仆也在混乱中受了伤。根据对这次暗杀的调查获悉，有两个知识分子和这个士兵参与了这一阴谋。两名知识分子获得宽恕。结果其中一人成为了我的忠实支持者，后来他受聘在我的政府的电视部工作。令人悲痛的是，1979年他被霍梅尼先生杀害了。

这些暗杀企图的不可思议的失败再一次向我证明，我的生命是受保佑的。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只有“命中注定的事情”才能实现。

我的信仰常常支配着我的为人和作为国家元首的行为。我认为我始终在捍卫我们的信仰。无神论者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当政期间我经常注意，使我多年献身的白色革命在各方面都符合伊斯兰原则。

我认为，伊斯兰的精髓是公正。当我宣布法令和进行组织工作，以实现全国的、各宗教间的团结时，当我们的白色革命取消了特权和对财产和收入实行更公平的再分配时，我认为我是遵循古兰经的。

在我看来，宗教信仰是一切社会阶层精神生活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这个，一切社会，不管物质上多么先进，也将步入歧途。真正的信仰是健全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最有力的保证。就人而言，它是防止人生沉沦的高尚保障；就国家而言，它是最强有力的精神卫士。

我们的人民有机会生活在可能是最进步的宗教原则的旗

帜下面：我指的是伊斯兰的神圣原则，伊斯兰在个人和社会进步的每一个阶段都标明前进的道路。所有参加过我们的革命并相信它的人都应当引以为自豪，即革命是受到伊斯兰基本精神指引的。

我要使这种精神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的心中，这种愿望并不怀有对其它宗教的任何敌意。相反，历史总有一天将证明，我的王朝的一个特点是宽容大度。伊朗自从居鲁士时代以来一直是难民的家园——但中央政府在內讧中倒台的困难时期除外。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十分尊重所有住在我国信奉其它宗教的人，因为他们是伊朗社会的一部分，因为所有信仰都应得到人们的尊重。

## 六、年轻人

我6岁时托付给法国家庭女教师阿尔法女士照顾。她与一个伊朗人结了婚。由于她的辅导，我能够象使用本国语言一样，用法语说话和阅读，并对西方文化发生了兴趣。她对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极端愤恨，常常听到她激烈地指责可鄙的“德国佬”，在这方面我受到了她的一些影响。

在她的教导下，我开始幻想一些一般不是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所幻想的事情。当时，我已经知道我要过一种不是普通孩子能过的生活。我梦想要使我国的农民生活幸福，并要使每一个人受到公正的法律待遇。我一直怀有这些愿望。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在很大程度上竭力实现这些愿望。

虽然我父亲在改善伊朗的教育制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伊朗有许多富家子弟都到国外去读书。1931年5月，我从德黑兰初级军事学校毕业之后，礼萨王把我和我的弟弟阿里·礼萨一起送往国外接受第一流正规教育。1931年，我们在里海的一个小港口巴列维港乘船到俄国巴库。从巴库再乘火车穿过苏联和欧洲到洛桑。这在当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对孩子们来说更是令人激动不已。

我父亲还送了一些男孩儿同我们一起去，他怕我们脱离自己国家的人民。其中有个孩子叫侯赛因·菲尔杜斯特。我在宫廷时就认识他，当时我们都只有6岁。他后来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和顾问之一，但最后却背叛了我。现在他是霍梅尼

的秘密组织萨瓦克的头头。我父亲宫廷大臣的儿子迈赫尔普尔·帖木尔塔什也同我们一起学习，后来由于他父亲失宠，我的朋友只好离开学校。

在瑞士的第一年，我们是在洛桑的新学校里渡过的，后来转到勒罗赛学校，这是专门收世界上最富有家庭子弟就读的一所瑞士贵族子弟学校。由于我童年时期受过阿尔法女士的训练，我很容易就适应了瑞士的生活，这并不是为奇。我是我同龄孩子中学习较好的，我掌握法语的能力达到了勒罗赛的标准。总的说来，其后4年是愉快和富有成效的。我学的是理科课程，而不是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且大部分课程都学得很好。我最喜欢历史、地理和理科，尽管我的几何并不强。每次数学老师走进教室时，我和大部分孩子都吓得要命。然而回想起来，我总把他当作一位非常好的人记在心上。他的夫人是位作家，对我非常友好。

我的社交生活相当丰富多采，但是我还是愿意和大一点的孩子交朋友。我在同学中很受欢迎，由于我总给他们吃阿月浑子，他们就更加喜欢我，我房间里经常藏有这种果子。后来，在我就读的最后两年，我的几个弟弟也来到了勒罗赛。

从知识上说，我受的教育使我更加喜欢历史和在上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伟人。例如，我敬仰国王查理五世，他在建立欧洲最杰出的步兵部队中显示出了军事才能，他给西班牙也带来了显赫的声望和力量。彼得大帝统一了俄国，尽管我认为他取得这一成就牺牲的人太多，但我认为他的功绩是令人神往的。叶卡特琳娜女皇继续了彼得大帝开创的事业。当然，法国人与我的思想最接近。我敬仰象亨利四世和太阳王路易十四这样伟大的法国统治者，而最钦佩的还是拿破仑，

他是一位真正非凡的领袖。我研究了曾经辅助和指导他们国王的红衣主教的历史，对他们我有很大保留意见。我不能想象孔雀王朝能忍受一个里舍利厄或者一个马扎兰\*。我一想到用神职人员做顾问，尤其是看到今天的所谓伊斯兰共和国造成的后果，就不寒而栗。

1936年，当我17岁时，我五年来第一次回到了祖国伊朗。我好象是在访问一个陌生的国家。什么也认不出来了。沉睡的港口城市巴列维变成了现代化的西方城市。我父亲把德黑兰的老城墙推掉了。路面铺上了柏油。这座城市开始换上欧洲首都的容颜和风格。我乍一看仿佛是在梦中。我父亲来接我，我们乘坐一辆敞篷车穿过城市的街道。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站在路旁挥舞鲜花。一束盛开的鲜花扔到了我的脸上，我父亲的脸也被花击中。欢迎的声势浩大，无疑是我一生中最感人的一次经历。然而，我没有时间回味这种欢迎的场面，也没有时间深入思考在我身边蓬勃兴起的这个新的伊朗。父亲把我送进了我们的军事学校，在那里，曾在圣西尔受过训的伊朗和法国军官指导我学习。

1938年春，我作为少尉毕业了，接着就担任了一陆军监察官。我与父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和他在一起，学到了许多治国方法和一个国王应有的实际经验。不久，我便成为王宫里唯一能够向他阐述意见的人，哪怕我的意见与他本人的意见是矛盾的也没有关系。我们经常辩论土地改革问题。尽管我的看法还不成熟，但我清楚，我们必须改善农民的命运，必须从上边来改善。当时我有一个延长

---

\* 里舍利厄（1585-1642）和马扎兰（1602-1661）都是罗马天主教的红衣主教，先后都任过法国国王路易八世的首相。——译注

偿付债务的计划，在几年之内农民不向地主还债，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这些钱盖房子和买牲畜。总之，我希望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对于父亲买下大片土地，我感到很不安。有一天，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解释说，他是在我国边界一带购买土地，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问题。尽管他想使农民生活得更好一些，但是他知道这将需要时间，而国家安全必须摆在首位。

我父亲经常带我到全国各地去视察。他希望我了解祖国和知道如何治理它。我研究了他作为军事首领的作用，尤其是牢牢记住了他描述我国1915年至1921年发生的混乱可怕情况。他对国际政治及其在伊朗的应用有一种神秘的理解。在30年代后期，他意识到会爆发战争。他担心在伊朗军队具备抵御来犯者保卫我们中立地位的能力之前战争就会爆发。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39年9月1日，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有效防御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有人捏造了许多有关我父亲敬佩希特勒和德国人的谎言。英国和俄国当然要利用所谓的我国与第三帝国的联系作为1941年入侵我国的借口。这些至今还当作事实写入他们的历史书中。这不是事实，而是谎言。我父亲从一开始就不信任希特勒，别的原因且不说，仅有一点，他作为一个富有权威的统治者，对另一个统治者使用如此残酷的方法进行统治就深表怀疑。而且他从现代历史中已经有所领悟：20年代后期他到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他的东道主向他生动地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与德国结盟时期土耳其在德国铁蹄下生活的情况。当时柏林主宰土耳其的生活，德国人根本看不起土耳其人。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现在他对德国人的意图也极其怀疑。确实，我们雇用了一些德国技术人

员，但是这与政治无关。他们只不过是工作相当出色，对我们的现代化运动至关重要而已——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在白色革命中利用德国技术专长与那时候的情况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战争一开始，我父亲就宣布伊朗中立，并且希望取得最好的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的几年里，好象我们也许能幸免。在轴心国1941年4月入侵巴尔干以及德国军队逼近保加利亚边境之后，这种希望开始破灭。1941年6月22日纳粹入侵俄国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凶兆。我父亲立即以强硬的言辞重申伊朗的中立。

然而历史和地理位置又一次和我们作对。希特勒在东方的闪电战威胁要在几个月之内征服俄国。显然，如果没有盟国的支持，苏联人无法在德国的猛攻面前生存下来。尽管可以从遥远的北面通过摩尔曼斯克海运物资，但是那很困难而且缓慢。由于轴心国掌握了制空权，英国船只几乎到不了埃及，那年夏天根本不可能通过地中海运送物资。即使运输船能避开希腊的德国基地，土耳其也不允许它们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如果柏林在黑海控制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海岸，情况更会如此。唯一安全和比较迅速的供应线就是通过波斯湾。因此，伊朗成为具有战略和战术重要意义的地区。

到1941年7月，我们的中立地位没有保证了。我的内兄埃及国王法鲁克（他的妹妹芙吉雅是我妻子）最早提醒我。法鲁克让他的岳父、当时驻德黑兰大使告诉我，英国军队最近的调动可能是针对伊朗的。接着，我也提醒我的父亲。礼萨王马上拍电报给驻伦敦的使节莫加达姆先生，指示他弄清伦敦的真正意图，遗憾的是，我们未得到任何答复。邱吉尔政府对征得我们同意经由伊朗运输物资一事并不感兴趣。此外，轴心



国为英国提供了进行干涉的各种借口：有报告说意大利飞机正在波斯湾周围地区轰炸，以及武装的德国商船往返于海湾水域。同时，在德黑兰，英国和俄国的使节向我父亲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最后一批德国技术人员驱逐出境。我们做好了谈判准备并且已经做了让步。显然，英国人和俄国人并不感兴趣；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横跨伊朗的铁路。于是，1941年8月23日，两国不宣而战入侵了我国。

在北面，苏联强大的摩托化部队越过阿塞拜疆边界；其它部队从东面的霍拉桑和沿边界全线向前推进。英国的5个师从东南、南面和西南面逼近。皇家空军轰炸阿瓦士、沙普尔港和霍拉姆沙赫尔等军事目标，然而轰炸避开了石油工厂。8月25日拂晓，一艘皇家海军军舰“肖拉姆”号在阿巴丹附近击沉我们的一艘护卫舰；苏联空军轰炸了大不里士、加兹温、巴列维港、拉什特和费扎杰。

我们驻莫斯科大使赛义德先生向莫洛托夫提出抗议，并质问他俄国人为什么同意参加英国唆使的反伊朗军事行动。莫洛托夫没有回答。现在我们知道了，当邱吉尔和罗斯福签订大西洋公约时就已经决定要打开伊朗通向俄国的通道。

8月28日，礼萨王命令我们的军队停止抵抗。他得到通知说，9月17日，盟军将进入我国被围困的首都。当他听说英国军队正逼近德黑兰时，他对我说：“你想我能够听从小小的英国军官的命令吗？”

他已下决心退位。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和高傲的人，他无法屈从于外国侵略者。军队已停止战斗，他的将军们已同意解散军队。他清楚，这意味着部落战争的复起，因为一旦

没有他和军队，谁能维持国家统一呢？最重要的是，他知道英国是多么地害怕和憎恨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怎能对付得了他们呢？

那时，英国仍然控制着海洋。他们占领了印度、伊拉克和大部分中东地区。他和我经常谈起英国背信弃义。他对英国人的意图产生怀疑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07年国家被瓜分的年代，他现在认为这样的事情正在重演。

9月16日，他退位了。退位令是由首相弗鲁基向议会宣读的。

我，伊朗国王承蒙真主和全国的恩准，已经作出严正的决定，退出王位，由我亲爱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

议会一致批准了此令。但是，我如何到国会去宣誓继承王位呢？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俄国和英国军队刚刚进入德黑兰。然而成群的伊朗人挤满街道，因此我顺利地进入了国会。当仪式结束时，伊朗人群情激昂，甚至要把我的汽车抬起来扛在肩上。在这种危急时刻，群众表现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王朝的忠诚使我永志不忘。

英国和俄国大使未出席仪式。英国人倾向于支持一位恺加王子，他是皇家海军的一名军官。3天之后，他们的政府才承认了我。那段时间，支持我的群众游行向他们表明，他们没有其它的选择。

占领国希望我是一个俯首听命的国家元首。在他们的想象中，摆布一个如此年轻的国王是件容易的事。他们的目的一直是如此：同1907年一样，必须使伊朗成为一个中立地区，

“保持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

我父亲希望到加拿大或拉丁美洲去，然而英国人不同意。他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囚犯，他们先把他送到印度，但在孟买却不允许上岸。显然，英国人担心国王的出现将对已经动荡不安的次大陆带来巨大影响。之后，他们决定把他送到毛里求斯岛，最后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去。在他流放期间，我得到他的最后信息是在唱片上。他说：“我的儿子，你什么也不要怕。”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当我得知他于1944年在约翰内斯堡逝世，我悲痛欲绝。我要把他的事业进行到底，以此作为对他的怀念。

在我看来，很明显，这又一次成为伊朗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正退回到1920年。但这是1941年，而我也仅有22岁。

一旦我得到民众的支持，王位坐稳之后，英国人就放弃了想把一个被废黜的恺加王朝的王子扶上台的粗略计划。之后，我着手解决由于苏-英占领伊朗而出现的大量问题。

显而易见，最紧迫的事情是与占领国签署从法律上保证伊朗继续独立存在正式协定。1942年1月，我们与英国和俄国结成了承认伊朗的主权和政治独立的三方联盟。第五条规定盟军在结束敌对行动6个月后撤离伊朗领土。第六条规定英俄两国绝对保证将来不分割这个国家。这一法律结构仅仅是我1942年至1946年为保持我国政治经济完整和统一所进行的斗争的一个开端。

对于遍布各地的黑市，我简直无能为力，这个问题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困扰着伊朗。（甚至在70年代，我仍然不得不与不法投机商和其它的那些走到经济犯罪边缘的人物作斗争。）我只能限制黑市活动，但没有希望打破它。

对伊朗经济的束缚。此外，英国和俄国不断提出要求，他们要什么就拿什么，从不考虑我们的需要，使经济进一步遭到削弱。由于受致命的黑市和占领国的要求的束缚，伊朗经济裹足不前。

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我尽力而为。例如，有一天，俄国使节带着国内指示来找我，要求拆除德黑兰的一家步枪和机关枪工厂并把设备运往俄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道。“为什么不向我们订货？我们可以按照你们的规格生产枪炮。”虽说讨价还价不容易，但我把他们顽固要求占有工厂权利同我们愿意按照“盟国的”安排进行生产两者调合起来，我终于胜利了。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盟国，伊朗已向轴心国宣战了。

然而，“同盟”地位并没有制止外国对我国事务的干涉。一天，英国大使要求我指示伊朗中央银行印制更多的钞票，以便帮助英国和俄国军队支付在当地的开支。我的政府采取了回避态度。他说，如果打破不了这种僵局，伦敦方面将对现政府失去信心。很简单，这个要求将使我们面临通货膨胀，已经承受着沉重负担的我国人民还要面临进一步的物价飞涨。我拒绝了。应该是我、议会和人民而不是英国信任伊朗的政府。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鲜明地公然拒绝一个占领国的要求，此举提高了我在国内和盟国中的地位。然而，英国人知道如何操纵伊朗的政治以及越过我有限的权威发挥作用。他们控制了议会的选举——英国人常常在上午给首相送来一份80名候选人的名单，而在下午俄国人就送来一份12人的名单，就是这样——他们得到了绝大部分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把我国经济推入了更深的困境。

英国和俄国对我们选举的干预是产生摩擦的另一个根源，并导致我第一次努力把一个后来几乎毁了我的人——穆罕默德·摩萨台弄进了我的政府。1943年我请他担任首相。我希望，象摩萨台这样的“民族主义者”领袖能有骨气改革我们的选举制度和不受外国干涉进行选举。

使我十分震惊的是，摩萨台答复说，他接受任职，但是有三个条件：

1. 如果英国人同意。
2. 如果他能每天早晨会见我并听取我的建议。
3. 如果我给他一名保镖。

我告诉他，我从来不征求英国人的意见，如果我现在这样做，那么我也得征求俄国人的意见。虽然摩萨台说，“没有英国人的同意，伊朗什么事也别想做成，”而俄国人“不算数”，我仍坚持上述立场。我派我的宫廷大臣阿拉先生去见英国人，派前哥萨克军人，亚兹丹——帕纳赫将军去见俄国人，俄国人赞成这些建议；英国人则不同意。实际上，他们的大使告诉我派去的人说，“国王正在拿他的王冠作赌注。”

当摩萨台知道我们讨论的结果后，他拒绝出任首相，而可笑的选择照样进行。虽然英国人经常奢谈民主的好处，但是却认为指挥伊朗的选举是件完全正常的事情。

摩萨台的反应并不使我吃惊，因为早在我父亲执政以前，他就在伊朗政治中发挥着作用。的确，有人说他积累财富（他是相当有钱的）要追溯到1910年前后。当时，通过英国的影响，他被恺加王朝任命为我们一个省的财政总督。据说，他利用职权盗窃了大量的钱财。另外，摩萨台还拥有大

片土地。他还做过律师，他曾在瑞士和法国就读过法律。20年代末，我父亲任命他为阿塞拜疆的省督，后来他出任驻伊拉克大使。然而，我们一直怀疑他是英国间谍，即使他后来以反英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出现，这种怀疑也未消失。无疑，我父亲早就怀疑他与英国的联系，并在1940年以间谍罪把他投入监狱。当时，摩萨台的朋友极力要我为他说情，我听了他们的话，他获释了。当时他说我救了他的性命，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背叛了我。

1943年11月，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召开了一次战时重要会议，在德黑兰作出了许多有关战争和战后问题的重要决定。诚然，我们对选中德黑兰为会址深感荣幸，虽然我们也明白作这种选择的理由：当时罗斯福和邱吉尔已经到了开罗，德黑兰距离斯大林的格鲁吉亚的老家不太远。

一年前，邱吉尔去莫斯科途中在德黑兰停留时，我与他见过面。我们在花园里共进午餐，他和我谈起无线电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用它作为治国的工具。实际上，他鼓励我在伊朗建立一个自己的无线电广播网。我们还花了一些时间讨论这场战争。尽管我很年轻，我还是谈了我对政治和军事问题的看法。我认为，盟国应该从南面进攻欧洲，也就是说从最薄弱的环节进攻，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是最理想的目标。他靠在椅子上，用他那总是倔强的目光，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当我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我结束谈话后，他未做任何评论。许多年之后，当我读到他的回忆录时，我注意到那天下午我在德黑兰发表的见解和他的见解一致。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邱吉尔住在英国大使馆，距离斯大

林和罗斯福下榻的俄国院子只有几百码远。虽然按理说我是会议的东道主，但是三巨头却不把我放在眼里。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必竟是法国人所说的那种“无足轻重的人”，而我当时仅仅是个24岁的国王。无论是邱吉尔还是罗斯福都不屑按照国际礼仪的惯例拜访我这个主人。相反，我都到他们的大使馆官邸礼节性地拜会了他们两人。邱吉尔回到伦敦后在下议院谈到我时确实讲了一些好话，但我们在会见时仅仅谈了一些一般性的事情。

那年罗斯福处在权利的顶峰时期。当我听到这位随和的人物要求我让他在总统任职期满时在伊朗当一名森林专家的时候，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吃惊。这样的要求意味着什么？难道罗斯福认为伊朗的未来已经有了保障，所以他可以考虑诸如重新造林这类将来的问题了吗？

我对邱吉尔和罗斯福的拜访是例行公事和毫无实际意义的，相比之下，斯大林和我的会见则全然不同。首先，他是与会者中唯一对我进行礼节性拜访的人，不象其他两位在使馆里召见我。另外，他是位温文尔雅，态度和蔼，谦恭的人，甚至在我用茶之前他也不动自己的杯子。最重要的是，他谈到了与伊朗有关的重要问题。

虽然我后来得知斯大林说的话是欺人之谈，但是当初我并不知道。莫洛托夫坐在他旁边，此外只有几名译员在场，他开场的第一句话是：“请不要担心未来50年的事情。”我在想，这是不是和当年沙皇给予恺加王朝的保证一样？作为一个爱国的年轻国王在看到自己国家的军队被摧毁，武器和装备被剥夺时，我急切地和他谈起我们需要飞机和坦克。

当我谈到上述要求时，他当即表示可向我提供装备一个团的坦克和一个中队的飞机，部队训练和交接方式留待以后

商谈。我非常感谢他的支持，认为这是建立我国独立和声誉的一个重要步骤。结果证明俄国人口是心非，莫斯科为取得每一个让步而拼命讨价还价，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次教训。几周后，俄国大使带来了斯大林的条件。条件十分苛刻。坦克团和飞行中队要由俄国军官指挥，至少在战争期间要这样做。坦克团要部署在“德黑兰以西的加兹温，而飞行中队则要部署在我国东北部的迈谢德。”我愤怒地拒绝了苏联的条件。莫斯科毫无迟疑地使我感到他们对此不满意。苏联电台的广播开始对我进行攻击，而伊朗的共产主义人民党的报纸也开始就外交事务的处理方面对我进行诽谤。

比起大多数政治家，我对莫斯科办事粗野、不顾一切要占上风了解得更早一些。一切都是斯大林说了算。尽管在许多事情上我反对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切。但他是一位伟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者既不是邱吉尔也不是罗斯福，尽管他们都能言善辩，而是斯大林。他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操纵了会议，他把苏联的和平强加给全世界，这种和平现在已经持续了35年。

斯大林的秘诀之一是情愿等待时机，而从不真正地后退。莫斯科在我父亲被迫退位和离开祖国的那天看到了在伊朗采取政治行动的时机。莫斯科在伊朗帮助建立了共产党分支——人民党。我说“帮助建立”是因为英国在这里也插了手，尽管对幼稚的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英—伊石油公司的一名雇员、著名的英国间谍穆斯塔发·法塔赫资助人民党的报纸《人民报》。当然，拥有宣传工具对任何一个新成立的党在政治上的成功都是事关重大的，人民党也不例外。

为什么英国人要在国外帮助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复杂。首先，英国人什么都要插一手。其次，



他们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也是，哪儿都要有他们的人，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行使某种控制权。英国人从未放弃过这一政策，至今亦如此。举个例子，看看亚丁以及在那里的共产主义的兴起吧。我想所有的工会领导人都在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受过教育。英国人认为，有了一些假装反英的人就可以使他们控制民族主义运动。

我再三对英国人讲，只需一颗子弹就可以把那些人干掉。一旦他们完蛋了，你们怎么办呢？谁还为你们监督工会呢？在亚丁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一旦英国代理人被消灭了，所有一切都落在了共产党手中。

现在回过头来说人民党，英国人认为掌握了人民党就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他们尤其希望他们的代理人能渗透到阿巴丹以及南方各炼油厂和油田的工人中去。此外，法塔赫在从事《人民报》出版工作的同时，他还担任英国武官弗雷泽将军的顾问，为撤掉我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最有实权的职务中他助了一臂之力。甚至在那些日子里，英国人还尽一切所能“剪掉我的翅膀”要控制我。

最初，人民党并没有多少影响。它仅在德黑兰经济境况不十分好的教师和产业工人中有点势力。只有个别知识分子支持它。人民党在农村和乡下未取得什么成功，只是到了战后，俄国危险地加紧干涉我国内政它们才取得了发展。

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向杜鲁门总统保证，俄国将不采取反伊朗的行动。对日战争结束6个月后，苏军将撤出这个国家。同年9月，他们在伦敦外长会议上再一次重申了这一保证。然而斯大林无意信守诺言。就在他作出许诺的时候，苏联在伊朗加剧了活动。红军部队阻止伊朗警察进入人民党力量强大的地区。阿塞拜疆和其它北方省份煽

动起了反叛和动乱。盟国努力使俄国人停止其行动证明是枉费心机。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确信伊朗将落入苏联手中，因此，他们拒绝英国提出的关于使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和胡齐斯坦成为自治省的建议。这一建议是在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由国务卿詹姆士·贝尔纳斯和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提出的。最初，斯大林接受了这项建议，但是在莫洛托夫告诉他“再等一年，我们将获得整个国家”之后，斯大林相信他的话，拒绝了西方的提议。

好几个月以来，苏联下的赌注好象会得逞。在苏联的支持下，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发生的叛乱发展扩大了。苏联部队阻止我们的纵队开入叛乱地区。在大不里士，苏联人向我们的警备司令施加压力要他向叛军投降。这名军官后来因谋反罪受审，被判处死刑。然而，我为他减了刑，因为我不能肯定他是否有办法或意志不这么干，尤其是我们的部队当时不能冲破包围圈。大不里士失守，叛乱分子宣布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两省自治。

到1946年3月2日，俄国人仍然没有任何撤退的迹象，尽管他们前一年9月在伦敦同意在这一天撤离伊朗。3月6日，杜鲁门给俄国人发了一份温和的照会。但俄国人不予理睬。紧接着又发出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3月24日，莫斯科宣布苏联军队将撤出。到了5月份，红军正式撤离了，但叛乱远未结束，我们仍需要捍卫我们的独立，尽管许多条约对此给予了保证。西部有人企图脱离中央政府，在南部，尤其是在人民党势力仍很强大的阿巴丹发生了麻烦。似乎很凑巧，其它的部落在法尔斯、设拉子地区和伊斯法罕周围起来造反了。显然，如果我们不能收拾北方省份，英国人和美国人准备占领

南方和再次瓜分伊朗。我国南方地区的骚乱证明比较容易平定，因此，我们能够迅速地把注意力转到关键的北方。

毫不奇怪，在这一时期我们与俄国的关系是紧张的。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苏联人是不是会撤军还是会转而进攻德黑兰，不知道在他们撤离德黑兰之后，是不是又会回来及何时回来支持叛乱。由于我们的对苏政策陷入僵局，我的首相易卜拉欣·哈基密辞职，他是位正直的、有着强烈亲英情绪的老人，但一直是个爱国者。他的继任人艾哈迈德·贾瓦姆以前担任过首相。我们之间的关系向来不融洽，当然在1946年也是如此。他一上任，马上就去了莫斯科。返回时带回了一项协议，规定联合勘探和开采石油，以51%和49%的比例分配，俄国人得大头。

幸运的是，这项协议需要得到议会批准，这样能够将它搁置起来。然而，贾瓦姆采取了第二个行动却是不容忽视的。他回国后不久，即开始与阿塞拜疆的叛乱者会谈。他提出的建议之一是一要求为每一个参与叛乱的军官晋升两级——比如说，把一个中尉晋升为少校——以此作为达成协议的代价。

我说，“我宁愿砍掉我的双手也不签署这样的法令。”

当时，阿塞拜疆的叛乱者的领导是一个名叫皮谢瓦里的人，我见过这个人。他曾选入我们的立法机构，但遭到议会的拒绝，原因是认为他是共产党和俄国人的傀儡。议会拒绝让他任职的行动在叛乱中被证实是明智的。现在成了一个要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了，而时间还来得及。俄国人虽然走了，但并没有忘掉他们，皮谢瓦里的叛乱者被送往苏联接受军事训练。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带着装备、专门知识和苏联顾问一起回来的。如果我们再等下去，那么我们军队将会

失败。

我的政府和大部分军事将领都强烈地建议我不要发动进攻，以免招致俄国人的干涉。甚至我的朋友美国大使乔治·艾伦也警告说，“美国百分之百地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你同俄国人打仗。”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了反对派同意我的计划。贾瓦姆解决叛乱的尝试包括让3名人民党成员进入政府。两人担任较低的职务，但有一人被任命为教育大臣，那一直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关键职务，我非常勉强地同意了。那年春天，美国对贾瓦姆的支持使我的政治地位变得复杂起来。它更限制了我在变化莫测的政治急流中驾驭形势的自由，使得罢免共产党大臣更加困难；幸运的是，他们在政府里并未呆很长的时间。有参谋长阿里·拉兹玛拉作后盾，我得到了必要的支持，其中包括最终得到了首相的支持。此外，我知道军事行动不会有那么大危险。叛乱者的装备并不比我们的好，他们没有人民广泛的支持。志愿参军的人蜂涌而来，实际上超出我们所需要的人数。我觉得，有全体人民的支持，我宁愿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而不愿做一个受人奴役和蒙受耻辱的君王。

决定一经作出，拉兹玛拉和我多次到敌人控制的地区进行侦察飞行，经常使用老式飞机，有时也用小型的双引擎比奇飞机，总是不带无线电台。当我们的部队发动进攻时，皮谢瓦里的部队被分割成三路，他们日益受到忠诚的当地百姓的骚扰。最终，他们溃散了，皮谢瓦里和他的助手逃过边界到苏联去了。

所有一切都进行得很突然，我们在德黑兰等候俄国大使的来访。就在他到来之前，我得知叛军已经溃散并逃跑了。随后，苏联大使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进来了。他要求我们

的队伍立即停止前进，他把我军的进攻说成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我拒绝了，并指出我们的军队对任何事情和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我们只不过是恢复原状和在属于我们的领土上准备大选。然后我又简单地补充说，“此外，你们必须明白，叛乱者刚刚投降了。”

这样，在20世纪妄想把伊朗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的第二次企图被挫败了。第一次是1907年8月30日的英-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和英国瓜分了我，俄国占领北方，英国占领南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礼萨王统一了伊朗，它才不再处于分裂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满足盟国的需要这种计划又复活了，这表明西方对伊朗在继续执行某种政策。1945年12月，英-美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建议就是朝那个方向迈出的另一步。斯大林的贪婪和他对我的反应的失算，我们装备低劣的士兵的战斗精神，还有我们人民对国王和祖国的忠诚，使这一计划没有取得成功。

一旦外部分裂我国的尝试被挫败，政治即被作为一种手段来摧毁我们国家。然后，贪污腐化和颠覆活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国家和伊朗人民，保持国家和人民的统一和团结是我的职责。

在我国的整个历史中，外部势力持续不断试图使用这种策略。他们唯一的目的一直是破坏伊朗的完整。这些企图曾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过——1907年和1945-1946年，但都失败了。不幸的是，今天这些企图似乎正在取得成功。

## 七、摩萨台

阿塞拜疆问题的的确确是现代中东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正是在阿塞拜疆问题上斯大林俄国首先暴露了它的战后意图。联合国安理会在戏剧性的辩论中谈到苏联在阿塞拜疆的所作所为震惊了自由世界。到这时，各地的自由人士才第一次开始领悟到共产帝国主义的威胁。

我认为，公平地说，冷战真正开始于伊朗。当然，在其它地方也有冷战的迹象，但是界线首先在这里清楚地划定了。正是在阿塞拜疆事态中，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东发挥了主导作用。阿塞拜疆直接导致了杜鲁门主义的产生，从共产帝国主义统治下拯救了希腊和土耳其。同时，它也为后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铺平了道路。

阿塞拜疆之战以后，伊朗真正的民族主义情感开始复苏。举国上下，我的人民似乎意识到发生的一切包含着更重大的意义。在全国各地，他们都想方设法表达对我的忠诚。

1947年，我来到阿塞拜疆。在这个重新统一的省份和返回德黑兰时我所受到的欢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我永远不会忘记巨大规模的欢迎队伍所表达的激情和忠诚。人群拥挤在德黑兰街头，以至于3公里的路程，我们竟然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完。

伊朗人民庆祝我们重新获得国家统一。在我们的历史上，它标志着防御阶段的结束，建设时期的开始。7月选举中艾哈迈德·贾瓦姆在议会获得了稳定多数，10月份，他采取

了行动，为排除我们行动自由的主要障碍，1946年他从莫斯科带回来了石油协定。当时他希望通过谈判和妥协能够结束阿塞拜疆的叛乱。

这个协定要求建立一个联合俄-伊石油公司，莫斯科获得公司51%的利润。幸运的是，1944年我国有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此类协议须经议会批准。这样就使我们能够合法地把这个协定拖延下来。然而，那年秋天，俄国人不能忍耐了。克里姆林宫强烈要求我国批准协定。因此，10月22日，贾瓦姆向议会详细说明了协定并建议从法律上宣布其无效。这就挫败了俄国想占领北方的计划和英国想以同样方式占领南方的计划。他的建议以109票对27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在所有人中，穆罕默德·摩萨台率先反对为加强伊朗民族利益而制定的这项法律。

法律具体规定：

1. 宣布一切有关事实上给予苏联政府石油特权的协商和谈判无效。
2. 今后，在任何情况下，伊朗政府将不同意给外国以勘探和开采石油的特权。
3. 应尽早开始与英伊石油公司谈判以使伊朗获得该公司较大份额的利润。
4. 如果在今后3年中发现新的油田，伊朗将愿意谈判向苏联出售石油。

毫不奇怪，莫斯科大为恼火，认为第四点毫无意义。形势发展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以至于俄国人威胁要断绝外交关系。我没把这一威胁当一回事。莫斯科不会轻易中断这种关系。我的判断在25年后非常清楚地得到了证实。克里姆林宫

对萨达特总统驱逐16,000名苏联军事顾问没有作出反应。对我国再次进行军事干涉的危险消除了。由于宣布了杜鲁门主义，美国在中东投入了更大的力量，美国军事保护伞扩展到了伊朗。终于，在1948年初，我们开始从美国获得“轻武器，以保卫伊朗受到威胁的安全。”

一个把伊朗引上经济发展道路的阶段开始了。石油生产是这一发展的关键。尽管人民党在油田煽动闹事，但产量仍稳步上升：1945年1,700万吨，1947年1,900万吨，1948年2,500万吨，当然，大部分用于出口。我力图制定一项七年发展计划。我们用300万美元雇了一家美国公司，即海外咨询公司，来制定计划。他们提出了一个6.56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这是一个适合农业和石油发展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费用分配如下：

用于普遍改善社会条件	28.6%
农业	25.0%
运输	23.7%
工业和采掘业	14.3%
石油工厂	4.8%
通讯	3.6%

这个预算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卫生和教育。计划在每个省都修建一座500~700张床位的医院，环境卫生要得到改善。还将修建5,000所小学，150所中等学校，26所职业学校和若干个技术中心。计划为各省新建3所大学。每年将有100万儿童和175,000成年人上学。

我们的农业要实现机械化。要修建水渠，同时还要修建



10座水坝和水电站。在工业方面，要致力于发展冶金业、纺织业、水泥生产 砖瓦厂、化学工业和采矿业。

将新建公路3,000多公里，维修现有公路6,700公里，从首都至大不里士以及迈谢德至亚兹德新铁路的建成将改善交通情况和商业往来。要发展海湾和里海的各港口，修建飞机场，还要扩大邮电、电报和电话网。

政治问题往往阻碍进步。贾瓦姆政府由于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于1947年12月10日垮台。在后来的30个月中，内阁更迭了5次。不论是首相还是议员都未表现出活力。时间在毫无结果的辩论中白白浪费了，这里辩论并未产生我们发展计划所需的资金。

1948年，我作为国王第一次出国访问。我访问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王室对我表示了极其友好的情意，这次旅行一直留在我美好的记忆之中。我和当时的外交大臣贝文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当我们谈到伊朗的自然财富时，我提到了克尔曼地区。贝文惊喜地说，“好极了，克尔曼！在我们的区域内……”我告诉他，“在我看来，伊朗的一切都是在自由国家的区域内。”贝文急忙回答道：“这恰恰就是我要说的。”

1949年2月，我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当时神秘的法赫尔·阿尔艾近距离朝我开了5枪，我仅仅面部和肩部受了伤。从政治上看，未遂的谋杀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人民党被取缔了；国王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伊朗人认识到我的死将意味着国家大乱，如同今天这样。甚至长期与王朝不和以及最后对我的倒台如此有影响的宗教团体也围绕着我的事业团结了起来。最著名的古兰经法医称我的幸存是“真正的奇迹”。由于我的政治影响加强了，议会批准实施七年发展计划。但是，

万事开头难。我们没有资金，甚至连作计划的美国人提出的2,500万美元的起始费用也没有。因此，1949年底，我第一次来到华盛顿请求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我虽然受到友好的接待，但却是两手空空地返回祖国。我失败的部分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失误。美国人认为我们处理内部事务不够果断。国民党中国最近垮台使美国决心只援助那些愿意整顿内部的国家。

我回国后以新的活力开始工作：我罢免了贪官污吏，开始实行把皇室土地分给农民的计划。我们1906年宪法长期存在的缺陷需要修正。这部宪法的首要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度。遗憾的是，它的许多条款从未付诸实施。因此，到我继位时，我的政府象一个寡头独裁政府；没有成立参议院；议员能够控制选举，并且永远自己掌权。1949年，参议院产生了，并于1950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随后，我们修改了宪法，给国王以解散议会和下令进行新选举的权利。这就使我们能够打破寡头独裁统治。1950年6月，我任命长期担任参谋长的阿里·拉兹玛拉将军为首相，他谈判的第一个协定是美国向我们提供数量有限的援助。援助并不多：一部分四点计划的资金，一小笔进出口银行的贷款。这些钱与我们计划所需的资金相差很远。缺乏资金确实使大部分计划处于停顿状态。我们的美国经济顾问回国了。渐渐地，由于经济停滞，人民普遍不满。我们争取石油开采税更大分成而与英-伊石油公司的谈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人民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这就为穆罕默德·摩萨台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令人不快的是，拉兹玛拉没有象我希望的那样行使首相职责。他不能或未能与英-伊石油公司达成协议。他在议会的表现糟糕透了。他不能清楚地阐述政府的主张，许多人认为他是一

个无能的议员。与此同时，摩萨台作为一个使听众入迷的演说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个职业表演家，建立起了自己的威信。如果拉兹玛拉更精明些，摩萨台决不会达到他的顶峰。

摩萨台，一个演说家，很难说是一位政治家，因为，他的言行总是互相矛盾，另外，他可以当着人们的面情绪一下子从得意忘形突然变成十分消沉。他对自己的任何看法，都深信不疑，讲述时声泪俱下歇斯底里。他经常犯“外交”病，做又可怕又可笑的表演突然惊呼，“我要死了……”。他昏厥的老毛病已传为笑柄，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事：有一次，他昏倒在地，医生解开他的内衣进行检查，发现摩萨台的手没有捂在心口上，而是抓住自己的钱包。有人把他比作罗伯斯比尔和里恩齐\*，也许最恰当的是意大利喜剧中的一个角色。

他一再要求石油国有化，使人民长期以来对外国控制所怀有的反感变得怒不可遏。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他没有分歧。但是我清楚，如果要真正起作用，实行国有化必须同时或者事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很难达成协议。英-伊石油公司不同意象美国石油公司与沙特阿拉伯那样对半分石油开采税。

1951年3月7日，当拉兹玛拉在大清真寺作礼拜时，他被伊斯兰突击队这个极右恐怖组织的成员暗杀了。我不能肯定，但我的印象是，拉兹玛拉被刺的时候，他口袋里有一份与英-伊石油公司达成的协定。即使是这样，那也太晚了。因为民众的义愤已经达到了顶点。

---

\* 罗伯斯比尔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里恩齐是14世纪一位罗马有名领袖——译注

我任命侯赛因·阿拉为首相，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遗憾的是，利用他的温和和经验已为时太晚。3月20日，议会两院通过了要求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法律。接着街头发生了骚乱，要求立即接管设施。不久，侯赛因·阿拉的地位保不住了。巨大的压力迫使我任命摩萨台取代阿拉。1951年4月28日，我屈服了，干了这件不可避免的事。

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长期以来我一直提防摩萨台刺耳的民族主义言辞和强烈的反英情绪，怀疑这两点隐盖了他明显的亲英言论。早在战争时期他就拒绝担任首相职务，后来又支持与苏联签定石油协定，这些对提高他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威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然而，他的确认为英国控制了伊朗，他的反英腔调依然如故。我对那些言辞及其政治影响感到担心。摩萨台已73岁，他一生始终追逐权力。现在他得到了权力，并要求享有绝对权力。在讨论他的任命时，我建议他要稳健和谨慎从事我说，我们实现政治和经济独立的道路困难重重，我们必须当心步伐不能太快。他答应要小心谨慎。而后来他的行动却一点也不是这么回事。

在他的授职仪式两天后，议会批准了一项法令将石油设施收归国有。我批准了并签了字，相信摩萨台现在将与英国人谈判新的解决办法。但长达两年他都拒绝这样做。英国最初的反应是敌对的。伞兵部队被派到了塞浦路斯。英国巡洋舰“毛里求斯”号甚至停泊在阿巴丹。关于海军向波斯湾调动和部队沿我们和伊拉克边界运动的谣言四起。

我对英国大使说：“你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你们进攻伊朗的话，那么我将亲自率领我的士兵走上战场。”我坚定的立场大概对战争的传说没有变成行动起了些作用。

英-伊石油公司接受了国有化的想法并愿意谈判，即使

如此摩萨台还是拒绝商谈。实际上，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所谓的斯托克斯代表团来德黑兰时，它就同意了我們多年希望的石油开采税对半分的原则。摩萨台拒绝了，他后来还拒绝了哈里曼代表团的建议以及邱吉尔、杜鲁门、世界银行、艾森豪威尔和一家独立法庭进行调解。

多年来，他的政治纲领建立在他称之为“消极平衡”的基础上，拒绝在任何事情上给予任何外国以任何特权。他希望改变现代伊朗的趋势，这一趋势是建立在“积极平衡”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给予一国的某个特权要和给予另一国的另一个特权平衡起来。虽然这条原则令人产生兴趣，但是它不能够以偏执的愤怒情绪运用到整个政治领域里。摩萨台坚持认为可以。

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伊朗石油不行，他也同样认为伊朗没有外国的帮助也能销售她的石油。他在这两点上全错了。由于摩萨台不肯让步，英-伊石油公司关了门。它不再向伊朗政府支付石油开采税；它以公司拥有大多数股份为由阻止向其它国家出售伊朗石油。这意味着差不多等于我们的全部的石油。

阿巴丹油田的生产停了下来。虽然，我们新建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拥有大量的存油，但是没有设备来运输或出售这些石油。不足为奇，我们既没有一艘油船，甚至也没有一个销售组织。英国人把这一案件提交到国际法院——在那里，英国法官投了赞成我们的票，俄国法官缺席——在法院裁定自己没有管辖权之前摩萨台就表示他不承认法院的权力。随后争执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结果同样没有得到解决。摩萨台以救世主自居和神秘的错误统治险些使伊朗再度陷入混乱和贫穷之中。

到了1952年7月，我感到我再也不能支持一个把国家引向毁灭的人物。自从国有化以来，我们未出售过石油。没有签订任何协定的指望，七年发展计划只好束之高阁。反对摩萨台的呼声越来越高。7月13日，他要求特别权利，其中包括国防部的权利，我拒绝了。7月17日，摩萨台辞职。我怀着一些疑虑任命前首相艾哈迈德·贾瓦姆接替他。虽然他赞成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付支持摩萨台的左翼力量，但是由于他早在政府任职，现在年事已高。他已经是一位年老多病、容易疲劳的人，他在讨论政策的会议上常打瞌睡。

对于任命贾瓦姆，人民党和摩萨台的支持者走上街头示威。骚乱扩大了，看来贾瓦姆政府没有力量对付它。后来贾瓦姆宣布取消石油国有化，使形势更趋恶化。由于不断暴乱，爆发内战的危险越来越大。我拒绝命令我的部队开枪，并被迫起用摩萨台，我满足了他的要求：任命他为首相兼国防大臣。

遗憾的是，摩萨台觉得这些权力越来越有利于实现他的野心。他查封了报社，逮捕了报纸编辑。由于国民议会的一些成员敢于批评他，摩萨台除了利用自己的全权，还命令他的追随者离开议会，使议会开会达不到法定人数，从而使该机构不起作用。持不同意见的议员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街上都遭到摩萨台打手们的威胁。

摩萨台总是大谈货币贬值的危险，但是在没有增加黄金与外汇作为后盾的情况下，他印制了价值成百万美元的纸币。他把忠于他的人任命为军事指挥官，并且允许——许多人会说是支持——人民党的共产党分子进一步渗透到军队。他延长了军事管制法。他在议会成立了一个由他的追随者组成的七人委员会研究撤销我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办法。为此，

委员会拟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摩萨台要求提交给全体议员。然而，议会对这份报告和摩萨台的要求未予理睬，甚至连迦沙尼和过去在议会里支持摩萨台的人也不支持他的行动。

摩萨台解散了最高法院，暂时停止国民议会的选举。由于国民议会的一些成员敢于反对他，他十分气愤，于是他宣布举行全国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要解散国民议会。议员们能回想起在那届国会的开幕式上，摩萨台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他们中间80%的人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摩萨台作为自由选举的拥护者对那次公民投票作了安排，让支持解散国民议会的人和反对的人分别在有标志明显的不同投票站投票！谁都知道，如果有人敢投票反对解散国民议会，那么他肯定会受到摩萨台和人民党的恶棍们的毒打——实际上，这两伙人此时已难以区分了。结果是，摩萨台——或者他之前的希特勒——如愿以偿。赞成解散国民议会的票占总数的99%以上。在一个3,000人左右的偏僻城镇里，竟然宣布有18,000张选票支持解散国民议会。不论是在那个城镇还是在其它的地方，好象死人又活了并参加了投票！

从另一种更可恶的意义上讲，许多死人是投了票或者要参加投票的；在摩萨台这次以及其它事先布置好的选举中，的的确确有几百人被杀害。到他垮台为止，他在塞帕广场已经矗立起27个绞刑架公开地绞杀他的敌人，他想杀掉的人中一些曾经是他自己政党的成员。

摩萨台在议会里曾经装出过一副维护宪法原则、民选政府和正当法律程序的姿态。他抗议过实行军法管制的意见，赞扬过自由选举和新闻自由。

但是，几个月里摩萨台就取消了参议院，解散了国家的最高法院，并且强奸民意解散了国民议会。他对新闻界加以

种种限制，实际上取消了自由选举，延长了军法管制，想方设法削弱我享有宪法规定的地位。我们来之不易的1906年宪法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摩萨台看来，我们的一切经济挫折都是我们争取石油不受英国控制的斗争造成的。他只字不提英国人仍然对我们储存不用的石油拥有所有权，而且不再向我们交纳租金。他们甚至从伊拉克和科威特购买更多的石油，我知道，那儿的石油9美分一桶，比起伊朗石油13美分一桶来要便宜。这样，伊朗遭受了损失，而英国却从摩萨台的“消极平衡”中得到了好处。这时才开始看出摩萨台的真正目标似乎与他所说的正好相反。（必须补充说，一旦世界石油卡特尔不需要摩萨台时，他的英国朋友马上就把他当作无用之物抛弃了。）

当摩萨台越来越深地陷入他自己阴谋诡计的罗网之中时，他仍未忘记一个主要目的：推翻巴列维王朝。他与恺加王朝有家族关系，曾在1925年反对我父亲当政。此外，他知道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利归根到底必须使我丧失权利。

他有一个国会委员会为他研究限制我的总司令权利的办法，当议会没有实行委员会的办法时，他十分恼火。1953年2月，他更直接地向我进攻了，建议我离开国家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给他机会执行他的政策，并且欢迎他暂时放弃玩弄阴谋诡计，于是我同意了。随后，诡计多端的摩萨台建议我不要乘飞机走，他认为反对我离开的群众有可能阻塞飞机跑道。他建议我化名乘车到伊拉克边界，再从那儿去贝鲁特。

但是，我出国的计划传到人民之中，他们随即走上街头游行，表示他们对国王的忠诚。我被这种支持的情景感动



了，决定留下来。

到了年中，全国的气氛发生了变化。摩萨台的老支持者认识到他的政策是为共产党统治伊朗开辟道路，而不是清除英国的影响，因而纷纷离开了他。最后的危机于7月末爆发了，当时他试图解散议会和要求进行新的选举。政治骚乱愈演愈烈。人民党又一次控制了各条街道。把握不大的摩萨台琢磨着宣布成立共和国，由他担任总统。

他越来越多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位于德黑兰市内的住宅有12辆坦克保卫，而我在萨阿达巴德的夏宫仅有4辆坦克，极易受到人民党暴徒的攻击。索拉娅王后和我只好轮流去我父亲位于拉姆萨尔附近的里海别墅和卡尔达什特的狩猎场休憩地居住。1953年8月13日，我断定采取坚决行动的时刻到了。我签发了一项法令，罢免摩萨台的首相职务，任命法米拉·萨希迪将军为首相。萨希迪曾是摩萨台的同伙，由于失宠，现正在逃。

我让皇宫卫队长内玛托拉·纳西里上校(后来成了将军)下达这些法令。他随后的冒险经历与“三剑客”很相似。

首先，他必须找到萨希迪，此人几个月来一直受到摩萨台警察的追捕，每夜住在不同的“安全”处所。尽管如此，纳西里很快找到了他并向他下达了我任命他为首相的命令。萨希迪接受了。纳西里接着要去找摩萨台。纳西里首先逮捕了他的3个亲信顾问，“摸一摸”摩萨台对免职的态度。很快，我采取对策的消息泄露了。在纳西里向摩萨台下达我的法令之前，共产党报纸传遍大街小巷，警告人们说这位上校正在策划一次军事政变。那天晚上11点，纳西里和他的两名军官勇敢地驱车来到摩萨台的住宅。住宅被坦克和卫兵守卫着。上校和他的助手大踏步地从坦克炮口前走过，他相信这

些军人熟悉他，不会向他开枪。他判断对了。一进入住宅，他就要求见摩萨台。摩萨台的助手拒绝了，但同意把我的罢免令传递进去并拿回签字收据。纳西里等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才拿到收据。他看了一眼，认定是摩萨台的笔迹。在他正要离开时，摩萨台的参谋长、里亚希将军让人把他带到国防部并逮捕了他。

在美国朋友的帮助下，我已经计划好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情。我的美国朋友有中央情报局的克米特·罗斯福和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劳埃德·亨德森。我们已谈妥一旦摩萨台武力反抗，我就暂时离开祖国。我们认为，我离去将迫使摩萨台露出真实面目，从而使形势趋于明朗，这样可以争取公众舆论支持国王。为了使事情进展顺利，我们在萨阿达巴德宫和卡拉尔达什特及拉姆萨尔两处隐蔽所之间设立了专用无线电通讯系统。当纳西里的司机将纳西里被捕的消息送到皇宫时，这条消息早已过时了，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传递消息被延误了。

我清晰地记得，我有两个晚上没有合眼。拂晓前，摩萨台的电台广播，宣布我罢免他的计划已经失败。仅仅几分钟之后，就广播了纳西里上校被关押了的消息。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正在卡拉尔达什特的狩猎场小屋内。那里的机场很小只能停放小型飞机，因此，索拉亚王后和我先飞到只需20分钟行程的拉姆萨尔。从那儿，我们登上一架双引擎比奇飞机飞往伊拉克。我们由两个助手陪同——他们是坚持要和我们同行的马夫和哈塔米少校。哈塔米后来晋升为空军司令，和我家族的人结了婚。飞机由我驾驶，几小时之后，我们便在巴格达着陆了。我们虽然是突如其来，但还是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欢迎。伊拉克国王和我是老朋友。然而，

摩萨台的外交大臣法泰米拍电报给我们驻巴格达大使，指示他逮捕我。难以置信的是此人竟企图按那些指示办，当然没有成功。我们在巴格达逗留了两天，拜谒了神陵；之后乘商业班机飞抵罗马。我记得我在罗马使馆存放了一辆私人轿车。这也许是摩萨台想的办法，那个临时代办不肯把车钥匙给我。然而，一位可靠的使馆雇员把钥匙交给了我。我们在罗马只逗留了两天。

8月18日形势开始变化。反摩萨台的报纸设法发表了我任命扎西迪为首相的法令和我在巴格达发表的几项声明。那天，第一批反政府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民族主义者和士兵们采取行动驱散了人民党的示威者。监狱被攻了下来，纳西里上校被解救出来，他很快就担负起指挥皇宫卫队的任务。第二天，8月19日，反摩萨台的潮流汇合了新的力量。人群冲进政府各部和德黑兰电台。下午两点，电台广播了扎西迪政府的新闻。现在，战斗正在摩萨台住宅的周围展开。最后，首相的卫兵队伍垮了。夜幕降临，摩萨台穿着睡衣越过他住宅的院墙，逃进隔壁的花园，躲到邮电局长的地下室避难。

我回到德黑兰，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不容置疑，全伊朗的人民都支持国王：以前我只不过是一个世袭的国王，而现在，我真正成了人民选举的国王了。

在法官面前，摩萨台继续演戏；他有时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编造谎言，言不由衷。他继续在国际新闻界面前出丑。我知道他肯定要被判处死刑，因为已宣判他为叛国罪。因此，我指示法院不要把他反对我的行为考虑在内。

摩萨台在监狱囚禁了三年之后被释放了。他到德黑兰以西他在艾哈迈德-阿巴德的大庄园里隐居起来，1967年在那里去世。我无法使摩萨台的外交大臣侯赛因·法泰米免于死

刑，因为他是共产党分子。然而，我个人为他的家属提供了财政资助。这种资助只是到了法泰米夫人最近回到伊朗支持霍梅尼时才中止。在此之前，她一直住在伦敦。

在摩萨台统治结束之后所进行的审判中，发现1951至1953年之间出了许多奇怪的事件。例如：摩萨台1951年掌管国防部时只有110个军官是人民党党员，而到了1953年他垮台的时候，却有640个军官是人民党党员。

共产党首先计划利用摩萨台推翻我。第二，缴获的人民党文件暴露说，计划在我离开两周后就把摩萨台除掉。我已经看到印有伊朗人民共和国名称的邮票，这就是到时要宣布的国名。支持我的群众起义使阴谋家们措手不及。人民党认识到人民并不支持他们，于是就转入了地下。我没有忘记，斯大林已在几个月前去世，苏联的战略将经历相当大的变化。

由于俄国人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人民党是毫无疑问的，世界新闻工具便说英国和美国资助了我们推翻摩萨台。然而，最准确的文件证实，在发生这些事件时，中央情报局花的钱不超过6万美元。我实在不认为这点钱能够使全国在几天之内行动起来。

1957年5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对美国人民的一次讲演中肯定了我国在摩萨台统治时期面临共产主义威胁。他说，“在国王英勇无畏的领导下，伊朗人民战胜了这一危险。他们在致力恢复经济稳定中，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不可缺少的帮助……，伊朗保持着自由，已证明她的自由对我们的自由仍然是极其重要的。”

伊朗人民几乎花了30个月的时间才看出摩萨台是个老魔法师的门徒，他没有能力控制或支配由他自己所放纵的破坏

力量。

开始时，他曾竭尽全力为祖国效劳。他用消极的方式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排外情绪；他心怀私利，迎合仇外的浪潮。说来也奇怪，在任命他为首相时他已不是有用之材了。在任何国家，有成效的政府首脑必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而摩萨台——让我们希望他这样做不是有意的——却采取先向人民许下种种美好的诺言，然后又破坏他自己的诺言，从而背叛了伊朗的普通人民。人民曾一度相信这些许诺，随后，他们便意识到，不管许下的诺言有多么动听，也不能给孩子们当饭吃！他们还亲眼目睹自己祖国被分裂。所以，人民，尤其是普通百姓，起来造反了。摩萨台使国家遭受苦难并负债累累。我们的经济受到破坏达上亿美元并整整耽误了3年时间。

在下一章，我们将看看石油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 八、从石油时代到原子时代

石油工业的发展是中东现代史中最激烈动荡的一个侧面，它包含了一系列永无休止的诡计、阴谋、政治动荡、经济混乱、恐怖行动、政变和流血革命。要理解伊朗和中东其它地区的大动荡，人们必须懂得石油政治学。

世界石油的发展史是人类知道的最残酷无情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基本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原则都受到了嘲弄。如果强大的石油托拉斯不再掠夺和侮辱我们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强盗变得人道了，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艰苦斗争的胜利。

1901年，除北部5省外，整个伊朗石油的探测、勘探、开采、提炼、运输和销售的权利都给予了威廉·诺克斯·达西。达西公司把16%的利润给伊朗政府。我国政府不能干涉公司的事务，公司只雇用没有技术的伊朗人工作。

达西公司为了保持财政上的偿付能力经过了几次改组，1909年改成英国波斯石油公司（后来叫做英-伊石油公司，其后又称为英国石油公司）。当战争的阴云笼罩欧洲时，英国政府早在1912年就十分关注石油供应问题了。当时担任海军部部长的温斯顿·邱吉尔建议英国政府取得英·波石油公司的51%的股份，以应海军之需。1914年8月，仅在战争爆发的6天前，英国议会就此通过了一项法律。1920年，恺加政府与英-波石油公司达成了一项新协定，为我国带来了一点点好处。然而，有趣的是，西德尼·阿米塔奇-史密斯爵士，一

位英国财政官员是当时波斯方面的谈判代表。

1933年，伊朗政府经过努力废止了这一协定。此后又签订了一项新协定，根据协定伊朗得到了更多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开采权所包括的地域减少到10万平方英里；并要求公司优先雇用伊朗人。

英-伊石油公司的利润大大提高了。到20年代初，就全部收回了最初约1亿美元的投资。其后，按照最合理的估计，公司的收入达到这个数字的25倍。可是，从伊朗土地吸取的巨大财富中伊朗什么也没得到，它全部被该公司的各个股东拿走了，其中最大的股东要数英国海军部——皇家海军靠伊朗石油维持——和英国财政部。这样，截至1950年，伊朗从自己的石油中得到的石油开采税为4,500万美元，而英-伊石油公司向英国政府缴纳的所得税为11,200万美元；由此可以推断出各股东所得股息有多少。

而且，令人奇怪的是，该公司对我国采取了歧视态度，因为它付给包括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内的其它国家的石油开采税要高一些。此外，和石油一起抽出的天然气就地烧掉全浪费了。1933年新协定的条款得不到尊重：该公司不培训伊朗的技术人员，因而拒绝减少外国雇员的数量；他们付给伊朗人的工资少得可怜，并且不按照协定精神为他们提供象样的住宿条件。

然而，美国一些公司已经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对半分红的合同，而英-伊石油公司付给我们的石油开采税还不到30%。最后，它们用从伊朗得到的大部分利润作为在其它国家进行勘探和开采石油的投资，所以说，这不仅是不公正的，同时也是一种侮辱。

1951年5月，我们批准了石油工业国有化法律。我是国

有化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但是，我觉得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后或事先要与对方谈判。遗憾的是，由于摩萨台的反对，其结果适得其反。

大不列颠提出抗议，将争端提交给海牙国际法院，并且从阿巴丹撤走了它的4,800名技术人员和下令对我国港口实行石油封锁。在这种封锁下，国有化之后刚刚成立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甚至不能以半价卖出一桶油。这样，伊朗油库的存油积压了长达3年之久，由于我们必须维持关闭的工厂，这些油成了负担而不是财产。摩萨台革职以后，我们才得以恢复切合实际的谈判。

我无意损害1951年的石油国有化法律。摩萨台和我原则上都同意石油国有化，但在具体做法上存在分歧。摩萨台下台后，我的目标之一是要缓解英国对我国石油工业的控制。1951年我们更为缓和的做法本来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但到了1954年，英国对我们石油供应线加以限制使得这种努力大大复杂化了。经过了一场漫长的谈判之后，我们才同世界8大石油公司的财团达成了一项基本协定。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作为企业主雇用该财团为承包商，组织油田的生产和原油的销售。这一协定的有效期为25年（另外可延长3次，每次5年），伊朗得50%的利润。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信给我对我为解决摩萨台政府造成的石油问题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由于1957年通过了伊朗石油法，我们得以削弱财团在我国石油工业中的权力。这项法律允许更多的外国公司来我国并扩大了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石油生产各个领域的活动。与恩里科·马太的国家碳氢化合物公司合作成立的伊-意石油公司和后来与泛美石油公司合作成立的伊朗泛美石油公司是这



种安排的例子——两家公司都将勘探一些新矿区。

规定对半分红的安排取得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它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第一次能够参与管理我国的油田。第二，由于外国公司所获利润必须交付50%的所得税，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较大份额的利润。伊朗的实际份额是75%。这些革新的协定改变了中东以及其它地区石油工业的常规，为被开采国更大程度控制自己的财富铺平了道路。

然而，根据1954年协定，我国的大部分石油生产由财团管理。1958年，我着手改变这一状况。我的目标是要让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通过承担全部管理责任，在名义上同时也在实际上取得对我国油田的控制权。这种努力耗费了15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认识到了损害石油大王利益的人会面临怎样的危险。终于，我胜利了——外国控制我国石油工业生产长达72年的历史在1973年7月31日结束了。

那一天，财团实际上成了一个我们愿意卖给他们，他们才能购买伊朗原油的买主。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取得了包括管理阿巴丹炼油厂在内的一切活动的指挥权，从此以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根据国家的利益作出地质勘探的计划。

从1957年我使伊朗走上独立道路的时刻起，莫名其妙的事情便接踵而来。因为事关巨大利益问题，所以在石油史上采取真正的革命步骤之后紧接着发生了多起悲惨的事件。

我认为，意大利石油总公司董事长恩里科·马太是第一批牺牲品。我认识他时，工程师马太才50多岁，他有非凡的精力，对石油界有令人钦佩的知识。他完全清楚他公然对抗国际大卡特尔所冒的风险。他常说他没有时间担忧。为了节省时间，他经常坐飞机或乘直升飞机旅行。他的双引擎马拉内-索尼埃760型飞机由优秀的和非常精明的伊尔内里奥·

贝尔图齐少校驾驶。

1962年10月27日下午5时25分，飞机从卡塔尼亚的西西里机场起飞，预定6时37分在米兰着陆。美国《时代》周刊驻意大利负责人威廉·麦克黑尔与马太同行。6时55分机场指挥塔收到了贝尔图齐发来的最后一次通话说他正准备着陆，此后就什么消息也没有了。

大约在晚上10点，才得知飞机在帕维亚省的巴斯卡普附近坠毁了，无一人幸免。官方宣称这一事故是“由于能见度差”造成的。

我从不相信马太的死是一次意外事故。那个月的月初，在对马拉内飞机进行检查时，在发动机里就发现过爆炸装置。

自伊朗成为本国地下财富的主人那一刻起，某些有影响的宣传工具便开始了一连串诋毁我的政府和我本人的运动。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变成了暴君、压迫者和独裁者。一时间，恶毒的宣传表面化了，打着“学生”组织幌子进行活动的职业鼓动家们露面了。这场运动自1958年开始，到1961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白色革命曾暂时地使它有所收敛，但在1975年，它又以更猛烈的程度重新开始，并且一直持续发展到我离开这里。

在我的倡议下，石油输出国组织各位部长于1973年12月22日和23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将每桶石油的价格从5.032美元提高到11.651美元。

那年初，在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我们曾在现货市场上以35美元一桶的价格出售过石油。这使我们受到某些启发：对石油的需求如此迫切以致可以不论价格。石油的价格被压低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坚决、迅速地采取行动的时候

了。我还相信，石油以某种价格出售，从长远来说会使世界经济更加健康，它可以促进探索其它能源。

在70年代前期，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曾写信敦促我们撤销涨价的决定。这种通信联系一直继续到福特总统政府下台。

在我看来，石油比埃维昂矿泉水便宜得多是超出经济常规的，因为石油是一种能衍生产出约70,000种不同产品的贵重产品。其中有几千种产品已经得到发展，石油成本只占全部成本的很小比例。所以，我认为，石油应该成为越来越多样化和尖端的石油化工的基本原料。把石油用作热源、光源或铁路是不考虑未来的浪费办法。这是“身后之事与我何干”的哲学。

我在1973年解释过，按照合理价格出售石油是真正有利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把石油价格逐步提高到能与其他昂贵的能源相竞争的程度，人们就会对石油作更加高级的利用，同时还将增加世界的能源储备。

合理的石油价格政策不仅要求对价格作定期调整，而且还要与消费国，尤其要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合作，以避免造成国际价格的螺旋性上涨。应该通过谈判，根据共同协议，定期规定发展未来世界工业所能依据的能源价格。

国际压力集团通过新闻工具立即发动了一场中伤我的运动。他们指责我企图瓦解西方经济，毫不奇怪，他们置我的全面计划于不顾，无视我曾向消费国提出的建议：把他们的石油税限制为买价的100%。因为，消费国政府的财政部门实际上对每加仑油征收的税高于生产国的卖价。

我在国内的最后几年间，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发展了，兴旺了。石油收入1977年高达220亿美元。我们在亚洲和非洲

建立了炼油厂，并在近海进行勘探。

我远不象西方所描绘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价格问题上的鹰派人物，在卡特内，我规劝其他成员采取温和态度，有步骤地、合理地提高价格。1975-1976年以后，我一再努力控制石油价格，说服我的伙伴逐步地并且按照世界经济状况提高价格。

比如说，1977年，我同意西方冻结1978年石油价格的要求。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在德黑兰召开的一次中央条约组织会议休息时找到我，请求我控制价格。十分有趣的是，万斯建议将油价冻结延长到1978年之后，而欧文却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他充满信心认为北海石油很快将使英国不需要进口石油，相反它还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纯出口国；他只是急于达成一项过渡协议，好使他的国家——大概还有他的工党政府——拖过明年。这个要求是在一次招待会上，我们单独在我的皇宫的一间屋里时提出来的。我告诉他们说，完全可以，这有什么不行的呢？事情就是这样。

当时，伊朗是世界上第四个最大的产油国，日产约600万桶，还是第二个最大的石油出口国。除了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之外，我们还有包括11家公司和工厂的国家石油化工工业协会。伊朗国家天然气协会负责管理我国储藏的大量天然气——相当于苏联的储藏量——的钻探和分配工作，并且负责继续寻找新气田。我们知道，伊朗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还有待开采。

毫不奇怪，我在1973-1974年提出的许多见解现在被西方的一些主要机构接受了。

1979年3月，一直攻击我的政策的法国《世界报》在其“外交”增版登载了题为“能源危机和石油价格”的长篇研究文章。这篇在德黑兰会议五年零三个月之后发表的文章几乎采用了我早就提出的赞成合理的石油价格的所有理由，该文论证说这是一个需求的问题，对此各国认识得太慢了。文章指出每年还有1,2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白白地烧掉，这是给世界造成损失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文章再一次证实了这个事实即政府财政部门从卖给消费者的油价中所得部分多于买油的开支。最后文章得出同样的结论，需要达成一项国际协议。

在所有这些研究中，只字未提1973年在德黑兰召开的石油输出国会议。作者首先根据的是大陆石油公司1976年所作的研究，承认每桶油的价格应从24美元提高到27美元（1975年），以便使五大能源同石油竞争；其次根据的是兰德公司1978年为中央情报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强调说“把石油价格提高到每桶‘30美元’（不变价格）可以使已经探明的世界石油储量翻一番”。

我应该补充说，1978年8月初，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先生说过石油价格可以提高到每桶40或50美元。

这样，当初被谴责为“造成不稳定”和“无耻的讹诈”的我的政策，成了唯一可能采取的世界性政策。

## 九、白色革命

在我执政的第二年战争还在激烈进行。在我们面临着严重问题的时候，我宣布了一个五点计划，以确保每个公民的最低需求：所有人应享有健康、食物、衣着、住房和受教育的机会。

从那以后，每逢有时机，我都反复重申这些目标，并强调实施这些计划的必要性。我们的国家要想继续置身于世界上生气勃勃、进步和自由国家的行列中，就必须彻底改变陈旧的社会制度，把国家的前途建立在一个适合于今天的视野和需要的新的制度之上。除此之外，别无其它选择。这就需要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以消除阻碍进步的不公平、暴政、剥削和反动势力。这场革命必须以精神原则、宗教信仰和保持个人与社会自由为基础。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问题是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农民制度；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必须调整，使工人不再感到受剥削。妇女毕竟占全国人口的半数，她们应该和男人一样受到平等的对待，再也不能非法地将她们归入精神病患者和罪犯一类。应该消除文盲的痛苦；人们不应该死于疾病，也不应该由于缺乏治疗和照料而生活在痛苦和悲惨之中；乡村中的落后现象应该结束，应该沟通未开发的边远地区与国家的其它地方的联系；总之，到处都应当具备与今天的文明世界相适应的环境。

我胸怀这些目标，于1963年1月向我的人民提出了白色

革命的第一阶段计划。这个计划将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进步伊朗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这样，我的存在就再也不会影响国家的命运。当时我收到肯尼迪总统本人的来信，他对我的白色革命表示祝贺。1967年8月，在我访问美国时，约翰逊总统也宣称：“伊朗的变化体现了真正的进步。”他接着说：“通过你的白色革命，伊朗接受了新时期和新一代人的挑战……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流血”。

伊朗有一半以上的可耕地为私人所有，其中拥有40个或更多村庄的人可能不超过30人（他们中间有些是部落的首领）。这些土地所有者大部分时间住在德黑兰或是国外，很少在自己的庄园里居住，因而他们没有兴趣改善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农民的农业和社会条件。他们指定代理人为他们管理土地。遗憾的是，这些代理人首先关心的是他们自己的收入。因此，那些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经常受到剥削。

为了改变这种土地所有制，我于1950年颁布法令，将王室的地产，也就是我私人所有的2,000多个大小村庄全部分给了农民。但是，摩萨台政府反对对现有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作任何改变，因为摩萨台本人就是一个大地主。他中止了分配王室领地的计划，只是在他下台后，这个计划才得到实施。接近1958年年底这项计划完成时，已有50多万英亩的王室土地分给了25,000多农民。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但是消灭大面积私有地产的主要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最后在1963年1月，经公民投票通过了一条限制私人拥有可耕地的法律。这就是我的白色革命的第一条原则。

土地改革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地主不得拥有一个以上的村庄。耕种土地的农民有权用贷款的方式购买这个限额以外的土地，贷款在15年内还清。对地主的补偿是给予

国营工业的股份。

第二阶段改革规定，不亲自耕种土地的地主必须将土地出租30年，或者是卖给耕种人。

最后在第三阶段，出租土地的地主必须与农民共同分享收入，或者是将土地卖给耕者。大地主只能保留适合机械化耕种的未耕土地。我反对人剥削人，但是不反对人剥削机器。为了为土改筹集资金，我们卖掉了国营工厂的股份。这项法令，即白色革命的第三条原则，不仅辅助了我们的土改计划，而且使公众得以更充分地参与伊朗经济事务。

我们为资助土改采取的其它办法以及改革农业管理的情况已在其他著作中作了详细的叙述\*。农业管理的改革包括：建立农业银行、乡村合作社、以及农民以土地换取股份的合作农场企业。

那年1月土改开始时，我就预言，教士的势力（黑色反动派）和共产主义者（红色破坏者）将试图破坏这项计划。因为，前者希望国家继续沦于极端贫困和不公正的状态中，后者的目的则是欲使国家完全分裂。

我的预言应验了。他们开始进行广泛的破坏活动，出现了暗杀事件和骚乱。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国家南部爆发的叛乱和1963年6月德黑兰出现的骚乱。

大地主们没能阻止住土地改革，他们气急败坏地资助了这些叛乱。红黑联盟，即革命左派和最极端的宗教反动派结成的可恶联盟，虽然在摩萨台时期就已形成，但在1963年有组

---

\* 参见1967年巴列维帝国图书馆出版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著《白色革命》（译自波斯文），以及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乔治·伦乔夫斯基著《巴列维家族统治下的伊朗》。



织的伊斯兰马克思主义运动只不过是一个幽灵。只是到了70年代后期，伊朗和我的政府才充分领教了这个罪恶联盟的残暴。

德黑兰1963年的骚乱是由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自称为宗教领袖的人士鲁霍拉·霍梅尼鼓动起来的。此人与外国间谍肯定有秘密交易。后来人民党无神论流亡者的电台给了他一个阿亚图拉（象征上帝）的宗教称号，并且把他捧上了天，尽管他根本不是授命于神。这些事件实际上是重演了我父亲统治时期在霍拉桑发生的事件。当时为了使人们的服装现代化采取了一些措施，结果发生了霍拉桑事件。那次事件的煽动者是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冒险家。后来发现此人是一个外国人。霍梅尼既没有因为他的煽动性行为而遭到逮捕，也没有受到审判，而只不过是流放国外。一开始到土耳其，后来到了伊拉克。

伊朗大多数宗教领袖，也就是伊朗真正的精神领袖根本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为这些骚乱提供资金的是一批由于土地改革法而受到损失的地主。参与暴乱的暴徒在德黑兰大街上袭击手无寸铁的妇女，捣毁了送孩子们上学的汽车，放火烧毁了公共图书馆，毁坏了一个运动场，还抢劫了商店。

当土地改革的第三阶段完成时，剩下的大地主就非常少了。实际上，250万农户已经成了他们耕种的土地的主人。不可否认，这场白色革命是不合大地主或教士的口味的。然而，土地使用权的改革不可能解决伊朗农业的所有问题。

可惜的是，伊朗的森林很少：在北方，沿里海和阿尔伯兹山北坡有13,000平方英里森林。另外，还有500到750万英亩森林分布在西部和西南部、中部沙漠周围和阿曼海沿岸。而

且，这些森林中只有一部分，也就是330万英亩适合用于森林工业。其余的森林由于过去就遭到破坏，因此，眼前没有经济价值。

从古代到18世纪，伊朗的橡树林、野杏树林、阿月浑子树林，还有南方的针叶树林很多。在整个波斯古代史上，没有森林私有制的迹象。伊斯兰教义说，小溪和河流、森林和牧场、池塘和沼泽永远不能成为私人财产。大地主占据大片长满树木的地区是在中央政权软弱腐败的“封建”时期出现的。1963年我宣布：

“森林是天然财富，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人为的。因此，它应该属于全国所有的居民。只有这样，才是公平的。”

伊朗拥有3万平方英里的优质或中等质量的牧场。还有3.8万平方英里长满树木的大草原。不幸的是，这些牧场仅能提供现有牲畜所需的一半草料。因此，牧草资源迅速枯竭，草场很快遭到破坏，牲畜都很瘦弱。优质牧场供不应求造成了许多弊病：土地出租价格高得惊人，不将土地租给牲畜饲养人，多赚钱成了使用牧场的目的。

实行国有化以后，保护、开发和培植森林成了伊朗森林组织的职责。为了恢复被毁坏的森林，大片土地被禁止作为商业用地。烧木炭也被禁止。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开设了数以千计的服务点，在那里可以买到代替木炭的燃料——煤油和石油。这样北部森林就足以提供全国所需要的20万吨木炭，以及工业所要消耗的百万立方米的木材。

最后，在26个地区重新植树900多万株，并在城市周围和主要公路两旁建成7万英亩“绿化地带”，还建立了许多国家公园。为了限制沙漠地带向前推移，又育成了9.8万英亩的新林，栽种了各类植物和树木25万英亩。这些是在为恢

复被毁坏了的自然资源的道路上迈开的第一步。

至于牧场，则由牲畜饲养者使用。农业大臣着手实施一项牧场发展计划。还要大量增加水井，饮水槽和遮风避雨的牲口棚。

1968年，我们集中注意力解决地上地下水源国有化问题。根据《古兰经》，水是属于大家的。不幸的是，伊朗一直缺水。地球上每年平均降水量为860毫米，而伊朗的年平均降雨量只有231毫米。我国水源变化在2,800-5,200亿立方米之间，平均为3,780亿立方米，具体多少要视当年是干旱还是多雨而定。

73%的雨量用于灌溉土地或者是流入湖泊和大海。可从河水和泉水中获得的水平均为1,030亿立方米。1976年，我们的年消耗量是这个数字的90%。很明显，仅一年的干旱就会造成危险的缺水现象。连续两年干旱便意味着大灾难。这一事实，连同人口的激剧增长，农业的扩大，炼钢厂和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最后还有对电力的需求不断增长，都要求制定一项水利保护政策。

1953年8月前，已建成5座小水坝，之后又建了8座大水坝。总共130亿立方米的水，使200万英亩的土地，其中一半是新开垦的土地，得到耕种，并发电1804兆瓦。在我离开伊朗时，有5座水坝还在建设中。人们还在研究从地下石灰石构造中提取水的可行性。我们还可以通过利用设在波斯湾沿岸地区的核反应堆对海水进行脱盐处理的办法来扩大我们的水力资源。

我设想在较远的将来灌溉面积可达3,750万英亩而不是今天的560万英亩。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生产更多的能源。即使现在伊朗水坝的水力资源大体上能够发电10,000兆瓦，我们也实现不了这个目标。

从1963年到1977年，电力生产从每小时发电23亿瓩增加到每小时发电200多亿瓩。发电厂的发电能力从850兆瓦增加到7,500兆瓦以上。由于正在建设中的两座核电厂将投入使用，因此这个数字很快又要增加2,500兆瓦。最终目标是生产25,000兆瓦的核电能。

如果有人指责我忽视农业，那真是把事情搞颠倒了。在一个缺乏足够水分和腐殖土的国家里，灌溉和肥沃土地的投资当然是很大的，要做得比我们更多是困难的。

商业领域也要发生一场同样的革命，富有的企业家也会极力反对这些改革。这场革命于1963年开始，白色革命的第四条原则，即工人分红制被通过。在执行过程中，这条法律成了世界上最进步的法律之一。根据本法律的规定，雇主必须签订集体协议。协议应规定：<sup>\*</sup>

1. 根据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经营成本的情况发放奖金。
2. 付给工人一部分纯利润。

适合于拿工资工人需要的特别银行，为改善住宅条件和清理债务提供了年息为4%的低息贷款。鼓励劳资双方进行密切合作。

三条重要原则决定了我们的劳工法：

1. 每个伊朗公民都有就业的权利。失业工人将得到相当于其最低的有保障收入的失业补助，直到职业介绍所为他找到另外的工作时为止。

2. 不熟练工人的最低工资按生活费用上涨的比例予以

---

<sup>\*</sup> 1976年国营和私人企业中有53万工人分得的奖金和红利约为120亿里亚尔，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或两个月的工资。从1963年开始实行这一法令到1975年为止，付给工人的纯利润总额是原来的128倍。

增加。

### 3. 生产率章程规定工人多劳多得。

尽管这些步骤都很重要，但它们仅仅是开始。我们民主平等的概念包括经济平等。工人最终应该成为雇用他们的工厂和车间的共同所有人。因为，毕竟这些工商企业由于有工人人们的努力才能运转。

1975年8月，革命的第13条原则颁布为法律。要求所有有5年以上历史的私营生产单位把49%的股份卖给它们的工人和职员，新建的国营工厂把99%的股份分配给广大群众。

这项原则实现了民主经济，并将成为伊朗工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所有劳动者与大生产单位的资本联合，将使工厂主、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要恢复在本世纪初压迫过我们民族的封建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了。

当然，一开始有些工厂主叫嚷说，我们犯了“渎圣罪”。但一年以后，一开始就受到这个法规影响的大多数工厂主承认，他们的企业以前从来没有赢利这么多。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改革没有使他们失去任何东西，因为生产率提高了，利润增加到使工厂主降低了的收入又恢复到原先的利润水平。由一小部分股东掌管的153个工业企业将他们的股份卖给了163,000名工人和农民。320家大公司出卖估计为1,700亿里亚尔股份的交易也正在办理之中。

由于政府提供贷款，使人们在各种情况下都有可能购买股份。扩大生产单位所有权委员会提供必要的信用贷款。偿还这些信用贷款是通过10年贷款计划直接从股息中扣除。下列数字表明这项计划是成功的。

15年前，每个工人平均挣得2,000里亚尔，即每个月不足30美元，没有人超过这个数字。1978年，没有特殊技能的

工人的工资是10,000里亚尔。此外还得加上公司的20%的利润。在有力地执行了1975年8月法令的地方,还从股份中得到股息。\* 此外,工人们还可租到低价住房。由于伊朗对五种基本食品(肉、糖、食油、大米和面包)实行补贴,因此,食品很便宜。除此之外,还专门为工人开设了固定价格的特别食品店。

我听说,随着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的产生,许多这样的商店都被烧毁了。

除了生产铜、钢、煤、石油、铁路和军火的基础工业以外的国营工厂定于1978年10月实行出售股份的计划。不幸的是,谋反者于1978年9月开始制造骚乱和抢掠财物,一直延续到我离开伊朗,这就阻碍了这项计划的实施。

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农民和大地主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鸿沟。

农民既穷,也无知,又常常是文盲。他们住在离执行法律的城镇很远的地方。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指望得到既公正又花钱少的法律保护。

农民发生的普通法律问题首先是涉及自己的那块土地,其次可能是与其他农民在土地、水、牲畜或者劳动工具等问题上发生的争议。这些问题所涉及的费用通常不超过一头牛、一只羊或者是几英亩可耕地的价值。现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农民必须提出诉讼。这就意味着需要到城里请律师,然后通常要到距离较远的初级法院去一次甚至几次。

---

\* 例如,1973年我参观古昌附近的一家糖厂时,得知80%的工人拥有汽车,50%的工人雇人料理家务。

传唤程序还需要他到县里出庭、履行上诉程序以及到法院所在地德黑兰跑一趟。

这时，法院里积满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小案件。对国家来说，这些案件中的大多数都不值得花时间、花钱去处理。而且，农民也不习惯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他们的分歧。他们用计，有时使用暴力和进行报复，这样就会使局势恶化，并且常常招致国家警察出面干预。

在我看来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农民不要去找法律，而让法律去找农民，到农民的村庄去。当地村民能够更好地理解并解决自己村民的问题。一个杰出的城市律师从一堆文件中好不容易才弄懂的问题，当地年长的村民能够透彻了解，并能聪明地予以解决，因为他知道案件的前情及争执的根源，而且他与诉讼当事人用同一种语言。

我觉得，农民会很乐意让他们了解并尊重的人来解决当地法律上的问题。这样，农民既不会浪费时间也不会浪费金钱和精力，并且还能减轻法院系统和国家财政的负担。

在试验的基础上，在伊斯法罕附近的梅希阿村庄成立了第一个公正法院，紧接着陆续建立了上百个公正法院。1965年10月白色革命的第九条原则使公正法院制度化。到1977年底，已有10,538个公正法院为各省19,000个村庄的1,000万人服务。

公正法院实际上就是村法院。公正法院有5名法官，由村民自己在受当地人尊重的人中选出，任期3年。政府不指定法官。由于这种法官是名誉职务，因此，审判对诉讼当事人是免费的。

法官不受复杂而无用的程序的束缚。他们可以自由传唤或者访问诉讼当事人，听取证词，核实证据，听取专家的意见。

见。

公正法院立即获得了惊人的成功。1965年，他们处理了18,000起案件，人人都感到满意。截止1977年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有300万例案件得到了解决。假如由正常的法院系统来审理这些案件，将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处理完，而且政府和诉讼当事人都将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

公正法院办案的质量是出色的。很多法律专家认为，这些普通的地方法官作出的判决非常合乎情理、公正而又合乎逻辑。普通村民所做出的成绩使最著名的法官都感到吃惊。我自己对此并不感到怎么奇怪。在我走访农民时，我经常向他们提出有关公正法院工作方面的问题，他们无一不告诉我，公正法院总是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

1966年7月，我们把这种制度扩大到城市，因为城市居民中也有不少小的纠纷。城里的仲裁委员会同样由五名仲裁人组成。这些仲裁人由各居民区的居民选出，任期3年。

从现职的或者退休的法官、律师或公证人中选出一位顾问，如有需要，就法律条文问题提出建议，但是，只有仲裁人才有权作最后裁决。这些人同样也是名誉职务，因此，对案件的审理也是免费的。

到1977年年底，我们已有283个仲裁委员会在总共有1,200万居民的203个城市里进行工作，它们以律师和当事人都满意的方式处理了75万桩案子。

由于公正法院和仲裁委员会如此成功，1977年我们决定扩大它们的权限。这两个革命机构承袭了伊朗初级法院的审判权。

这样利用民众的智慧（我倒认为是增长群众的智慧），



**从根本上来说**，难道不是积极的革命步骤吗？我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我们信任人民中的智者。我们要求他们用自己的良知来判断是非。他们认真履行职责，而且判案公平。

我们实行了两条基本原则：参与和下放权利。这样，我们就使**人民**获得了司法权。此外，我们也证实了，在农民和城市居民中，有一批深受欢迎的优秀分子，这些优秀分子现在正被大批处死，但不可能被完全消灭。

根据白色革命第六、七、八和十一条原则建立的扫盲、卫生和发展工作队在革新村庄、改进卫生状况和对乡村人民进行教育及智力开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工作队是由应征来的男人和自愿参加的妇女组成的。

由于我们国家在这段期间越来越富足，因此对政府来说，改善国家基础设施、增办学校、图书馆、医院、诊疗所等，也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这三类工作队一直在这些方面起补充作用。这些工作队使最偏僻地区得以发展，他们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被官僚组织忽视了的“琐碎小事”上。

发展和建设工作队起初是负责找出当地的问题，然后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每个成员弄清楚该地区的地理、农业、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一旦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就可以就地对当地的问题作出估计，再依次将他们的估计报告提交农业大臣。下一步，就是在应征人员的指导下，举办现代农业技术培训班。村民们将用农业部提供的种子种植1,000平方米的试验田。在这块实验田上，他们将学会用最好的方法进行耕种、收割、灌溉、给土地施肥以及与病虫害作斗争。在实验果园里，他们学会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栽培、嫁接、修剪等。他们还学会了改善牛棚和马厩的卫生、通风、

光线以及怎样给牲口接种疫苗。

为农村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修筑公路和建立供水设施；（在没有卫生工作队的地方）建立保健和医疗服务站；建立公共浴池、学校和图书馆；安装发电设备；设立邮政、电报和电话服务部门；建造公共住宅区、合作商店、职业教育中心，甚至银行。

卫生工作队的职责是治病、预防和消灭流行病以及改善卫生条件。8年当中，受益于医疗服务的农村人口从100万增加到了几乎800万。在进行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他们打井、安装抽水机、净化河水和泉水、开辟水渠和安装洗澡设备。

由于他们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1974年，我们决定由卫生工作队负责乡村地区的全部医疗卫生服务工作。这样，卫生工作队就变成了“卫生工作队组织”和“农村卫生中心”。

1976年，这个组织在整个农村拥有1,422个诊疗所，雇有1,240名医生，有400个实验室和无数个门诊部。卫生工作队的最大成就之一是重新取得了农民对“正规”医疗的信任。以前，乡村百姓常找“巫医”治病。到了1978年，他们有病就直接去卫生工作队的诊疗所医治了。这在我们国家里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以前，我们国家医生给妇女患者打针常常不得不在其父亲或丈夫的监督下，隔着帘子注射。

同其他两类工作队一样，扫盲工作队的目的是补充政府的传统作法，而不是取代它。

在恺加王朝时期，伊朗每100个人当中只有不到一个识字的人，而我们的国家曾给世界造就了象法拉比、拉齐斯、哈拉只、阿维森纳、安萨里兄弟、哈菲兹、素胡尔韦尔迪、奥马尔·哈亚姆、费尔道西、鲁兹贝汉·巴格利以及其他许

许多多有才智的人物。

1963年以前，各省6岁至12岁的儿童中，上学的还不到24%，其余的孩子都是文盲。在城市里，入学儿童占74%。1943年通过了义务教育法，但一直没有实行。因此，就全国来说，有85%的伊朗人是文盲。1956年，有400万儿童达到上学年龄，但是学校只能容纳170万人，200多万伊朗青年不得不成为文盲。

我觉得，解决这个棘手问题是每个伊朗青年都非常关心的。如果我们要求合格的应征人员到没有学校的村庄去教育文盲人，能想象他们会拒绝吗？不会！他们积极赞成，并且很快就受到大家的尊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赞赏我们扫盲工作队的。

成绩是惊人的：在15年中，扫盲工作队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692%。仅头五年，就有51万名男孩、12.8万名女孩、25万名成年男子和1.2万名妇女参加了村庄里的学习班。

扫盲工作队还建立和整修学校、清真寺、公共浴室、疏浚下水道、植树、组织体育俱乐部以及安装邮筒使邮件按时投递。

到1978年，在扫盲工作队工作的人已达10万余。许多应征者和自愿参加者被批准为合格的学校教师，而其他人则在乡村法院里工作。这种形式的教育使我们国家、或更准确地说，使伊朗社会所花的钱只是普通学校的三分之一。

这三类工作队实际上是革命战士——多才多艺、富有胆识和勇气的青年男女，他们从来不回避新的挑战。每派往一个地方，他们就尽一切可能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

我认为，扫盲和卫生工作队的前景取决于电信技术。各有三个电视频道的三颗人造卫星将射入固定轨道。这样，医

疗战士或者护士在偏僻遥远的村庄里遇有严重病例时，就可以请德黑兰或者其它地方最著名的专家予以指点。专家可以对他们说明必要的治疗方法。这种系统将把最著名教授的才能和经验、最优秀医生的医术用于最贫穷、与外界隔绝最严重的伊朗人身上。同时，一项至少花费300亿美元的电信计划将使伊朗每个小村庄与世界其它地方的通讯联系自动化。在这方面，我也希望伊朗进入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电信时代。这就是伟大文明的部分意义。

这里是我們从1963 - 1978年15年间在教育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的概况：

#### 学生人数增长百分比

托儿所	1,350%
小学	506%
中学	263%
中等学校	331%
技术和职业教育	1,550%
扫盲工作队学校	692%

伊朗学生总数由1963年的150万增加到1978年的1,000多万。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扫盲工作队的功劳。它们不仅仅是上课，它们还激起了人们的求知欲。

因此，农村小学的入学人数，由1963年占全国小学入学总人数的39.4%增长到了1978年的52.8%。这个百分比与我国农村人口所占百分比大致相等。伊朗学校的总数将是原来的3.24倍。最后，教育预算的比例扩大了。这一点，我相信，没有多少国家可以比得上。

## 教育预算

第三个发展计划（1963—1967年）——450亿里亚尔

第四个发展计划（1968—1972年）——1720亿里亚尔

第五个发展计划（1973—1977年）——5510亿里亚尔

第六个发展计划（1978—1982年）的预算中包括25,000亿—27,000亿里亚尔的教育预算。看来这个预算将永远不能实现。人口增长趋势表明，到1982年，在校学生将有1,370万人，大致比1978年增长40%。这些孩子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进行教育是应该的，可是我们需要提高教学质量，使之适应伊朗现代化生活的需要。白色革命的第12条原则体现了对提高教学质量的关注。

它的主要目的是使教材、教学方法和技术设备多样化，以适应伊朗人民今天和明天的真正需要。这种多样化表现在更加注重伊朗近代史和古代史——复兴波斯文化的传统和民间传说，恢复教授波斯语言和波斯文学，尤其是波斯文学中的优美诗词。技术和职业教育得到了加强。从中学开始的古典文学教育也进行了改革。

我们很快就使用了新的教学设备（视听、电视）。还通过晚上授课和训练的办法给成年人提供教育。在谈及卫生工作队时提到过的三个通讯卫星将能够向所有村庄提供质量最高的电视教育。

我父亲就曾宣布原则上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可惜缺少办法。我们仅能在扫盲工作队的学校中提供小学免费教育。由于采纳白色革命的第15条原则，伊朗全国实行了学校头8年

免费教育。

凡是同意在完成学业后为政府工作一段时间的人，8年以后可受到免费教育。工作期限由其在政府资助的学校学习的时间来决定。这样，读完了高中，就得为政府工作4年。当然，如果他偿付学习费用，就可以不履行这种义务。但在我们看来，要求学生毕业后为国家工作几年利多弊少，因为这种方法有就业保障，因而可安心度日。

1978年，有740万伊朗人进了公立学校。这个数字包括托儿所、小学、职业学校、以及我们为不识字成年人提供的免费夜校和专门训练。那一年，我们的大学有18.5万男女学生。除此之外，还有大约10万人在国外大学学习，其中有5万人在美国的大学学习。

我们在伊朗建立了18所大学，137所学院，其中设拉子和伊斯法罕的校园设计可与世界上最漂亮的校园媲美。校址是经过仔细选择的，各种设备都经过仔细研究。第二所校园计划建在哈马丹，在这里将用法语授课。

我们的绝大多数学生不仅获得奖学金，而且还拿到零用钱，他们生于50年代，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他们认为用最好的设备是很自然的事情。

今天，我终于认识到，1978年—1979年间发生的事件部分原因在于，我对大学开门招生问题采取了过急的行动，预先没有进行更加严格的挑选。入学考试太容易了。安德烈·马拉劳克斯曾经告诉我：“一个国家有一万名忠实的支持者是必要的。”我相信，他是正确的。我的部分错误就是没能向我的人民表明，忠实支持者可以是手工业者、工人和铁匠，也可以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

最紧迫的任务是使我们的青年适应于明天多样化的、朝

着科学方向发展的世界。我们希望他们不仅在精神和道德上经受严格训练，而且用有益的技术知识武装自己。我们竭尽全力使青年们能够上大学。

许多从未离开过自己村庄的父辈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儿子得到了什么：安逸的生活，在大城市里别无其他任务，只是同往往很合得来的一群人在一起学习。那里有图书馆和实验室供他们使用，还有希望去外国旅游。

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有时不知不觉地变得懒散了，而更多的是染上了与人对抗、争吵的恶习。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而得到的却是这么多，因此，在他们看来，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似乎是自然的。

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这些学生经常闹事，以至各大学最后陷入了一片混乱。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学生在支配学校的各项计划，因为他们年满15岁就有“投票权”。许多感到失望的教师已经离开了或者正在离开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现在权威已经无效了。仅在德黑兰，2,000名大学教员中就已经有1,200人要求提前退休。

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不能为青年提供今天和明天的世界所必需的智力和技术手段，如果不能扎扎实实地教授现代科学，那么，伊朗就会沦为第五等国家。

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属于每个伊朗公民，它不是特权阶层的独占领域。我曾试图使所有的人都有文化。皇后也深入参与了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工作。

有一种观念认为，所有属于过去的东西都是反动的，反对进步的和陈旧的。这种观念在伊朗资产阶级城市居民中非常普遍。这种态度倾向于贬低伊朗文化，使我们的人民忽视过

去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

为了保护和恢复我国人民和文化的古老艺术传统，皇后帮助扩大公共图书馆、组织竞赛、展览和艺术节，普遍促进和鼓励新的人材的成长。

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使波斯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恢复到了受人尊敬的地位。我已经谈过教学计划所做的改变，这些改变使我国的古典诗词发展到很高水平。电视拯救了被忽视的古老波斯音乐，使之得到许多人的欣赏。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得到复兴之际，最大胆、最勇于创新的艺术家们在我们的节日上，在现代化的剧院里汇集一起演出。在这些方面，皇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同在其它许多方面一样，由于在建筑上也有模仿西方的倾向，因此问题很严重。房地产所有者所建造的现代化建筑，其风格与规模常常与伊朗的农村和人民不协调。皇后曾多次进行干预，说服建造者们修复一些乡村住房，不要为了完全重建把它们全部毁掉。不过，正如所有访问过我们国家的外国人所知，我们也大胆地创造了新的式样，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正义和常识要求妇女同男人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因此，白色革命第5条原则改革了选举法，使伊朗真正实行了普选制。

革命前，选举法第10条规定：

“下列人员不得参加选举：妇女；没有法律能力和被监护的人；破产者；精神病患者；乞丐及以不正当手段谋生的人；罪犯、小偷以及其他做了坏事并违反了伊斯兰法规的人。”

这就是那些已经在伊朗篡夺了政权的所谓革命者的思



想。但是，如果想使国家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就不能把我们的母亲、姐妹、妻子和女儿贬低到与精神病患者和罪犯相同的地位。这不是神圣的《古兰经》的概念。根据伊斯兰教义，妇女的权利比通常人们所知道的要大得多。例如，妇女始终有权管理自己的财产。

我们的文化和文明从来没有认为妇女是下等人。而我们正是这种文化和文明的继承者，我们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的行为是符合我们宗教精神的真谛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的。

几千年前，伊朗神学规定有两组天使。两组拥有同等权力。一组是三个男子，另一组是三个女子。伊朗古代伟大的宗教著作，《丁·卡尔达》明确规定，妇女有权管理自己的财产，有权代表丈夫出庭，有权成为被父亲剥夺了继承权的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成为法官或者是仲裁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权履行祭司的职责。

我从来不认为，如果妇女露出她们的脸或者胳膊，或者去游泳、滑雪、打篮球，就会成为魔鬼一样的人。如果有些妇女愿意过蒙面纱的生活，她们可以作这样的选择。但是，为什么要剥夺一半年轻人对体育运动的健康兴趣呢？我们有些教士不明白，加强体育运动就是提高我们人民的健康水平，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妇女戴面罩只能限制她们参加白色革命以来伊朗妇女通常参加的活动。我们的妇女已经成功地管理了公共事务。我们的内阁中，有女大臣和女秘书。我们有女大使、女法官和女教授；妇女已被选为市政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和参议员。她们在与文盲作斗争中以及在卫生工作队中也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今天，在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一

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当全国一半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并且被迫象过去那样生活，全社会都要承受其恶果。我们的先知阿里说：“根据你们时代的要求，抚育你们的孩子。”这种退回到古代的习俗，将会妨碍伊朗妇女为21世纪抚育她们的孩子。

保健服务和社会保险是两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在这两个领域里，我们比西方主要国家足足落后了50年。

我们白色革命的第17条原则是关于全国社会保险和养老金问题的。社会保险是在劳动人民出事故、生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所给予的社会保障。此外，它旨在为伊朗人一生的各个阶段提供保障。尤其是更关心老年人，已婚年轻夫妇和家庭成员。有才华的男女青年也受到社会保险的保护。

我们的社会保险制度实际上是最先进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我们发给低收入的人的退休金高达他们退休时工资的100%，而且根据生活费用增长的比例增加退休金。

第16条原则规定为贫困的母亲和新生婴儿免费提供食品。这条法令将广泛扩大全国保健服务的范围。我们与传染病作斗争，推行接种牛痘计划，改善环境和卫生状况。给所有公民发健康合格证，记载接种牛痘和其他与健康有关的资料。

我始终认为，保护人民健康是一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为此，我们建立了许多保健服务机构。

历史最久的组织是“红狮与太阳协会”，这个组织是在我父亲当政时就有的。还有“皇家社会服务组织”和“保护妇婴组织”。这些组织除了为残废和智力迟钝的青年提供医疗和卫生服务外，还教给他们手艺，并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他们培训护士和社会工作者。他们调查劳动妇女和青年

在工厂的条件，并尽可能地提出正当的补救办法，以改进不利的条件。

皇后一直为许多这样的机构忙碌，她把全部身心和精力都放在这些机构上。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今天，虽然治疗麻风病已成了很平常的事，但是，由于人们对麻风病人的恐惧根深蒂固，因此，使已经治愈的麻风病人重新进入社会仍然存在很大困难。已愈麻风病人仍然被排除在社会大家庭之外。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皇后提出了一项新办法，为治愈的麻风病患者建立一座极好的模范新村。这引起了周围地区群众的羡慕和好奇，人们成群结队地前往观看。当皇后亲自前往参观时，人们对她深表爱戴，这使她十分感动。

皇后努力改善妇女状况，但是在使之适应现代需要的过程中，遇到了由于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造成的困难。然而她总是能找到折衷的解决办法。例如，在俾路支，女孩子不允许与男人交谈。自愿到三个工作队工作的女孩子就被派到那里去帮助她们，而应征人员则去帮助说服男人。

尽管有保守势力的反对，然而许多偏见还是被逐步消除了。在大部分地区，不仅学校里男女同班上课，不仅仅是男医生为妇女治病，而且可以看到，护士骑着摩托车去照料男病人。还可以看到医科女学生和社会工作人员骑摩托车。这确实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皇后鼓励“保护儿童组织”在地方官员的协助下，检查了有关未成年人的现行立法执行情况。这个组织在医院、儿童诊所和产科病房里，以及在教授婴儿护理和计划生育方面尤其活跃。

皇后主持的所有社会组织帮助和补充了官方政府机构的

工作。他们获得了一致公认的成功。实际上这并不奇怪，因为自愿人员都在一心一意地努力工作。

我在慈善事业方面所作的主要工作是1958年创立了负责社会和文化工作的“巴列维基金会”。1961年，基金会建立了行政管理机构。我正式向基金会捐赠了充足的资金，使之能够实现其目的。这次捐赠均为我的私人财产：土地、房地产、旅馆、以及我在诸如奥马兰银行、梅林保险公司、工厂等企业的股份。此外，还在纽约设立了基金会的独立分会，并在约纽市购买了一处房地产。预计，此处房地产的租金收入将足够维持基金会纽约附属机构的工作。

鉴于我的基金会主席职务是名誉性质，因此，由一名会长和管理委员会来管理基金会。由首相，参议院和众议院议长，最高法院院长和由4名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控制和监督基金会的工作。这个特别委员会每年公布关于基金会活动情况的报告。报告详细说明基金会在行政管理和财政方面所作的工作。

基金会的大部分活动集中在文化领域，其主要受益者是大学生。到1977年为止，有13,000名来自合格家庭的大学生获得了奖学金，从而使他们能够完成在国内或国外的学业。尽管我们有许多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但是获得巴列维奖学金的学生是最优秀的。

“翻译和出版协会”是基金会有一个重要分支机构。1977年，这个协会出版了500多部引起国际文化界兴趣的社会学、宗教、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同时还出版了许多过去一直未发现的我国文学名著。每年，我都要嘉奖“最佳书籍竞赛”的优胜作者和译者。优胜者是由大学教授组成的

专门评选小组评选出来的。同时也奖励成绩优秀而家庭贫困的中、小学生。

许多清真寺的维修，许多神学院、尤其是在库姆的神学院的供暖和照明设备的经费都由基金会支付。基金会还资助财政上有困难的宗教刊物。皇后进行的某些社会工作活动也得到基金会的帮助。

1977年，当德黑兰3间或4间一套的住宅每月房租猛涨到700-800美元时，基金会便着手建造低房租住宅。我们希望这样做将迫使投机商降低房租。在第一阶段，基金会建造了6,000套低收入公寓住宅。如果砖和水泥生产许可的话，计划再建造一些住宅。

我创立“巴列维基金会”是一种宗教性质的行动。对于西方读者，我必须向他们解释，在伊朗，进行这类捐款是不能阻挡也不能剥夺的权利。这样，负责管理基金会的人就只能根据捐款者的意图使用基金。我在伊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违反过这条原则。我不知道现在新政府是否仍然遵守这条原则。我也不知道基金会是否仍然为在国外学习的伊朗青年提供资金。前面说的只是我想到的一个例子。

由于西方报刊混淆视听，因此，我不得不明确声明，我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从巴列维基金会谋取私利。而且，1978年11月，我把我在伊朗的所有财产全部捐献给了基金会。我这样做出于坚定的信念，因此，我不后悔。

伊朗是个发展中国家，1968年人口为2,700万，1978年为3,600万，到1990年可能会达到5,0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我们要解决新增加的100万人的吃饭问题，满足100万人的住房需要，为1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由于农村人口大量

流入城市，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1956年，德黑兰人口为170万，1978年为450万，其它主要城市的人口同样有所增长。

	1956	1976
伊斯法罕	255,000	1,000,000
大不里士	300,000	900,000
迈谢德	250,000	950,000
设拉子	171,000	750,000

如同在其它地方一样，这样移居给伊朗造成了极端复杂的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给工人提供住房。这就需要对城市进行复杂的改造。我们不得不重建和改建许多住宅区。这就需要特别严格地控制大部分房地产所有者和营造商的计划。这些人往往关心的只是赚钱。我们对迅速上涨的土地价格进行了控制。各种形式的土地投机买卖受到了处罚。这就是1977年通过的白色革命第18条原则。与此同时，政府着手实行一项建造低成本公共住宅的计划，这项计划利用了私人承包商和现有资源，利用了新建的财政机构，如储蓄银行、商业银行以及政府担保的贷款。想购买住宅和公寓的人获得了低息长期贷款。

到1977年底为止，已建成大约31,000套住宅，它是政府发起的，共花费了14.4亿里亚尔（2亿美元）。另有4万套正在建造中。计划还提倡在工厂附近建造工人住宅区。

有两千多项供青年人使用的设施正在设计中，其中包括学校、大学、医院、综合性运动场、旅馆和假日营地。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基础设施薄弱，因此，我们的住房建设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我们仍然过分地依靠进口的建筑材料。我们的港口装卸能力仍然不足，因此，船只往往要等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卸下货物。我们缺少足够的公路和运输工具把卸下的材料运到内地。从而使我们的住房不足问题进一步加剧。

另一个问题是普遍缺乏劳动力。我离开伊朗时，伊朗没有失业问题，还雇用了100多万外国人，并在实行对伊朗人进行广泛训练的计划。尽管这样，我们的熟练工人还是严重不足。劳动力的培训跟不上我们国家前进的步伐。

我们国家基础设施的这些弱点对我国社会和政治气候的恶化起了一定的作用。它也使我国一直试图控制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我相信，这些障碍是暂时的。到1982年，伊朗将拥有满足自己需要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白色革命第12条原则的内容是革除我们行政机构中的官僚主义，这确实很有必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向一个多头怪物进攻，而这个多头怪物正藏身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

管理政府就是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们的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或者向这个理想迈进，每个官员就必须深切关心公共利益。我们的任务是要强迫那些迄今为止仍然反对变革的阶层接受在道德上和智力上进行的改革。由于我国人口增加了，我们国家发展了，官僚主义也向地方和基层扩展，因此，改革行政机构就变得更加紧迫。

所有这些因素促使公用事业成倍增加，从而也就产生了新的计划。

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弊端，就需要改组行政机构。但这

只有在工人改变态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把行政机构的革命作为教育革命的一部分，因为改革行政机构的目的是帮助伊朗人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成熟的道德。

我们曾设想，我们的扫盲、卫生和发展三类工作队会部分地把官僚主义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在我国人民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观念。我希望，《拉姆萨尔宪章》\* 复兴的教育制度能把这个新哲理传授给伊朗青年。那时，国家将看到它的男女青年作为可靠而又虚心的社会公仆向现代化世界迈进。

虽然我们的教育革命给未来带来希望，但政府工作需要立即改革。我们在政府各部设立“行政机构改革委员会”负责实行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使机关的办事程序现代化、分散化和精简，以及在可能的地方使用电子计算机。这些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在程序和方法上都有了許多进步。

1974年3月4日成立了“复兴党”。我认为各种社会地位的和各种主张的代表都可以聚集到一个党里来。我想，通过取消反对党，我可以请求一切有才干的政治人物给予帮助，而无须考虑党派纷争。我设想，今后这个组织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和思想学校，这个学校能够培养出行政改革所必需的公民精神。

“复兴党”将使政府各渠道追求的许多重要目标逐步形成一個统一目标。然而，经验后来表明，创建这个党是个错误。萨达特总统不得不在埃及废除一党制，恢复多党制。我认为他是正确的，因为“复兴党”没有实现它的目标，没有成为人民和政府间沟通思想、需求和愿望的渠道。

---

\* 1968年8月在拉姆萨尔举行的教学工作大会上起草的《教育革命宪章》表达了人们对改革措施的关注。



1975年到1978年间，顽固的官僚主义反抗力量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这个怪物不断改变模样，有时以进步的面目出现，有时涂上体面的传统主义色彩，但它一直反对改革。

1959年，我们建立了“皇家调查组织”。这是个现代名称。古代波斯人称之为“国王的耳目”。它所起的作用就象瑞典的专门负责调查官员舞弊行为的政府官员一样。这个组织由一批已证明是正直的人组成，他们直接对我负责。他们隐姓埋名，走遍全国各地，观察哪些机构和制度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任何一个伊朗人都可以向这个组织控告不公正的行为；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或者是公款使用中的不正当行为。

长期以来，说谎、敲诈勒索、贪污已成为常事。这些确实已成了我们官僚主义的痼疾。在建立“皇家调查组织”时，我就希望通过预先采取措施来避免这些弊病。至少对一些官员来说，“皇家调查组织”本身就是良知的化身。

尽管这个组织每年的预算只有30万美元，然而在1961年，我们的首相阿里·阿米尼以经济理由为借口，解散了“皇家调查组织”。这个决定是很大的错误，并且未能很快得到纠正。1976年11月7日，这个机构恢复了，称为“皇家调查委员会”。侯赛因·法道斯特被任命为主席。“皇家调查委员会”由来自行政机构、复兴党（那是我们实行一党制的时候）、商会、工矿业公会等的代表，最后还有来自新闻界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职责是研究政府各部的工作计划、监督他们的工作，纠正重大的组织问题。

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

及取得成果。

在我们试图积极进行行政改革的同时，我们还忙于下放行政权利。这样做必然使机关干部成倍增加。由于机构扩大，如果改革失败将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加紧战斗，以争取时间。

今天，在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下，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是非常次要的，因为，要处理的事不多。另外，由于国家的财富少了，因此也没有多少可贪污的了。

白色革命的目标有两个，实现这些目标就会影响投机商和诈骗者的利益。这两个目标是与通货膨胀、投机倒把（第14条原则）和贪污腐化（第19条原则）作斗争。我明白，这样做将会使国民中的某些人反对我：这些人就是不择手段攫取财富和有权势的富豪们。

第14条原则从1975年8月开始实行。那时，我们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0%，通货膨胀危及了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平衡。现有的法律无法控制不断上涨的物价。1975年到1977年间，我们与通货膨胀所作的斗争看来是成功的。生活费用指数下降了5%，在没有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控制住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但是到了1977年，消费品价格又开始上涨，价格限制没有得到遵守。我们呼吁大公司停止涨价，但它们不予理睬。

后来，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让学生志愿人员充当物价管理人员。学生们过分热情，有时进行威胁，他们不了解商业方面的现实情况，这就使许多零售商与我们产生了矛盾。有些年轻的物价管理人员很可能就是在煽动破坏我们的政府。

结果，零售商常常夹在批发商和不肯让步而又头脑发热

的年轻人中间左右为难。批发商不断要求抬高价格，而这些年轻人则要求小零售商蚀本出售商品。一些廉价商店的商人感到，他们受到了不公道的对待，因而强烈地反对第14条原则。

为了惩罚反对这条原则的犯罪行为，建立了特别法庭。这种法庭作出判决后不得上诉。1977年8月-9月间，8,000人由于违反物价控制而受到审讯。我们尽一切努力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工厂主和大联销商店店主被大量罚款；一些被关押起来；其他的则被吊销执照。

对外国多国公司、工会官员、县长、市长及高级文职人员强行进行制裁。为做投机买卖而囤积的大量商品被没收，并按规定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同时还颁布了新法令，以调节市场。然而价格继续上涨。

制定第19条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反对贪污腐化，尤其是与以权谋私作斗争。从此之后，所有政府官员——各部大臣、省长、市长等等都必须公开他们财产的净值。股票必须兑换成国库债券（利息为13%，免税）。或者在他们任职期间存入银行，投资公司或类似的组织，由它们来管理。

这条原则不仅是我们政府与贪污腐化作斗争的一部分，而且是伊朗道德和社会制度的支柱。政治建立在买好和裙带关系上，已使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必须加以制止。现在政府或省只能雇用那些愿意工作，并能老老实实为国家服务的人。给高级官员以优厚薪水也同样重要，因为，官员的低工资常常是贪污的根源。

这就是我对民主的理解。我们的白色革命保证每个人享有同样的经济和社会特权，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采取

这些措施决不是蛊惑人心，而是为了保护大众。

系统地实施第19条原则，将使高级官员取得必要的威信以便为其他人做出榜样。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许能成功地消灭贪污腐化。

虽然贪污腐化比比皆是，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在政府中加以消除。至少有两次我亲自进行了干预，并告诉外国行贿人，我们不容许这种行为。

有一次涉及与一个多国公司签定电信合同。问题出在贿赂未经授权的伊朗人1,200万美元。在揭露这个丑闻时，我们坚持要这家外国公司将1,200万美元付给伊朗政府。

第二件事涉及向格鲁曼公司订购80架F-14飞机。当我们得知，格鲁曼公司打算付给两名无关的伊朗中间人2,800万美元，我们坚持要这家公司将这笔钱付给伊朗政府。他们用提供备件的方式照付了这笔钱。

一家法国公司答应为我国修建地下铁道网，在与这家公司谈判时，我们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一开始我们就说：“没有佣金”，他们同意了。

1978年中，我签署了一项关于“王室成员道德品行”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所有对我家里人的控告都提交由司法大臣挑选的三个法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审理。这个委员会不妨碍任何人向普通法院提出对我的家庭成员的控告。许多人警告我说我这样做是向反对派提供棍棒来打我自己。

我们的国内政治是建立在人民参加管理、下放权力和民主化的基础上的。我们的白色革命使这些原则充满了活力。

公正法院、乡村委员会、市长、省长和扩大权利的省议会，是政治上相互起作用的工具。工人参加管理和分红制在我们的经济结构中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当然，武装部队、外交事务、财政、国家和地方警察及公共教育继续由国家集中管理。

我认为，集中控制公共教育是保证民族统一的一种手段。伊朗是由许多不同文化和传统的部落和民族组合而成的，在全国教授波斯语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共同团结。

一个人不受中央集权制束缚热爱他所出生的村庄、城市或者是省份，与他热爱伊朗民族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倒是更增强了他对伊朗民族的热爱和忠诚。

人民参加管理与权力下放是一致的，两者常常互相交织在一起。我在最后几年曾一直强调这一点，并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这些概念要求对行政机构进行彻底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集中力量培训爱国、诚实、具有献身精神并能主动开展工作的优秀文职人员的缘故。到1982年，将有300万人加入我们的劳动大军。这支力量将包括工程师、医生、技术员及其他毕业于高等学校的专业人员。

就我的理解来说，如果不实行人民参加管理，不下放权力，是很难实现民主化的。在我执政的初期，我就意识到伊朗需要民主。

一天，我父亲对我说，他希望给我留下一个“具有稳固制度因而能够存在并且实际上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帝国。那时我很年轻，这个主张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把它理解为对我缺乏信任。我想，这是礼萨王对我治理国家的能力表示怀疑。

紧接着就是他退出王位和外国占领。在这些磨难中，我认识到，虽然一个人可以继承王位，然而，权力只能自己赢得。尤其是在象我们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里，必须在人民

的帮助下才能获得权力。因此，只有代表人民，才是正当地使用权力。后来，当我们同伊朗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时，我发现在伊朗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伊朗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帝国，即种族特征、语言、风俗习惯、甚至宗教信仰都不同的人们的集合体（穆斯林占明显的多数）。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

把这两个词联在一起并不奇怪。根据伊朗的宪法（1906或1950年的宪法就是如此），虽然皇帝提出计划请政府接受，但是他仍旧只是宪法上的君主，他在位而不统治。

帝国民主就是在我们的境内，将所有的种族聚集在同一个民主旗帜下。这是在争取真正进步的斗争中，我们社会各阶级的联合。

## 十、外交政策

在伊朗处于关键地位的世界战略要地中，假如我们不能与我们的邻国保持和平，那么，我们白色革命的任何目标都不可能实现。

因此，我的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与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

尽管我们无意和其它国家交战，但是，我们已表明，伊朗将抵抗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

一旦苏联完全理解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能够与它就许多问题进行令人满意的谈判。我们就有关我们共同边界的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我们根据国际法，划分了阿拉斯河的河水，并（在一半对一半的基础上）建造了一座水坝。这座水坝可以发电，还可以灌溉大片农田。我们正在同俄国人共同修建一些类似的对半投资工程，以便利用这条河提供更多的灌溉用水和电力。我们共同生产的电力到80年代将达到每小时100万千瓦。

我们同苏联的贸易量很大，它已成了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我们向苏联人提供天然气，他们则在伊斯法罕为我们建造一座重要的钢厂。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美国人一直未能下决心承担这项工程。俄国人还帮助我们在沙漠北部（霍拉桑南部）和克尔曼附近勘探并发现了铁矿和煤矿。通过苏联海港运到伊朗的西方货物量占非常大的比例，并且成了我们贸易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很自然，我在苏联和伊朗曾多次会见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不谈，我真诚地钦佩勃列日涅夫先生。他是位杰出的外交家，他使他的国家成了今天最强大的国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核大国，很快又将成为第一个海上强国。至于它的陆军和空降力量，也是处于绝对优势，无与伦比的。

我还得补充一下，我们向俄国人和捷克人那里购买了大量军事装备。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受到热情的接待，并且与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交了朋友。

南斯拉夫与伊朗一起，如果不是在极度痛苦也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与约瑟夫·斯大林进行对抗的唯一国家。象南斯拉夫那样，把各民族统一为一个国家，并实现现代化，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人们必须明白，铁托元帅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任务。愿上帝使他的接班人也象铁托一样有才能。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不妥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独立意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有能力确保他的国家的独立。通过会见和谈话，我们两人成了好朋友。随着我们两国贸易的增长，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加深了。在这些困难的时刻，我们衷心感谢他忠诚的友谊。

从我父亲的时候起，土耳其和伊朗就是忠实的朋友。对伊朗来说，土耳其的繁荣和强大是十分重要的。现在，我真诚地为他们英勇的人民祝福。

1956年的巴格达条约巩固了我们之间的联盟。在条约签署后不久，我会见了赫鲁晓夫。他很不高兴，在欢迎我时，他说：“这个条约是侵略性的，是针对我们的！”



我向他指出，政界和新闻界的人们在谈论一条通过扎格罗斯山脉的防线。我问他：

“这些山脉在哪里，在俄国还是在伊朗？”

“在伊朗。”

“那么它确实是个防御条约。”我回答说。

赫鲁晓夫仍然用粗暴的语调接着说：“你们的这些条约有什么用？你们完全知道，我们用7枚原子弹就可以炸平英国，用12枚就可以炸平土耳其！”

与他交谈很困难——他有时态度粗暴，又总是固执己见。他出身农民，这使他有时心地善良、有时又很狡诈，同时又有些可爱。我们两人都同意执行善意的睦邻政策，我们坚持执行了这项政策。

后来赫鲁晓夫宣称，巴格达条约会象肥皂泡一样化为泡影。25年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正确的。

在1975年的阿尔及尔石油会议上，我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进行了长谈。我们同意忘掉我们之间的分歧，并成功地消除了殖民主义影响在我们之间造成的误解。

侯赛因总统同意根据国际法来解决阿拉伯河问题。象阿拉斯河一样，伊拉克和伊朗同意阿拉伯河按中间线划分。我们之间所有的领土争端也都全部解决了。

我对侯赛因总统说，从原则上讲，伊拉克的幸福和繁荣对伊朗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在阿富汗面临某些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本着同样的原则援助了阿富汗。后来，阿富汗政府出现更迭，政治方向发生了变化。西方大国对此毫不在意。

我们承认了阿富汗新政权，并继续给予经济援助。西方

的冷淡使我迷惑不解。这对伊朗意味着什么？我感到有些担心。难道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改变了吗？

巴基斯坦获得独立后，我是第一个访问巴基斯坦的国家元首。我们一直是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忠实盟友。我们向它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伊斯兰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我们推动它们建立和平与持久的关系。我一直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对抗是非常危险的。

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到波斯波利斯出席庆祝波斯帝国2500周年纪念活动时，我就是出于这种理由出面做工作的。我希望在他和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之间安排一次会晤，以避免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孟加拉问题上发生迫在眉睫的冲突。

我们与波斯湾另一边的邻国——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也保持了友好关系。

我曾几次去沙特阿拉伯旅行，对所有穆斯林来说，沙特阿拉伯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很高兴两次去那里朝圣。作为一个忠实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我希望沙特阿拉伯永远是麦加、麦地那等圣地的保卫者。每年有千百万人到那里去朝圣。

历史记载了沙特阿拉伯创始人伊本·沙特的形象。他聪明、勇敢，是位杰出的领导人。想到伊朗现在发生的不幸事件，人们看到沙特阿拉伯仍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不能不感到欣慰。人们只能祈祷上帝，让沙特阿拉伯继续保持自由和独立。

1973年，应阿曼苏丹国的请求，我向该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当时，阿曼受到南也门和共产党人支持下的佐法尔人的

威胁。我们的军队在阿曼进行了有力的干预，直到我的朋友苏丹成功地控制了局势为止。

中国与伊朗有外交关系。中国不要两面派。1978年8月，中国领导人访问德黑兰时，伊朗危机已发展到了顶峰。中国领导人的正直以及对国际政治的透彻见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会谈，我认识到，中国是关心伊朗强大的仅有几个国家之一。

波斯湾国家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危险。我认为它们需要实行团结政策。

同样，所有对印度洋真正感兴趣的地区——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缅甸、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所有东非国家，应该为他们的集体安全而通力合作。东南亚条约组织按理应提供这种保护。但是，实际上这个组织已经名存实亡。

我深切地感到，在印度洋周围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会有助于世界和平事业。它是可能实现的。但是，有人能容忍这样做吗？这样做将会排除俄国和美国的干涉。苏联和美国能承认它们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是没有必要的吗？

1974年，在访问澳大利亚时，我就提议，印度洋沿岸国家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我向新加坡和印度也提出了这条建议。这个想法在每个地方都深受欢迎。

根据我的计划，对各成员国的需要与可能进行研究后，一个交流和相互援助的计划将付诸实施。例如，我曾宣布，伊朗准备为印度的工业化，为印度的矿藏和农田开发作出贡献，

没等共同市场建立，我们就向苏丹、索马里、甚至塞内加尔以及其它西非国家和黑非洲内陆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

我对南非领导人进行调解，试图为纳米比亚问题寻求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为了促使罗得西亚问题的公正和平解决，我还会见了所有的罗得西亚黑人领导人。这一和平行动当时使我赢得了英裔美国人的感激。

伊朗和非洲之间只隔着阿拉伯半岛、红海和印度洋，看到共产主义沿着三条轴心线向非洲渗透，我深感忧虑。第一条轴心线是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轴心线，也就是从利比亚到乍得、苏丹、索马里；第二条轴心线旨在通过陆地把地中海和大西洋连接起来；第三条轴心线是从安哥拉到莫桑比克，把非洲一分为二。共产主义在非洲渗透的轴心线是真正的分界线。纵横两条轴心线把非洲大陆分割开来。这种渗透是一个广阔的战略行动，有打乱整个非洲的危险。明天，所谓黑非洲可能变成红非洲（为了挫败这些行动，我曾经想在财政上资助修建一条连接非洲东、西海岸的现代化铁路）。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30年代中期在抵抗意大利人的斗争中，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力量。我每次与他交谈都很愉快。我们的谈话是坦率的、激励人心的。有时我也毫无顾虑地向他提出进行某些改革的建议。

当我还是个青年学生时，我就听说，他在日内瓦国际联盟高等法庭上为他的国家进行辩护，但没有取得成功。那时的国际联盟象我们现在的联合国一样没有权力。今天，埃塞俄比亚出现了什么情况？

我们在设想增加对乌弗埃·博瓦尼统治的象牙海岸，加蓬和塞内加尔的援助。

非常牢固的关系把我和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联系在一起。他对我的非洲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作用。列奥波尔德·

桑戈尔是一位享有国际威望的外交家和卓越的领导人。他精通法语，是位真正的诗人。我们详细地讨论了关于“非洲黑人自豪感”的思想，这是非洲精神的真正结晶。我对这个思想充满共鸣，因为在我一生中，我的波斯根源一直是我的部分本性。

幸而有萨达特总统、侯赛因国王和哈桑二世国王这三位不寻常的人物，埃及、约旦和摩洛哥的形势才很稳定。

我们不能忘记，安瓦尔·萨达特继任纳赛尔成为国家元首以后，他领导的国家不仅已战败，而且蒙受了耻辱。在埃及，公众舆论被骗人的口号引入歧途。萨达特再次进行了战争，由于有苏联的武器，萨达特第一次取得了胜利。但是，他感到这个胜利的代价太大。为了维护和平，他感谢苏联顾问，并制定了只对埃及人民有利的独立政策。

实行这种完全相反的政策，一个人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同时也必须有巨大的勇气。萨达特已作为埃及已知的一位真正政治天才载入史册。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触目惊心的情况下，他是怎样慷慨地欢迎我的。我热忱地为这位伟大的埃及人和他的人民祈祷。

至于约旦国王侯赛因，我对他永远赞美不尽。对我来说，他不仅是朋友，而且也是兄弟。他是个坚强而又善良的人。在他身上，巨大的勇气和他对祖国的深爱已融为一体。在许多场合下，侯赛因知道如何面对逆境，并且行动果断。由于侯赛因国王的政治智慧和果敢精神，约旦独自维护了自己的战略地位。有件事能说明他的英勇。在梅尔·阿布伐尔·纳赛尔煽动下，一位约旦将军发动了军事政变。一支警卫部队发

生了暴动。侯赛因国王只身前往暴动部队的兵营，并向部队发表了坚定的讲话进行说理。当他结束讲话时，士兵们发出欢呼，并且跪倒在他的脚下。

作为王储，我的朋友哈桑二世确实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他肯定交了好运，以致几次逃脱了暗杀的阴谋，并且取得了向被收复的撒哈拉中部进发的著名绿色进军的成功。

他是一位具有罕见优雅风度和有教养的君主。他既是伊斯兰教神圣先知的后裔，又是波尔多大学的法学博士。他把《古兰经》和欧洲文化完美地集于一身。

不用说，我将为他和他忠诚的人民祈祷。在1979年1月的灾难性事件之后，他对我及我家属的态度，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的态度是对所有忘记了神圣先知真正高尚教导的人的挑战。

至于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伊朗坚定地把自己列入西方民主国家之列。多年来，我们国家与法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法国对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帝国主义的表现，它对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许多的贡献。我第一次会见查尔斯·戴高乐将军时我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君主。我立即被他非凡的性格吸引住了。在听他谈论法国时，我对我国所怀的希望和理想与他发生了共鸣。他很有口才，他对他国家未来的信念表达得很有感染力。

自然，以后我们又多次见面，不是在法国就是在伊朗。每次会见都使我们之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加深。我们不断通信，更进一步地增进了这种关系。在他去世时，我参加了在圣母岛举行的葬礼，后来在科龙贝受到了戴高乐夫人的接

见。在那种悲痛的时刻，我受到了如此重视使我深受感动。

我作为一个君主，这位热情的爱国者是我的榜样。要衡量他的伟大，人们只要把法国1956年的情况与他退出公职时候的情况比较一下就行了。

我们与法国的关系非常牢固。然而，我们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往来则很频繁而且数量也大。此外，我们最近又增进了同美洲其它国家的商业关系。

我已明确声明，我们的外交政策只为伊朗服务。但是，只有我们的近邻保持和平状态，才最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一点我们同样也很明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实行友好睦邻政策，并根据我们的财力实行一项互助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与西方、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共产党中国保持合理平衡的关系。

我不认为世界各国人民保持牢固而又真诚的团结是幻想，这是现实。我认为，这个现实应该毫无例外地支配所有国家的对外政策。我一直在竭尽我国的全力，实现这个理想。

人们只需看一眼世界地图就会了解，在西方人眼中世界上150个国家里只有28个被看成是民主国家。这些国家无论是工业占主导地位，还是农业占主导地位，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经济繁荣，生活水准高。

在这个“富有国家俱乐部”之外，例如印度次大陆，从理论上讲是由民主政府统治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扫除文盲，改善不良的保健设施以及平息内乱。他们不肯实行现代化。他们的贫困来自于经济不发达。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我们时代陷入最大困境的一个核心问

题。这个问题沉重地压在处于“富有国家俱乐部”之外的所有国家身上。问题是，发展还是不发展，是继续做第三世界温顺的成员，还是试图跨过门槛，进入现代文明之中。

这些国家面临着如果不是不可克服的也是巨大的困难。他们常常财力有限，几乎总是缺乏经验和称职的专业人员。他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竞争，同毫不让步的工业化国家竞争。那些富有国家在处于发展阶段的时候，从来没有被迫要应付这些问题。他们没有遇到过可怕的竞争者，因此，他们能够太太平平地为建立民主国家作准备。他们在自己科学技术能力的基础上，建立了稳固的经济。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种令人羡慕的条件。

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缺乏稳固的经济结构，哪个国家也不能自称获得了政治独立。这是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就今天而言，是经济实力在保证一个国家的自由和主权，是经济实力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提供了条件。

因此，1973年，我建议，12个工业化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12个成员国一起建立“国际援助基金组织”，每个国家向这个组织提供1.5亿美元。这个基金组织的委员会除了24个创始国外，还包括12名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成员国将共同研究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项目。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使受援国逐渐获得经济独立。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作为顾问，为兑换货币和筹措资金提供便利，并同意提供为期20年的贷款，年息为2.5%。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都赞成这项计划。

这项计划为国际发展银行援助有困难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范围。这个组织必须是完全中立、独立、政治上不



承担任何义务，并向所有人开放的组织。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增加了。我先前建议的钱数也应该增加，还应当考虑到石油价格的增长。

根据我最初提出的建议我们可筹集到30亿美元，现在则需要筹集200亿美元。

这个基金组织将起到国际合作组织的作用，或者更好一些，起到一个拥有行政权的经济联合国的作用。

这些有关国际经济合作的建议是在世界能源问题以及前面所说的《世界报》外交增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问题制定暂时解决办法的范围内提出来的。

毫无疑问，这个计划是大胆的，但不是空想。它直接呼吁国际团结，并能成为保持卓有成效的政治经济稳定的一个因素。

我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就这种会议进行了多次会谈。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我们同意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尤其是能源问题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通盘考虑，这样就可以为这些问题找到国际解决办法。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获得世界和平。

我高兴地看到，在联合国的赞助下，一个类似的计划终于受到勃兰特委员会的重视。早就应该这样做了。我希望勃兰特先生的努力将取得成功。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不能不简单地谈谈我们的军备政策。我不断重申，伊朗没有扩张主义的意图。我们不希望把我们的政治、社会或经济观念强加于任何人。我们在联合国的行动始终是着眼于缓和、和解与和平。

然而，我们绝对独立的政策使我们有必要拥有军事实

力。伊朗整个古代和现代历史都清楚地表明有这种需要。当我们的武装力量软弱时，我们的国家就遭到蹂躏；当我们强大时，我们的国家就免遭外国侵略。军事力量常常成为我们生存的唯一保证。

我的父亲礼萨王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认识到拥有国家武装力量的必要性。他知道，要控制边远省份常常造反的部落首领就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由中央控制的军队。没有国内的和平，伊朗就永远不可能生存下去，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了。

1920年，我父亲从俄国人手中接过了波斯哥萨克骑兵部队的指挥权，并开始建立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军事力量。礼萨王把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国内安全上。那时，“英国控制着海洋”，因此，也就保护了我国免遭外国侵略。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杜鲁门总统领导下的美国通过他们的共同安全计划支持了我们的防卫体系。1949年7月25日，杜鲁门总统在给国会的特别咨文中说：“伊朗使用美国的剩余军事装备帮助它提高了军队的防御力量……。现在有必要再提供一定数量的装备……以加强伊朗保卫国家独立的能力。”在我与杜鲁门的所有会谈中，我始终感到，他是一位坦率、诚实的政治家。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美国通过共同安全计划继续向伊朗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到60年代初期，肯尼迪总统也承认伊朗对西方具有战略意义。1962年4月，我访问美国时，肯尼迪说，他认为我是“……维护（我的）国家独立的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我们现在欢迎的不仅是国王而且是在欢迎一位朋友和非常勇敢的战士……。”在那次访问中，他后来又重申了我们两国维护伊朗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双

边协议。我们还同意有必要做出集体安全安排。

然而,1968年1月,英国宣布从波斯湾撤军。而3个月前,英国外交部派来的戈伦韦·罗伯茨先生还向伊朗保证,英国无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离开波斯湾。他们态度180°的大转弯使我大吃一惊。我只能设想他们期待加入共同市场促使了这种转变。此后不久,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不再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这样一来,我们的安全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证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1971年,英国人撤离前夕,我们占领了汤布和阿布穆萨岛。在伊朗人仅占人口六分之一的巴林,我们同意他们实行自决。巴林选择了独立。

到那时,埃及的纳赛尔制造地区不和已经得逞。利比亚的卡扎菲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阿拉法特继续进行煽风点火的活。那时我知道,由于伊朗不断发展和繁荣,我们将会成为对各类外国掠夺者具有越来越大吸引力的捕获物。

所有这些情况都使伊朗不能有自满情绪。为了保证边界的安全,我们不仅需要在海湾沿线,而且也要在东边经常保持警惕。我们有可能遭到来自这些方面的入侵。且不说我们邻国苏联的突然袭击,即使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也都经常发生内部动乱或与外国发生冲突。

波斯湾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没有象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那样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道。阿曼湾和印度洋的稳定同样是我们极为关注的。要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就需要与站在阿拉伯一边的国家继续保持友谊。我们必须拥有十分强大的军队,以防止这些友好的,但是装备很差的政府被推翻。只有让游击队知道,伊朗已作好准备采取迅速而又有力的行动来保护这些国家,才能制止他们的活动。

在波斯湾外面，阿曼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道容易受到潜艇的袭击。为了在这方面进行防卫，我们必须对海军力量进行大量投资。

我已多次声明我坚决主张避免使用甚至拥有核武器。到1982年，我们的常规部队将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之一。这支军队不仅将维护我们在波斯湾的利益，而且还将维持印度洋的稳定与和平。

我们需要多少军备才能保证这种安全？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附录4列出了到1982年伊朗将拥有的军备细目。我们的军事项目从来不保密。恰恰相反，大家都知道这些项目。1977年12月，我与卡特总统在德黑兰会谈时，他重申了他对我们所作努力的支持。他称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一个多事之地的“安全岛”。伊朗确实是中东能够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国家。我的出走改变了这一切。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麦加发生的可怕袭击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中东集结了一支难以攻克的军队，结果我被指责为妄自尊大的狂人，在人民被剥夺了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我反而把伊朗的钱大手大脚地花在了武器上。

说我们拥有军队力量已足够了，是主观主义的。据我所知，世界上有地位的军界领导人中没有人批评我的武装政策太过分。至于说为了支付军备费用而使伊朗人民丧失了生活必需品，这种说法就更不符合事实了。付清了军备费用后，伊朗还有1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 十一、不光彩的红黑同盟

将证明破坏性极大的红黑同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它在伊朗人的意识中有很深的影响。黑色——教士——曾经反对过我的父亲，对于我的统治也只是偶尔表示支持。宗教狂热分子并不理解伊斯兰教的实质。他们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与人民党结成同盟。在调查1949年费克尔·阿里行刺未遂事件中就证实有这种同盟。摩萨台政府证实了在红—黑同盟的非共产主义成员没有清楚理解其后果的情况下，这个同盟是怎样兴盛起来的。50年代初期，人民党只是等待时机，等待摩萨台把我赶下台，他们就反过来有把握地消灭摩萨台。摩萨台突然倒台后，我们从人民党办公室发现的文件中得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今天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共产党人也在等待霍梅尼把我国引向混乱、贫困和绝望，然后再接管国家。

新闻界、大石油公司、英国和美国政府则是这个奇怪混合物的其它成分。1957年我与国家碳氢化合物公司的恩里科·马太成功地达成了75/25分成的石油开采协议，此事激怒了国际石油卡特尔。从政治上讲，我表现出的独立性大大超过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愿意容忍的程度。当然，英国人一直把伊朗看成是一块封地，并试图支配我们国家的生活。摩萨台的不幸事件使美国人出场了，并促使华盛顿进行干涉。

他们共同的不满，其后果到50年代后期变得更加明显，后来爆发了反对我的统治的第一次学生示威。十分有趣的

是，这次示威发生在美国。1962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我头顶上的一架飞机飘着一个条幅，上面写着：“瞧这国王，他该倒霉了。”很清楚，这是一次有组织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破坏我和我的政府的声誉。我不得不认为石油公司和一个象中央情报局这样的组织参与组织并资助了这场反对我的运动。这种作法带有专业色彩，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单依靠自己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不相信，那个时候克格勃在美国的活动能那样有效。

在此后的20年中，每当西方感到需要限制我的时候，学生和新闻界就不时重弹反伊朗的老调。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就是这种时期。石油禁运和世界石油价格暴涨以后的那些年也是这种时期。

60年代初期对我们来说是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它正好也是肯尼迪政府开始执政，美国加紧阴谋反对我国的时期。我曾反复警告过肯尼迪可能会出现石油危机。但这位总统嘲笑我是过虑。在我们的一次会谈中，他自信地说，即使切断中东的所有石油来源，美国的石油储备也足够全世界用两年。同这种虚伪的自信进行辩论是很困难的。

这个时期，伊朗学生和教师举行游行示威，德黑兰大学暂时关闭了，民族阵线也恢复了煽动性的活动。美国压我任命摩萨台的经济部长，当时的反对派领袖阿里·阿米尼为首相。我当时的首相沙里夫·埃马米警告我提防美国的阴谋，但我没有相信他的话。1961年5月，我屈服了，任命阿米尼为政府首脑。15个月后，由于阿米尼对经济和政治问题处置不当，他辞职了。甚至美国人也不再相信他的能力。由于比较好地控制住了局势，我终于能采取行动，并开展了白色革命。这样，我就从我的外国“朋友”和国内敌人那里赢得了

10年的喘息时间。

我想还是说我赢得了部分喘息时间。长时期来，恐怖主义成了伊朗政治生活的特征。无论我怎样尽力，而且上帝知道我确实尽了力，但是，我的国家一直没有完全摆脱恐怖主义。我已叙述了1949年暗杀我的企图和1951年谋杀我的首相拉兹马拉将军的情况。1955年底，行刺者开枪打伤了我当时的首相侯赛因·阿拉。我前面已经讲了，我是1965年4月10日第二次暗杀企图的受害者。一个年轻的士兵一路射击闯进了王宫。后来的调查表明，他的行动是大学人士策划的极左翼阴谋的一部分。

1965年1月21日，穆斯林狂热分子开枪杀害了我的又一位首相哈桑·阿里·曼苏尔。后来又有几位将军被杀害。70年代初，恐怖主义者又在德黑兰大街上杀害了3名美国上校。这种残害人身的罪恶并不仅仅是针对重要人物或知名人士的。我记得另外还有一些受害者。例如，有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和汽车擦洗工在试图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时被打死。

当然，新闻界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大肆宣扬恐怖活动，并把它们描绘成是我的错误统治的结果。他们的宣传有时竟达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1959年底，艾森豪威尔到德黑兰进行访问。我在沿飞机场到王宫的路上部署了仪仗队，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这都是欢迎来访国家元首的习惯做法。报纸却报道说，国王如此担忧他的性命，以至于把所有士兵都派到街上来保护他。还有一次是在60年代，当时我们到里海的国王避暑别墅作一年一度的休假，西方报刊报道说，国王已逃离德黑兰，在北方避难。

我无法制止这些荒谬的报道。我接见了所有在我国呆过的外国新闻记者，经常为所有的报纸、电视和广播记者举行

记者招待会，访问美国时和在德黑兰时定期在美国电视上出现，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也许由于我对我所说的话及表达方法太自信，所以，我可能显得有些傲慢。但是，我所想的是要外国新闻记者了解伊朗——它的历史，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它的前途。遗憾的是，大多数记者对于伊朗过去是什么样子，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都带着先入之见。他们的见解总是根据西方的标准。不过我一直鼓励进行辩论，辩论可以使你充分表示自己的见解，我就喜欢能引起争论的提问。令人遗憾的是，记者们仍旧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观察我国。他们从来不把伊朗看作是一个与苏联接壤，文化和宗教标准有很大区别的中东国家。因而，他们把我归类于镇压性的统治，这是不公正的。在国外的伊朗学生听到和看到的都是外国人对他们祖国的侮辱和诽谤，所以他们也要求把伊朗建成与过去不一样而短期内又不可能建成的那种国家，这并不奇怪。

石油禁运和油价暴涨之后，新闻宣传变得更加恶毒。美国政府某些领导人的言论没起好作用。比如，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就把我称作“怪人”。于是，新闻界就幸灾乐祸地给这场争论火上加油。西蒙对我的污辱导致新闻界把我称为应对石油涨价负责任的人。但是，正如我前面已经详细说明过的那样，没有人费心去解释我提高石油价格的理由。

由于这种诽谤，我完全可以理解西方的开车人对汽油价格上涨和汽油短缺感到愤怒。他们只被简单地告知，所有这一切都是国王的过错，而很少有人去告诉他们，他们政府的关税收入因此增加了多少。

新闻界的攻击，恐怖主义，学生闹事，西方开始压我实行自由化，所有这一切在70年代中期都开始向我的政府头



上一起压来。令人奇怪的是，教士们在这些年里基本上都保持沉默。一些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带有左翼思想意识，他们应对部分恐怖暴力行为负责，但是他们不是教士的主流。我登基时宣誓要维护宪法，捍卫我们的信仰，即12个伊玛姆的什叶派宗教信仰，而教士们则承认我为国王和信仰的保护者。我是个信教的人，是有信仰的人。我信奉神圣的伊斯兰教《古兰经》的信条，即平衡、公正和温和的信条。然而，在我统治期间，仍有部分教士反对我进行改革，反对我为使伊朗社会现代化所作的努力。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有时采取暴力的反对形式，比如在6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期间。但是，直到1978年春我去迈谢德作一年一度的朝圣时，我仍然不仅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还有成百上千的教士对我表示尊敬、忠诚和爱戴，而这恰是在一些毛拉参加颠覆活动的时候发生的。

有组织地反对我统治的最初迹象发生在1976年底以前，反对者是我们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左翼分子及富豪。当时，我已经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司法人员协会和大赦国际审查我们的刑事审判制度。我很乐意征求并欣然接受他们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对于他们的某些建议，我们非常重视。不用说，新闻界极为详细地报道了所谓的弊病，但根本不注意在这些组织审查之后我们所进行的变革。

1977年初，长期以来使我们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的恐怖活动突然停止了。我明白，这种情况决非偶然。这样的行动是精心安排，并且经过周密考虑的，我确信这种不祥的沉默不会是例外。这些冷酷无情的恐怖分子平常总是用机关枪在街道上胡乱扫射，任意杀害无辜的男女和儿童，如果他们停止了这样的活动，那么必然会发生其它事情。人民中间确实

有我的“耳目”，但是，他们很少给我带来确切的情报，所以，我不可能看出突然停止恐怖活动的更深含义。这件事情说明有必要进行更加迅速的改革。因此，在此后的两年里，完成合理可行的改革的紧迫感大大增强了。我希望用这种办法冲散我的对手所提出的既不合理又不切实际的彻底改革要求，我们政府的基础结构没有能力经受这样的彻底改革。

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结果，我越实行自由化，伊朗国内的形势就越糟糕。我所采取的每一个主动行动都当成是说明我自己和我的政府软弱的证据。

到1977年夏天，我感觉到会出现新的麻烦。也许我的直觉比我的人在城镇和乡村收集到的情报更加准确。我感到需要进行某种政治变革。自从1965年以来，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一直担任首相。在我的历届政府首脑中，他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胡韦达是一个有才能、有献身精神的人。他自己也感到，他任职时间太长。实际上，当我要求他辞职时，他松了一口气并对我说，首相任职都不应超过5年。由于我重视胡韦达的意见，因此就任命他为宫廷大臣，这样便保证了我与他在保持个人亲密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听取他的忠言。

1977年8月，我任命纳姆希德·阿穆泽加尔为首相。那个时候外交政策问题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注意力，我认为让阿穆泽加尔处理这些问题非常合适。多年来，他一直是伊朗驻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代表。在石油输出国组织艰难棘手的会议上，他表现得很出色。况且，他还曾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工程学学

业，在美国仍有他的好朋友。在伊朗，他是一个以正直而闻名的人。作为复兴党的总书记，他有自己的政治基础。最后一点，我们还可以把对他的任命作为促进伊朗国内民主的新自由化运动的起点。我要避免全面崩溃。我知道，如果自由主义者和左派的要求得以实现，这种全面崩溃将会随之而来。

那年秋天，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我有机会重申了显然已被遗忘的美伊协议，以便引起公众的注意，和促请西方警惕苏联决心控制世界的意图。在那次与阿诺·德·博什格雷夫的谈话中，我与他讨论了美国与伊朗1959年3月5日签定的双边协定。我提到，根据这项协定，美国认为，伊朗的独立对它自己国家的利益极关重要，因此，美国应该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美国还答应，如果我们遭到进攻，它将帮助伊朗，虽然这后一项承诺是用含糊不清的外交辞令表达的——它只是说，将采取相互协议的适当行动。我还对西方与苏联的侵略行为作斗争的决心表示关切。我提到，要弄清楚美国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愿意起而与苏联的侵略行为作斗争，现在越发困难了。这次谈话也使我有机会讨论了南-北问题和不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债务问题。当时我说，虽然西方不能取消债务，但是必须与不发达国家达成一项新的协议，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占世界人口10%的人不可能长久控制世界上90%的财富而不发生世界性的动乱。重新分配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开辟财富的“新”来源才是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需要。与所有发达国家——东方、西方都一样——进行合作对这种努力是极为重要的。

那年秋末，在我们访问美国期间，我们外交上的困难显得最突出。同以往的正式访问一样，我和王后在弗吉尼亚的

威廉斯堡过了一夜，以便参观仿古的景致。几百名伊朗学生聚集在我的旅馆附近，以表达他们对我的忠诚。当我停下来与这些学生作简短交谈时，我还注意到另外一小群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戴着面具，围着一杆锤子镰刀红旗站着。他们口出恶言，辱骂我们。他们为什么要戴面具呢？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知道了，这些示威者害怕萨瓦克\*。在我看来，比这个荒谬的指责更加可信的解释是，这些面具遮掩着非伊朗人的示威者——在当地雇用的职业肇事者。在任何一次事件中，反对国王的抗议者都没有超过50人，而我的支持者则将近500人。

第二天，报刊颠倒了数字，并写道，国王的50名支持者被敌对的人群淹没了。可以想象，当我看到这个报道时，我是多么惊愕。在我访问华盛顿时，报纸同样颠倒了数字。这次示威的规模更大，也更加猛烈。几千名居住在美国的伊朗人聚集在白宫南面的椭圆草坪上欢迎我们。他们坐在仓促安装起来的露天看台上，竖起一面写着“欢迎国王”字样的白色大横幅。另外还有一群人数少得多的示威者，最多几百人。他们聚集在总统官邸另一边的拉斐特公园里。他们也戴着面具，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面具保护我们免受萨瓦克的迫害。”

在我们到达白宫南草坪出席欢迎仪式时，示威的“学生们”冲向支持我的和平集会。他们挥舞标语牌柄和钉有钉子的木板。警察对这场暴力行动没有准备，他们退却了，并使用催泪弹来恢复秩序。骚乱结束时，有130多人受了伤。新闻报道再一次颠倒了数字。例如，《时代》杂志写道，上千名

---

\* 伊朗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的简称。

“国王的反对者”聚集在拉斐特公园对付“几百名国王的支持者”。被颠倒的两个数字倒是准确的。美国报刊并没有鞭挞肇事者。一家报纸还故意写道：“那么，是谁出钱让国王的支持者来美国的呢？”另一家报纸则指控我的政府为他们提供了经费，还额外给了每个支持者100美元。这些说法当然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却没有人想去调查肇事者得到的支持来自何处。

我知道，他们中间伊朗人很少，大多数是年轻的美国人——金发碧睛的白人、黑人、波多黎各人和一些阿拉伯人。而且，外国人为他们出了钱。当时我收到报告说，为了支付反对国王的示威者来华盛顿的费用，欧洲和其它地方汇来钱在纽约建立了一个假基金会，还组织汽车把人们从纽约和其它城市送到华盛顿。我也知道，其他许多示威者是用飞机从遥远的洛杉矶送到华盛顿来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却没有人报道。报刊忙于详细报道我的所谓侵犯人权的问题，以及“国王的政治监狱里关押着2.5万到10万名政治犯”。

然而，公平地说，《时代》杂志确实报道说，我已经着手执行一项实行自由化的计划，阿穆泽加尔首相已经采取行动，取消了新闻检查，放松了控制，还释放了几百名政治犯。“几个月之后”，《时代》杂志1977年11月写道：“警察国家的气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的气氛是个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心情更加轻松。”这篇报道出现在我被赶走的15个月之前！

我与卡特总统的会谈进行得很好。在美国前三届政府执政期间，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很深、很友好——我一直把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当作朋友——我们继续发展我们的友谊是很自然的。保持友好关系终

究符合我们两国间的最大利益。卡特看起来是个精明的人。

美国新总统访问德黑兰，并与我们在尼亚瓦兰宫一起过除夕，更加深了我对他的良好印象。我从来没听到过一个外国政治家在评论我时使用他那天晚上那种赞扬我的词句。卡特在晚宴上发表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他说：“由于国王的卓越领导，在世界上一个多事地区里，伊朗是一个安全岛”。他接着又说：

“我们的会谈是无法估价的，我们的友谊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国王以他的智慧和经验，对我，一个新领导人，很有帮助。我感谢国王。”

一个星期之后，1978年1月7日，爆发了第一次骚乱。教士是这次骚乱的主要鼓动者。示威者穿过街道，潮水般地涌向圣城库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到库姆拜谒伊玛姆礼萨的妹妹玛苏梅的陵墓。我毫不怀疑，共产党人已经渗透到参加抗议活动的4,000名宗教学生及他们的支持者之中。我同样确信，不满的反叛毛拉是这次骚乱的中心人物。这次骚乱死了6个人，而新闻界报道时把这个数字过分地夸大为死了几十人，伤了几百人。平静一年以后，又恢复了暴力行动，这使我很不安。我认识到，政治性的动荡在伊朗已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些阴谋家，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都改变了策略。现在我们面临着有组织的暴力行动。

为了对抗这次示威行动，几天之后，3万人在库姆游行以表示对我的政府和统治的支持，但是已经太晚了。在库姆暴发的那次示威中牺牲了几个毛拉，于是经过精心安排，他们把纪念“失去亲人”的办法老练地推广到其它城市。根据穆

斯林的传统，死者的父母和朋友要在亲人死后的第40天聚集到墓前进行悼念活动。萨瓦克的“受害者”全都成了举行这种墓前集会的借口。我的对手从悲伤的家人那里抢来尸体，扛在肩上游行，喊着：“这是现政权的又一个受害者，萨瓦克的又一桩罪行。”示威者扛的尸体许多都是正常死亡。有些是犹太人，他们的教规规定，死人必须在死后24小时之内埋葬。那些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热衷于欺骗和暴力。他们肆意践踏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促使每天都暴发示威，4天的周期举哀变为了成例，示威活动就更加频繁。这些抗议者当然总是更多地采用暴力，也常常导致更多的死亡。它形成了一个自身永存的破坏周期。

很难想象，所谓的信教人还能做出超过1978年动乱时的更加恶劣的举动。这些反叛者经常假装受伤，在身上涂上红药水，以便看起来似乎被打伤了，还流了许多血——尤其是有不负责任的摄影记者在场的时候更是如此。

另一个暴力浪潮冲击了大不里士市。2月18日这里发生了暴乱，并且很快波及圣城库姆和迈谢德。这些地方的局势得到了控制，但是，采取了许多武力才做到了这一点，也许是采取了过多的武力。3月5日，我的政府为处理暴乱的方法不当惩处了一些警察和萨瓦克官员。附带说明一下，这表明，我们从来不允許萨瓦克毫无约束地进行活动。随着暴乱的蔓延，潜在的社会问题又开始暴露了出来。不光彩的红黑同盟开始得到巩固。回想起来，大不里士的暴乱标志着努力削减我的权力的开始，以便使我成为软弱而又不起作用的“立宪制”君主，最后把我赶下台。

在我的统治下，伊朗确实有了迅速的发展。几年之内德黑兰由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50万人

口的大都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然会出现一些社会和经济失调。伊朗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在我离开我国时，已有100万外国工人受雇在各级经济部门工作。（在霍梅尼的统治下，所有外国工人都已离开伊朗，并有400多万伊朗人失业）。住房建设跟不上需要。由于住房短缺，德黑兰和其它主要城市一样，房地产价格飞涨，贵得惊人，有些人因此而发了大财。豪华住宅点缀着德黑兰的城市风景。我力图建筑低收入住房，但进展缓慢，因为砖和水泥生产跟不上需要。港口和交通运输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使问题更严重了。进口的水泥堆在码头边上失效了。

但是，我对形势还没有失去控制。民众对王权的支持是根深蒂固的。1978年春，我到圣城迈谢德去旅行，受到了激动人心的热烈欢迎。人群向我拥来，我乘坐的敞篷汽车1小时还走不到5英里。我的安全都无法保障了。任何一个窗户后面都可能藏有狙击手。我在迈谢德受到的欢迎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几个星期之后，当阿穆泽加尔首相视察这几个省时，他同样受到了激动人心的欢迎。在受到2月暴乱猛烈冲击的大不里士，30万人出来向这位政府首脑欢呼。

那年春天，纳尔逊·洛克菲勒拜访了我。那是一个不祥的时期，不仅伊朗是这样。在边界另一边，共产党已经悄悄地控制了阿富汗的中立政府，而西方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关心这件事。10年来，我一直在提醒西方注意阿富汗，提醒他们，阿富汗是个战略要地，它国内政局不稳，但是，我的提醒被忽视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继续执政的话，俄国人就不敢入侵阿富汗。到1980年1月，伊朗将拥有一支用最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70万人常备部队，并有F-15和F-16战斗轰炸机作为它的后盾。红军会向这样一支军队挑



战是很难令人置信的。

这是我和洛克菲勒讨论的问题之一。我们是老朋友。他已不再担任公职，因此，谈话时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可以认为美国人和俄国人已经把世界瓜分了吗？”他回答说：“当然没有”。他接着又说：“至少就我所知是这样……。”

3月中旬，骚乱又席卷了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一些城市。然而，后来的两个月显得很平静。我开始希望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5月中旬，这样沉寂的假象被打破了。学生罢课，市场关闭。学生、商人与教士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他们充分利用了商人对我的统治所持的反对态度以及商人与毛拉的关系。

西方的一些报道声称中央情报局每年向伊朗教士提供4-4.5亿美元。1977年，卡特下令停止了这种援助。我一点也不知道中央情报局在支持我国毛拉。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政府一直为教士提供了巨大的资助。只是到了1977年，由于我们经济危急，阿穆泽加尔首相才被迫取消这些援助。西方分析家推论，这些行动促成了教士有组织的暴乱。还有些报道说，商人之所以反抗我的政府，是因为我们强制实行了物价控制（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措施），还因为我们牺牲了商场的利益，而大力发展了西方式的超级市场和只限行人进入的商店区。

回想起来，我对阿穆泽加尔在这些领域所采取的行动感到后悔。但是，我不同意西方的假想，认为它们是导致推翻我政府的主要因素。导致我的政府被推翻的因素很多。

例如，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要追溯到70年代中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制裁是应该的，但是也制造了很

多困难。1975年8月，有8,000个物价骗子在我们的法庭上受审。我们雇用学生检查商人执行价格限制的情况。我们相信他们会廉洁奉公，但是，许多人也许过于热心，另一些人则可能是破坏分子。他们把这些工作看成是分化离间、煽动骚乱的机会。我们在整个经济领域强制实行了价格控制，并不是单单针对商场。

商场在整个中东是主要的社会和商业机构。但是我仍然确信，它们已经过时。商场是由一批小商店组成的，一般室内缺乏阳光、通风很差，因此，总的讲这种环境对人的健康有害。商场内的商人是一群狂热的人，由于它们所处的地区很好有利于垄断，因此，极力反对变革。我不能停止建造超级市场。我希望我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采取反对商场的措施是我为实现现代化而不得不冒政治和社会风险所采取的典型行动。

由于我继续实行自由化，反对派日益嚣张，并更有组织。不幸的是，报纸不是集中报道他们的行动，而是集中于攻击萨瓦克。

报刊把最严重的罪行都归咎于萨瓦克。硬说，萨瓦克雇用了数百万伊朗人。实际上，到1978年底，萨瓦克雇用的人还不到4,000人。

萨瓦克这个名称是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波斯文的开头几个字母，是这个组织的简称。由于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保护其民众免遭颠覆，因此，类似这样的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他们相应地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或者联邦调查局、情报部、军事情报第五处或者是国外情报与反间谍局。

就象意大利人没有理由必须容忍红色旅的活动，或者是

德国人没有理由必须容忍巴德·玛恩霍夫帮的要求一样，伊朗也没有理由容忍恐怖行为。难道这还用说吗？在德国，有6个犯人在同一天自杀了，是子弹从他们的脖颈儿后面穿入，准死无疑。这样，几乎没有人对犯人在牢房里拥有手枪感到意外。这一连串完全奇怪的巧合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世界舆论接受这样的报道时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在灾难性的摩萨台时期之后，伊朗才创立萨瓦克以对付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不应由我来评价西方国家对他们本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然而，与苏联接壤使人必须提高对共产党活动的警觉。

虽然我设法与俄国建立了睦邻关系，并进行了有益的经济合作，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确实经历过困难时期。应当记住，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领了我们的国家，直到1946年4月才撤离。摩萨台统治的最后几个月中，人民党真正感到它上台执政的时机已到。人民党不仅威胁我的政权，而且威胁国家的领土完整，因此，我们不得不取缔人民党。

为了消除这些颠覆活动，后来建立了萨瓦克。1953年，这个组织最早由巴克地亚将军领导。他请来中央情报局的人作他的顾问。接着，许多萨瓦克官员去美国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训练。他们还到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考察这些国家有关组织的活动情况。

巴克地亚将军一直任职到1962年，鉴于他的野心和调查方法，他不再适合担任公职。他被驱逐出境，几年后，在伊拉克被暗杀了。

同其他地方一样，在伊朗也有叛徒、间谍、煽动闹事者

以及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人，我们的政府和军事领导人需要有关他们的情报，这是萨瓦克的职责。作为情报和反间谍活动的组织，萨瓦克原先是设在主管民事的行政长官之下的。由于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建议，结果，这个职责就交给了普通警察部队。

萨瓦克的官员是可以信赖的军人。他们在军队、警察和大学毕业生中发展情报人员。但是，萨瓦克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文职人员。在我们的司法程序中，萨瓦克有一个时期曾独自进行审问工作，后来根据国际律师的建议，于1978年后期修改了这个程序，使辩护律师也参加这些程序。

造反者夸大了萨瓦克的活动，以进一步煽动全国的不满。据“提供情况的人”说，“政治犯”和在监狱里受“折磨”的人数徘徊于2.5万到10万之间。如今反对派在伊朗印制的反萨瓦克秘密报纸《镇压纪事》上载明，1968年到1977年，也就是9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被捕的人的确切数字是3,164。

我们的首相直接负责萨瓦克的日常活动。作为国家元首，我只能应司法大臣的要求对已判罪犯实行赦免权。但是，当我了解到存在拷打和虐待犯人的情况时，我就作为一个政策性问题下令停止这种行为。

前首相胡韦达、萨瓦克前首脑帕克拉万将军、纳西里将军和穆加达姆将军在他们受刑和被杀害之前都坚持说，他们从来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涉及嫌疑犯、被告人或者是被判有罪的人的命令。我听说此事深受感动。

我有权减刑，我也总是尽可能充分利用这项权利。我签署了地方法官呈送给我请求赦免或减刑的所有申请报告。对于那些试图谋害我的人，我总是赦免他们，甚至违背了检察

官的意向。

我不能为萨瓦克的每个行动辩护，我也不想这样做。有人被捕并遭到虐待。遗憾的是，这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警察的野蛮行为在世界上哪里都存在。警察工作本来就有导致虐待和残忍的可能性。我的国家也成了这种过火行动的受害者。然而，每当听说有人虐待犯人，我都制止这种行为。当国际红十字会希望进行调查时，监狱便向它们的代表开放，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执行。

这里我必须把恐怖分子和政治犯区别开来。一些恐怖分子在与萨瓦克和地方警察发生冲突时死去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逼迫他们去掠夺财物，杀人放火。他们是咎由自取。

至于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被捕的人——我不能把纵火犯和破坏分子也包括在这一类人当中——我肯定，他们受到了合理的待遇，从未有人以任何方式故意找他们的麻烦。谁也点不出一个被萨瓦克“消灭”的政治家的名字。

1978年6月，我让穆加达姆将军取代了任职已久的萨瓦克首脑纳西里将军。穆加达姆与其说是一个军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哲学家。他态度和蔼，我期望会因此而得到有益的效果。然而，我再次难过地失望了。6月22日，暴乱震动了圣城迈谢德。教士的骚乱不断扩大，霍梅尼从伊拉克加强了攻击。他的讲话和演说录音带偷偷运进了国内，并被他的支持者用来煽动群众。

为了制止不断升级的暴力行动，我在1978年8月5日的宪法日宣布，将在1979年春本届议会会期结束时举行自由选举。选举将是我坚定不移地在伊朗建立真正民主所作努力的顶点。因此，投票站将向包括反对现政府的人在内的任何人开放。宣布举行公开选举之后，随即便在伊斯法罕、设拉子和

德黑兰发生了骚乱。这证明了反对派对一个更加民主的政府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唯一目标和兴趣是推翻我的统治。我确信，如果举行自由选举，这个国家将明确宣布它赞成民主政府，我们已经为这样的民主政府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我们快要实现这个目标了，所以，破坏力量结成同盟来反对我们，因而，某些商场商人和假神权政治封建主义的代表与极左政党和派别携手联合了。

伊斯法罕的形势变得如此险恶，政府不得不在那里实行军事管制法。我的反对派不可能放松煽动，他们怕常识占上风会使他们天真的追随者认识到自己的行动是愚蠢的。无论我怎样一再保证实现自由化，但得到的回答总是一样的，那就是更多的暴乱。

8月19日，大火吞噬了阿巴丹的一家电影院，造成477人死亡。许多人被活活烧死，有的则是窒息而死。有人故意放火，目的在于制造一场野蛮的大屠杀。马上就有人把这种残暴行为归咎于我们的政府。他们猜测说，可能是警察锁住了电影院的大门，所以谁也没能跑出来。有人还指责是我们放了这场大火。霍梅尼要再来一次挑衅，以刺激他的狂热追随者们的欲望。

真正的罪犯逃到了伊拉克，并在那里被捕。他招供了自己的罪行。胆小怕事的地方法官将这件事掩盖过去了。只有被捕的这个人才能够说出他是在谁的授意下犯下了这样的暴行。

人们的反应满足了煽动者的所有愿望。暴乱席卷全国，并延续了好几天。在这场动乱达到高潮时，穆加达姆将军来见我。他刚刚会见了一位重要的宗教领袖。他带给我的口信是：采取惊人的行动！他把“惊人的”这个词重复了好几

遍。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采取什么惊人的行动才能把国家从混乱和毁灭中解救出来。组织一个新政府，把我的权力交给新政府，也许可以解决问题。我与首相阿穆泽加尔讨论了这种可能性。他立即向我提出辞职。我接受了他的辞职——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决不应该允许这个聪明、公正的顾问离去。8月27日，我任命谢里夫·埃马米领导新政府。他曾在20年前担任过首相。

他试图与过去划清界线，努力使他自己和他的内阁从头开始。他谴责复兴党，这个行动未能平息反对派，却断绝了复兴党对他的政府的支持。埃马米还试图通过重新使用回历\*以及下令关闭所有娱乐场和赌场来取悦什叶派教士。这样做证明也是徒劳的。

街上的暴乱在继续。到9月8日，暴乱已经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埃马米不得不在德黑兰实行军事管制法。根据宪法，在开始实行管制法的一个星期之内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据此，9月10日，埃马米要求对德黑兰以及其它11个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并得到了批准。就在那一天，议会对他和他的内阁投了信任票。那个9月8日将成为众所周知的“黑色星期五”。那个星期五，示威的暴力行为发展成了抢劫、杀人放火，安全部队只得开枪，别无其它选择。9月10日，德黑兰军事管制办公室报告说有86人死亡。就在那一天，议会批准了新政府。埃马米公开声明，他对军事管制的后果负全部责任。

---

\* 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的那一年算起，即公元622年为起点的纪年。——译注

虽然流了这么多的血，尽管我们的警察和士兵遭到种种中伤，我还是要赞扬他们在危急时刻从容不迫的表现。失去控制的暴徒野蛮地杀害了他们的战友，他们没有以同样的流血方式进行报复。此外，军事管制法没有得到严格实行。实行军事管制法只不过是一种警告。暴乱在继续。由于士兵实际上只对放火、抢劫、武装破坏分子开枪，因此，暴徒们根本不把士兵放在眼里。

当伊朗的动乱加剧的时候，关于中东问题的戴维营会谈正在进行。我被告知，参加会谈的某些美国人、以色列人以及埃及人对我国发生的事情非常关切。有些报道提到，以色列发言人对美国人说，伊朗比他们进行的谈判要重要得多。如果真是这样，我对此事确实一无所知，这些警告对美国的行动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萨达特总统的关切也同样没有起什么作用。9月9日深夜，萨达特打电话给我，我们交谈了几分钟。象往常一样，萨达特给我以鼓励，并提出给予帮助。我无法知道那天晚上他后来对卡特总统说了些什么。但我确实知道，西方广泛传播说后来卡特当晚给我打了电话，这是假的。除了1979年12月在拉克兰空军基地他来过一次电话外，卡特总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9月初，美国大使威廉·沙利文休假后回到德黑兰。自从我流亡国外，（沙利文先生自己也已离开美国外交界），他多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他在1978年9月就知道我的王位保不住了。他对《国际先驱论坛报》以及其他任何愿意听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但他从未对我讲过。在后来的4个月里，我从沙利文先生那里听到的仅有的话便是重申华盛顿完全支持我的统治。更具体地说，就是美国百分之百地支持我，并希望我能建立法治与秩序，还希望我能继续实施我的



政治自由化计划。

在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我收到卡特政府内外各种人士的无数信件，他们保证美国支持我。每当我见到沙利文并要他进一步证实这些正式声明的时候，他都答应去证实。但是，过一、二天之后，他回来严肃地摇着头说，“他没有接到任何指示”，因而也就不能发表意见。在我看来，沙利文似乎总是很有礼貌，总是表情严肃，总是表示关心。他一个星期来看我好几次。我对他说的每一件事，他似乎都认真对待，但他的回答总是一样：我没有接到任何指示。我越来越感到孤立，并感到与西方的朋友断绝了联系，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他们为伊朗和对我实际上在想些什么，他们要做些什么？从没有人告诉过我。我也从来不知道。沙利文和经常与他同行的英国大使安东尼·帕森斯装腔作势地进行不自然的外交会晤，最后没有达成任何解决办法。与此同时，我被迫应付通常被说成是革命前的局势。实际上，这就是伊朗现代文明的结束。

清真寺已成为不同政见的温床。街上的暴乱是毛拉们指挥的。在大庭广众之前第一次喊出了伊斯兰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人民圣战者——在黎巴嫩和利比亚受训的破坏分子——把这种奇怪的理论带给我们天真的群众，他们第一次有兴趣地听到这样的理论；鼓动者们现在有了毛拉们的支持，他们荒谬的言论也就得到了有组织的宗教人士的赞同。

共产党人，富商和伊斯兰教士在同一场革命中怎么可能携手联合呢？人们无法想象如此歧异的哲学体系能够结合在一起。这种联合的职责落到了那些高级教士们的肩上，他们天真地与好战的无神论者握手联合。眼下，他们感到，必须提出一个更高的革命目标，以显示他们自己比其“同路人”

更擅于蛊惑、更能破坏，更加残酷无情。而他们最终将成为其同路人的囚犯和人质。他们只能放弃这种不幸的联盟，然而这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注定要走上这条可诅咒的道路。

这些高级教士们自己妥协了。明天他们将发现自己是孤立的。然后，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普遍规律，他们不得不投降，谁也保护不了他们。他们只能通过他们被迫犯下的罪行，把自己的形象留在历史上。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对这些罪行承担了可怕的责任。悲剧是好战的无神论将以至高无上的人民和共产主义真理的名义消灭宗教。

西方报刊在继续帮共产党的忙——他们说，毁坏城市的流血和死亡与恐怖分子毫无关系，那是萨瓦克分子和警察造成的。如果萨瓦克真象我的敌人所宣称的那样有战斗力的话，恐怖分子就不会跑到街上大叫大嚷进行诬蔑诽谤。到1978年11月，我们监狱关押的总共只有300人——这是一个拥有3,500万人口国家的数字！但是，西方报刊却继续盲目接受霍梅尼提供的10万人这个数字。

到10月份，情况越来越清楚，搞垮伊朗的详细计划已经制定出来了。在仍然实行军事管制的大城市里，用自动步枪和爆破装置武装起来的一些组织与军队和警察作战。他们象典型的城市游击队一样秘密行动。不久他们袭击了政府机关和外国使馆。对抗成了越来越不详的预兆，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10月5日，伊拉克将霍梅尼驱逐出境，他飞到法国，在巴黎附近的诺夫勒·勒·夏托村避难。我是不是应该阻止这个行动，说服伊拉克政府把他留在伊拉克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法国政府当时确实问过我对霍梅尼改变犯罪地点是否有

异议。我没有反对。我认为，他在汉堡或者苏黎世同在巴黎一样，都可以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害。我也没有权力使全世界形成坚固的阵线去反对一个虚弱而又疯狂的老头。我要是采取任何如此严厉，如此独裁的行动，西方的新闻宣传就会大做文章了。

在这些最困难、最艰苦的情况下，我继续推进改革和自由化运动，为国家的自由选举作准备。我采取了广泛的行动反对贪污腐化，逮捕了非法致富的商人和官员，我完全有意将他们交付审判。那年夏天，在一次并不引人注目的行动中，我颁布了关于我自己家庭成员的行为准则，以免遭受诬蔑诽谤。取消了新闻检查：报纸可以再次自由发表消息或文章；伊朗电视播出了议会辩论的实况。在辩论中，反对派代表发表了激烈的反政府演说。我认为，较之街头巷尾议会发表不同意见更加合适的讲坛。

但是街道上的战争还在继续。霍梅尼到达巴黎以后，所谓的学生们再一次运用了他们“失去亲人”的战术与当局对抗。许多省发生了暴乱；示威者横冲直撞。他们放火焚烧银行、政府机关和商店，捣碎学校和机关的窗户，抢劫银行、商店和饭店。为了结束这种愚蠢的破坏行为和暴乱，和恢复安定，警察和保安部队被迫向这些人群开枪。到10月的第一个周末，罢工者使政府各部的工作停顿了，并关闭了飞机场和学校。16日，10万人为“黑色星期五”的受害者举行了抗议游行。他们再次夸大了伤亡人数。在与英国和美国大使谈话中，我第一次开始觉察到失败主义的腔调。我建议举行一次亲国王的群众大会。我的人确信，这样的大会将有力地说明王权的势力和力量。两位大使耸耸肩说，那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第二天，反对派会有双倍的人来反对你。这样的竟

赛你是赢不了的。我当时相信了他们的话。我现在明白我错了。我是可以赢得这场竞赛的。

谢里夫·埃马米的政府开始变得软弱了。政府作出的让步太少，而大多数的让步又选择不当。美国人开始推行组成联合政府的意见。为什么不吸收反对派，尤其是摩萨台时期的民族阵线领导人呢？他们说，跨越了政治障碍，就可以重建已经分崩离析的民族团结。我这样做了。我与卡里姆·桑贾比和其他几个反对派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但是，我无法接受他的要求。此后不久，桑贾比和迈赫迪·巴扎尔甘到法国霍梅尼的避难所拜访了这位老毛拉。迈赫迪·巴扎尔甘是一个有钱的律师，人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将是霍梅尼的第一届政府的首脑。尽管我在59岁生日的前一天，10月26日，又释放了1,500名政治犯，后来又把我已经知道不合适的分子清除出了萨瓦克，但是为扩大政府的政治基础而作的其他努力都失败了。

罢工在蔓延，10月底，石油工人开始罢工，使我们拥有200亿美元的石油工业瘫痪了。石油生产开始大幅度下降，从每天600多万桶下降到几乎不足150万桶。伊朗航空公司再次罢工。11月5日，更多的暴乱席卷了首都。大学校园里和中学都安装了扩音器，播送充满仇恨和狂热的言论。大学生和高中生加入了大街上“伊斯兰革命”积极分子的行列，以示响应。军队和警察奉命控制游行，但是只能在绝对必要时才许开枪。首都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银行、电影院、公共建筑物和旅馆遭到洗劫并被烧毁。英国大使馆的警卫士兵无法阻止暴徒的进攻只好看着大楼燃烧，结果烧毁了一部分建筑。新闻部也被包围并遭到洗劫。

当发生这一切时，我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信息仍然含混不

清，相互矛盾。国务卿万斯发表声明，赞成我为恢复平静所作的努力，并鼓励我实施自由化计划。这样的海格立斯\*式的幻想使我大吃一惊。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至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认为应优先考虑的事情。11月初，他打电话给我，敦促我首先建立法治和秩序，只有到那时才能继续实施我们的民主化计划。

那个电话也已尽人皆知了，至少实际上发生过这件事。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事情确是异乎寻常的。我感谢布热津斯基对我表示支持。第二天，我请沙利文大使证实这个信息。象往常一样，这位美国大使答应向华盛顿发报，但是当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严肃地说，他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从9月初以来，我所听到的一直是这个机械的回答，并且我还要继续听到这样的回答，直到我离开我国的那一天为止。

从那以后，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通过其它途径来寻求我想得到的答复，也许拿起电话要华盛顿就可以得到答复。我的回答很简单，在外交事务中，我一贯遵守国际外交礼节。因此，我从来不试图与卡特或者美国政府中的其他任何人建立直接联系，因为那些联系应通过大使进行。在危机期间，没有人以任何官方的方式与我联系，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美国的态度。当时我并不知道——也许是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清楚了，美国人要我下台。这当然是国务院内的人权维护者所希望的，国务卿万斯显然也是同意的。我说显然是因为又一次没有人告诉我任何情况：没有人告诉我卡特政府内部在对伊朗的政策上存在分歧；没有人告诉我

---

\* 又译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他能战胜强敌，转危为安。

有些美国官员寄希望于维持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作为反对共产主义侵袭的堡垒。而我们驻华盛顿大使扎赫迪所报告的情况与我在德黑兰日复一日地从沙利文那里听到的消息是一样的：美国百分之百地支持你。阿德希尔·扎赫迪向我提供的总是不准确的报告。扎赫迪在华盛顿的时间太长，他与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关系密切。他自称可以接近最高当局，但是他的报告总是得不到证实。他喜欢交际的性格与极端严谨的卡特白宫很不相称，我早该用别人来取代他。总之，他们都没有遵守外交礼节，没有告诉我事实真相。

到11月15日，沙里夫·埃马米的地位已经变得难以维持，我便要求他辞职。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只有建立一个军政府。在我所接触过的反对派政治家中，没有人对组织新内阁感兴趣。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感兴趣。我于是求助于我的参谋长古勒姆·拉兹·爱资哈里将军，他是个正直，忠诚的人，从不介入政治。作为义务，他接受了这项重任。他也急切地想对反对派表示善意。他立即逮捕了12个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胡韦达先生。他把胡韦达先生软禁了起来。他告诉我，只有进行一次正当的审判才能秉公处理对前首相及其他被捕人的控告。

我并不完全相信这样的估计是明智的。但是胡韦达先生是反对派最大的攻击目标之一，然而他仍然深得我的尊敬。我知道，实际上反对派是希望通过他来搞垮我。于是我建议他到国外去一段时间，并要他去比利时大使馆。由于他太自信，或许是太忠诚，因此他拒绝了。我在其它地方已经提到过他在被处死之前所受到的恶劣待遇。

在爱资哈里政府的最初几天里，我们仍然抱有希望。人

们又开始上班，曾一度下降到很低水平的石油生产又上升到每天530万桶。人民作出了有利的反应。根据来自诺夫勒·勒·夏托的命令，定于11月12日星期二举行的总罢工失败了。在所有的大城市（德黑兰、伊斯法罕、迈谢德、设拉子及大不里士），许多用棍棒作武器的年轻人与红色和黑色城市游击队发生了冲突。

但是，我们希望和平，希望所有伊朗人重新和好。我们已经四、五次释放了总共几百名政治犯；12月，爱资哈里将军重申了1978年10月19日的政府声明，即所有伊朗人都将得到彻底赦免，假如他们尊重宪法的话。此外，我们还尽一切可能劝阻我们一派的人不做任何有可能酿成反恐怖活动的事情。我们释放了最后一批政治犯；我们监狱里关押的就只有那些被判有杀人罪和其它严重罪行的罪犯了。

不久以后这些再也不是反对派阴谋反对我的问题了；所有破坏力量都团结起来了。现代化的进步伊朗将遭到毁灭，常常将国家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一个朝代的代表也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之一起毁灭。

于是罢工开始了，罢工将迫使国家屈服。我们每天都要停电好几个小时，水和石油供应也被切断。运输工人也罢工；接着银行和政府最重要的一些部门一个接一个地关闭了。这些停工合到一起，便使整个国家都瘫痪了。游手好闲的人群挤满了街道，愈益不满。暴乱首领本人或是通过工人家属对大部分工人进行威胁。众所周知，大的发电站只要有五、六个人就可以停止供电；在抽油站也是这样。这样少量的职工的作用说明了罢工为什么会成功。两个月里油井和炼油厂工人的罢工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我们保持全国团结一致的 最后努力接近于失败。我知

道，爱资哈里将军尽了最大努力。他感到，他不得不安抚一下反对派。他要到议会去发表演说，他要首先引用几节《古兰经》。他修饰他的讲话以适合宗教情调，很快他就象一个教士一样在讲话。不久，人们便开始称他阿亚图拉\*·爱资哈里。最后，由于过度紧张他犯了心脏病，使他无法再继续工作。

自从我离开我的国家以来，我常常问自己，我自己也确实想到，如果我采取了更加强硬的行动，是否能够拯救王位与国家。当然为了在街道上重建法治与秩序，我的将军们曾不断敦促我使用武力。我现在明白了，如果那时我命令我的军队开枪，流血的代价比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人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会小100倍。但是，甚至这个事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我的困境——一个君主不能用同胞流血的方式来保全他的王位。独裁者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的行动代表一种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无论付出多大代价，这种意识形态都必须取得胜利。但是君主不是独裁者，他不能破坏与人民的联盟。独裁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予别人，因为权力只属于他自己。一个君主被授予王位，他还得把它传给下一代。这是我的本意。在我的统治下，伊朗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文化、工业、农业和技术水平。我仍然希望在我退位之前提高这些水平。这样，我的儿子王储礼萨就可以统治一个在工业、军事和文化上都很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拥有不断发展的核工业，再也不象现在这样依赖石油。

在那最后几个星期里，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地方行政官员通电话上。我给他们的指示都是一个：“不可为而

---

\*宗教头衔即高级宗教人士。——译注



为之，以避免流血。”

一天，迈谢德市市长有些窘迫地告诉我，在他那里暴徒企图推倒我的塑像。我告诉他，鉴于我们面临着流血和混乱，不要为保护一座塑像消耗治安部队。

动乱和暴力是我最后几个月统治的特征，在整个阶段里，我希望相信，我的对手是忠诚的。他们不是希望更多的自由化吗？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一点。他们不是谴责贪污腐化吗？没等他们提出要求我就在这个领域采取了有力的行动。

寻求一个不流血的合乎法律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我的目标。如果能够形成和解气氛，仍然有可能组成一个有反对派成员参加的很难掌握的联合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可能能稳定煽动者及着了迷的暴徒。最重要的是，这个政府能够使国家恢复正常。

爱资哈里内阁被批准后不久，我便继续与反对派领导人进行讨论。我首先与萨迪吉博士进行了接触。他是民族阵线的成员，我认为他是个爱国者。他无条件地同意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但是，他要求给他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我同意了。后来他屈从于他的党的压力，要求在我留在伊朗的时候任命一个摄政委员会。这个条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已经不适宜作为一位君主来履行我的职责了。

（然而必须指出，萨迪吉博士是请求我不要离开伊朗唯一的政治领袖）。桑贾比先生和巴扎尔甘先生在法国与霍梅尼会谈以后一回到德黑兰就发动了一场恶毒的反政府运动。结果由于他们的反宪法宣言，爱资哈里把他们逮捕了。桑贾比先生在监狱里要求见我。他选择了萨瓦克首脑莫加达姆将军作为他的中间人。碰巧他是在阿穆泽加尔政府时期给我带来

宗教领导人口信的人。为了报答他的劳苦，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莫加达姆就被处决了。

我决心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实现和解，在桑贾比先生和巴扎尔甘先生被扣留几天之后，我就使他们获得了自由。此后不久，我接见了桑贾比先生。他到达时吻了我的手，并非常亲切地向我表示他个人对我的忠诚。他宣布，愿意组织一个政府，条件是我离开伊朗去“休假”。

对他来说，事先指定一个摄政委员会是没有问题的，按照宪法这样做是必要的，在我出走之前要求议会进行信任投票也是不成问题的。我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解决办法，并寻求进行新的磋商。但是，由于形势在继续恶化，进行新的磋商事实上已经很困难。

难道这些政治家们不知道伊朗正摇摇欲坠濒临深渊了吗？现在已不再是维护特权、垄断或者是一个政党高于另一个政党的问题了，而是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一点吗？

各地的经济状况都很混乱，这和大街上及大学里的骚动一样令人担忧。罢工一个接一个。石油生产从正常的每天580万桶下降到12月25日的每天170万桶。这对我们的经济是一个大灾难。向苏联运送天然气受到严重阻碍。很明显，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不可能再持续很久。

就在此时，我越来越怀疑我的盟友的行动了：美国仍然遵守我们的双边协定吗？根据协定，在我们受到共产党国家进攻时，他们有责任前来援助我们。他们想要废除这个协定吗？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我提出的问题，美国大使带回来的唯一答复就是那令人憎恨的“我没有接到指示”或者是“我们百分之百地支持你”。沙利文常常与英国大使安东

尼·帕森斯一起来，他们俩都很想给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这个时候——不同于摩萨台时期——美国和英国要用一个声音讲话。尽管这样，我从这些情绪里并没有得到什么安慰，而是发现了许许多多的疑点。

我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依旧含混不清，自相矛盾。例如，我如何理解美国政府突然决定将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调入白宫任伊朗问题顾问。我知道，鲍尔不是朋友，我明白，他正在写一份有关伊朗问题的特别报告。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报告将包括那几个方面，更不用说报告的结论了。几个月之后，我在流亡中看到了他的结论，我最担心的事情得到了证实。鲍尔就是那些想抛弃我，并最终抛弃我的国家的美国人中的一个。

的确，俄国人似乎显得比美国人更关心伊朗。

苏联《真理报》在11月末发表一篇文章，简要地阐明了对伊朗动乱的态度。实际上，苏联是告诉美国和西方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

此后不久，美国间接地同意了苏联的立场，并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声明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会干涉伊朗。这样，我们的双边协定变成了什么呢？当英国和美国大使再次来向我保证他们继续支持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从这些混杂的信息中得出什么结论。西方还在敦促我，在维持法治和秩序的同时，继续实施我们的自由化计划。遗憾的是，枪口对准人的脑袋的自由化本来就是有限度的。我一直赞成应有更大的自由，并曾经实行过旨在于加速民主化进程的政策，但是，走向无政府主义，而不是走向民主的轻率而又乱糟糟的仓促行动，必然会导致灾难。

12月份，要我离开这个国家的压力开始增大。把我去国

外休假作为建立联合政府的先决条件，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星期。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过的，反对派领导人不可能，也不会同意实行必要的程序。现在外国来访者在伊朗露面了，他们都劝我离开伊朗，与反对派达成协议。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情报局派了一个新头目到德黑兰来。他是从东京调到伊朗的。在此之前他对伊朗事务没有任何经验。在这场危机中，美国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对我国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呢？他向我提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报告使我感到吃惊。有一次我们谈到了自由化问题，我看到他满面笑容。对于一个显然是负责中东安全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来说，这种兴趣似乎有些奇怪。因而，我只能设想，他的任务与其说是讨论安全问题，还不如说是促进我们的自由化。

我与桑贾比的谈判失败后，莫加达姆将军问我是否要见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先生，他是民族阵线的另一名成员，曾在摩萨台政府中担任过地位较低的大臣。通过前首相阿穆泽加尔先生的安排，我与他已经有过一些接触。尽管阿穆泽加尔先生不再担任公职，我仍然把他当作一位可以信赖的顾问。桑贾比在需要安定和理智的时候继续发表煽动性的讲话。巴赫蒂亚尔则与桑贾比不同，他举止谨慎，性格含蓄。

我同意接见他。一天晚上，莫加达姆将军把他带到尼亚瓦兰宫。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中，巴赫蒂亚尔十分爽快地表示他忠于宪法和君主制。他希望遵守宪法，在我离开伊朗去休假之前任命一个摄政委员会，他可在议会两院争取获得信任投票。

在外国的压力下，我有些勉强地同意任命他为首相。我一直认为他是亲英派，是英国石油公司的代理人。他的政治基础不深；他向我承认，民族阵线的全体成员仅有27个

人。

我最后决定任命巴赫蒂亚尔为首相是在我会见曾一度任英国工党政府外交大臣的乔治·布朗勋爵之后。我与乔治·布朗勋爵是老朋友了。他拉住我的手，恳求我离开这个国家。他说，仅休两个月的假。接着他就坚决表示赞成任命巴赫蒂亚尔。12月29日，沙普尔·巴赫蒂亚尔受命组织一个文官政府。

1979年1月2日，我两个月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并表示，一旦巴赫蒂亚尔政府得到批准并就职，我就准备进行一再要求的——如果实际情况说明是非常必要的——休假。

这一年开始后不久，美国驻欧部队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私下来到了德黑兰。1月4日，卡特总统开始与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西德总理施密特和英国首相卡拉汉在加勒比海的法属瓜德罗普岛举行会谈。古斯卡尔说，他们希望“估价世界形势”特别着重估价地中海东部和波斯湾的事态。我相信，在那些会谈中，法国和西德同意了英国和美国废黜我的建议。瓜德罗普会谈可能证明是“中东的雅尔塔”，只是最大的受益国（苏联）引人注目地没有出席。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派了一位与他非常接近的人作为私人特使来到德黑兰。他也主张对这场危机进行“政治”解决，这是和解和避免使用武力的委婉用语。对于他的第二点意见，我至今仍然难以理解，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苏联发生任何对抗。我问他，我们的内政与东西方冲突有何关系？但是他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我才了解休塞的使命。我对他本人相当

熟悉。他曾多次来德黑兰，预先安排好他的访问，并与我和我的将军们讨论军事问题。我过去一直感到他很有帮助。

私下访问使我感到苦恼。我问过我的将军们，但是他们知道的也不比我多。没有适当的理由，这种人不会回避我。莫斯科一获悉休塞抵达德黑兰，《真理报》便报道说：“休塞将军正在德黑兰策划一次军事政变。”在巴黎，《国际先驱论坛报》却写道，休塞去德黑兰不是为了“策划”政变，而是为了“防止”政变。

这种危险存在吗？我不相信。我的官员们是信赖国王和宪法的，他们曾宣誓忠于国王和宪法。只要宪法得到尊重，他们是不会动摇的。

但是，不同的美国情报机构也许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宪法会遭到践踏，因此有必要使伊朗军队保持中立。很清楚，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休塞将军才到德黑兰来的。

我只见到休塞一次。大约在我离开伊朗之前一个星期他与沙利文大使一起来看我。几乎都是沙利文一个人在说话，气氛非常令人不快。沙利文说，我离开伊朗的时间已不再是以天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他还意味深长地看了看他的手表。他们俩都谈到我“离开”两个月时间，但他们似乎都不太相信我还有可能回来。

休塞把我最后一任参谋长加拉·巴吉将军争取过去了。他后来的行为使我觉得他是个叛徒。休塞要加拉·巴吉为他和迈赫迪·巴扎尔甘安排一次会晤。巴扎尔甘是一位人权律师，后来成了霍梅尼的第一任总理。加拉·巴吉将军在我离开之前把休塞的要求告诉了我，但是，我一点也不知道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确实知道，加拉巴吉利用职权阻止了反对霍梅尼的军事行动。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作出了什么决

定，价钱多少。所有我的将军都被处死了，唯有加拉·巴吉幸免，也许这是意味深长的。他的救星是迈赫迪·巴扎尔甘。

到休塞离开伊朗时，我们的军队已经瓦解了。他是来挽救巴赫蒂亚尔政府的，但此时巴赫蒂亚尔政府已是一片混乱。在处死伊朗空军司令拉比将军之前的一次象征性审判中，加拉·巴吉将军告诉“法官”们说：“休塞将军就象扔一只死老鼠一样把国王扔出了这个国家。”

1月16日，议会以相当大的多数批准了巴赫蒂亚尔政府。非常有趣的是，1月11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已经在华盛顿宣布了我出走的计划。

最后几天是令人心碎、彻夜不眠的日子。我们国家的悲惨状况自然是我每时每刻都挂念的事情。尽管我知道我即将离开祖国，但我仍然必须继续工作。

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完全表达出1979年1月16日我与王后以及孩子们动身去飞机场时的感情。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因为我完全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服自己，我的出走将会安抚人民、减少仇恨，使暗杀者放下武器。尽管愤怒的人群正在造成巨大的破坏，我还是希望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也许会幸运，国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迈赫拉巴德机场上刮起了一阵寒风，通常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这样。机场上停着一排排飞机。罢工使这些飞机无法调动。聚集在飞机旁和我们话别的国家领导人有：沙普尔·巴赫蒂亚尔、议会两院议长、政府大臣以及军队将领。

我劝他们谨慎行事。有上帝作证，我曾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保护那些曾经为我服务过的人。

伊马姆·乔迈没有来。过去我每次出去他都在场朗诵传统的祷文。有些人也许误解了，对他不在场作了不切实际的解释。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个可怜的人真的病了，并于几个星期之后在日内瓦去世了。但是，我有一本从不离身的神圣的《古兰经》。

人们在我离开时对我所表示的忠诚深深地打动了，我，抽泣打破了令人心碎的沉默。

我在这片国土上统治了37年，并奉献了我的一点心血。我带走这个国家的最后形象是告别的人们满是泪水的脸上呈现出了令人恐惧的悲痛神情。



## 十二、从希望到绝望

我的行为经常遭到批评，有时候批评是正确的。然而批评者很少有人对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作客观的估计。更没有人想一想如果没有我们为国家的生存所作的努力，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存在。

1945-1946年间，我们巩固了伊朗的独立和团结。1953年，我们使国家脱离了混乱状态。接着我们又整顿了经济和财政；我们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石油资源所有权；从1963年起，在人民的一致赞同下，我们开始走上了通向获得知识和进步的伟大文明道路。

37年来，我所有政治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我国人民走上伟大文明的道路。白色革命是一项惊人的计划，它将使伊朗在25年内摆脱几个世纪的压迫。我明白，除非动员国内所有的力量，否则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长期保持紧张状态，以便阻止诸如反动分子、大地主、共产党人、保守分子及国际上的煽动分子之类的敌对分子成为绊脚石。要动员一个国家，你必须把它争取过来，既要推它，也要拉它，当它运转起来时，要保护它，反对那些企图阻碍它转动的人。

让破坏者任意行动，当然不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

通往伟大文明的道路的确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但是，它将导致更高的生活水平。那么，我希望伊朗拥有的伟大文明是什么呢？对我来说，那就是为实现谅解与和平作出一番努力，为大家的工作创造无限美好的环境。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实际上总是将某种准则和纯粹是伊朗的民族精神与其它文明中的精华结合起来。

在我们向伟大文明进军时，伊朗是一个巨大的工场。对于业已兴起的现代化，这个工场的所有成分都是必不可少的：大学、各种中小学、专业学校、医院、公路、铁路、水坝、发电厂、天然气管道和输油管道、工厂、工业联合企业、大型文化、艺术设施、综合运动场、合作社、大都市区和新型村庄。

在摩萨台当政时期，伊朗的预算在4亿美元左右。我们的最后预算是570亿美元，其中将近200亿美元来自石油收入，其余的来自人民现在能够负担得起的税收。1963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174美元。1978年，也就是我统治的最后一年，人均收入是2,540美元。而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伊朗人口从1968年的2,700万增加到1978年的3,600万。在白色革命的指引下，我们在以惊人的速度实施社会发展计划。

在实施这些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严重依靠石油收入。1977年，我们的石油收入为220亿美元左右。尽管我们注意保护我们的石油资源，但是为了建设我们21世纪的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我们每天继续从油井中抽取500万到600万桶石油。

根据各种各样的预测，有3年或4年的时间就足以填补我们最重要的空白。1978年到1982年期间，我们的高等学校将有四届各种不同的技术人员毕业。每年的钢铁产量将达到1,000万吨。我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把钢铁生产提高到每年2,500万吨的水平。这个水平接近于法国。在离巴基斯坦边界60公里的阿曼海边，查哈尔-巴哈尔综合性大型港口正接近竣工。在波斯湾的班达尔-阿巴斯，也有一个港口即将竣工。这里的干船坞可以停放共达50万吨的船只。其它正在建设中的港口将在1982年开放。

除此之外，我们还计划建造4个核电厂。伊朗一号和伊朗二号将由德国人在布歇赫尔附近建造。伊朗三号 and 伊朗四号将由法国人在阿瓦士附近的卡鲁恩河上建造。前面两个将分别在1980年和1981年投入使用，后面两个计划分别在1983年底和1984年底投入使用。现在这些工程都已经废弃。毫无疑问，投资全都损失了，而没有收回任何利润。此外，还计划建造14座核电站，这些核电站最终将为伊朗提供25,000兆瓦核能。在伊斯法罕计划建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

我们列入计划的还有修建德黑兰地下铁道。将德黑兰-班达尔·沙普尔铁路建成电气化铁路与复线铁路，沿着同一路线建造一条有6个行车道的公路。

这么多年努力将带来的好处现在都化为乌有。我们的石油生产远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势头——德黑兰已经宣布——永远也不会恢复到以前的势头。油井是由不称职的人在管理，他们可能是些未经训练的工人。石油开采进行得很糟糕，致使有些油井已经报废。

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渐渐地控制了工人和农民组织。此外，普通工人负责发布命令、解除或者任命董事、工

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生产问题由他们决定，他们自己投票决定大幅度增加自己的工资。

由于禁止解雇任何工商企业职工，所以要阻止破坏活动就只能关闭工厂，或者是实行“国有化”，这就意味着由国家支付大量新官僚主义、不称职和贪污腐化造成的更大赤字。在某些情况下，工厂主自己要求“国有化”。

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是，国家的工业基础结构到1979年夏天实际上已经崩溃了。特别是钢铁、铜和铝等大工业、矿山、船坞、汽车和拖拉机制造厂更是如此。在这些工业永远消失之前，它们将要使纳税人付出很大的代价。

大多数工厂都是既无定货又缺乏原料，而且在等待关门的期间只有25%—30%开工。不用说工人们失去了白色革命带给他们的一切好处。此外，他们能分享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伊斯兰革命”的确极大地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场革命是违背他们利益的。我曾给尽可能多的公民以力量使他们起来摆脱无产阶级的境遇。看到工人、农民和职员没有工作，再次陷入财政困难，有时陷入悲惨的境地，我绝望了。

货币迅速贬值，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这样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哪怕是短期的生产计划实际上已不可能。产品的纯成本费是无法确定的。

在公共工程和建筑行业中，自从1979年冬以来，滞涨已成了规律。国家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大工程，由于取消了过去的定货又不支付合同规定的罚款，因此，多国企业也不想在这种政权下开展任何活动。

我获悉，1978年在伊朗经营的180家法国公司到1979年3月已撤走了一半。所有留下来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经营。这些企业必须接受“革命委员会”提出的要

求，而这些要求又不可能满足。

伊朗新政权公开宣称，将不因违约而向外国人赔款。革命和政权的更迭现在属于“绝对需要而又不可预见的情况”。

当前的政治和宗教动乱以及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对失去了重要原料和产品定货的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其它公司来说，代价同样是高的。杜邦·德·尼莫尔公司(美国)和三菱公司(日本)在我国投资损失了很多资本。损失最大的是美国。我们与美国签定了一项商务条约，预定他们将在5年内向我们出售价值100亿美元的原料和设备。这项条约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场大灾难在道德方面同样是严重的。霍梅尼采取的产生了可耻结果的血腥行动，总的来说对伊斯兰，尤其对什叶派，可能是灾难。库姆\*权迷心窍，妄自尊大，一群毛拉实行专政，这一切与伊斯兰教义的本质真正相违。历史将揭示，一个忧民忧国的国家元首，一个呼吁在各国人民中保持团结的人是怎样被流放的。我被流放国外使某些人得以采取或将要采取所谓的高价石油政策为他们自己谋利益，增利润。

我从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消失与反对西方大国的经济甚至政治稳定的总攻势是同时发生的。而且，这场危机只是不仅动摇中东经济而且动摇世界经济所使用的手段之一。

据说，伊朗发生的事件已经改变了今天世界力量的关系。据说，“时代不同了”，一个普通人或者普通公民“必须使自己适应世界新情况”。恐怕这意味着，必须适应动乱。

---

\* 库姆是德黑兰附近的小镇，现霍梅尼住所所在地。——译注

## 十三、恐怖

自我出走以来，在德黑兰进行“统治”的那些人已经表现出了他们的无能和不负责任。沙普尔·巴赫蒂亚尔想统治，但又统治不了。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伪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从来没有真正管理过什么，因为伊朗已经不再有宪法或者议会。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为了讨好毛拉和他们的顾问，他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随便赞成、否定或者取消他制定的任何政策和所有的政策。

1979年1月23日，巴扎尔甘先生宣布：“我们将要宣告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将不同于利比亚或者沙特阿拉伯，而是类似于哈里发阿里统治时期头几年的那种伊斯兰政府。”3月30日—31日，他们组织了一次假公民投票，把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问题交付公民投票表决。这是一出荒唐的闹剧。年龄在15岁以上的人都参加投票。绿色选票表示赞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红色选票则表示反对。由于这次公开投票是在革命卫队的监视下进行的，因此，98%的选民都投了绿色选票，这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伊朗新闻工具宣布，有将近2,300万伊朗人投票赞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但是，我国一半人口，将近1,800万人的年龄都在15岁以下。即使我们假设每个人都参加了投票，那至少还多出500万张选票。1979年4月1日，这个共和国宣告成立了，从此伊朗又退回到中世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扎尔甘，这位人权委员会的前任

主席现在却主持恐怖统治。这些刽子手自称“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审判，这是何等的卑鄙。这种盲目的狂热在我们国家建立起了一种恐怖、愚蠢、拙劣的统治。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西方新闻工具所持的双重标准——我的政府仍然被描绘成践踏了伊朗人的自由和民权的专制、镇压统治，而霍梅尼的政府则被有些人美化为一场新的革命。由于以前的许多革命都使被压迫的人们获得了自由，因此，我感到，也许很难使西方人的思想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对人类来说，革命并不总是积极的力量。无论是卡斯特罗的古巴或者是霍梅尼的政权都没有使他们的人民获得自由。还有那些国际人权组织，过去曾一度为使我们的刑事审判制度变得更仁慈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而随着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它们好象全都消声匿迹了。

在这个共和国的法庭进行审讯的过程中，主要的指控是不许辩驳的。犯人被指控为“人世间的腐蚀者”。这丝毫不是某些西方记者似乎认为的那样，指的是被告自己接受贿赂甘愿受腐蚀，也不是指他们被指控背叛了人民的信任，有偷盗行为，或者其它任何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人世间的腐蚀者”这个术语来自于《古兰经》，它指的是所有因个人的犯罪、不道德行为及其过失而触犯了上帝的那些人。

世界上没有哪个刑事法典使用这样模糊的措词来确定犯法还是犯罪。显然，在审判官的眼里有许多理由可以认定一个人是“人世间的腐蚀者”。根据事实本身宣布被告在上帝面前不清白，从那一刻起就必须把他从被他玷污了的世界上除掉。

“伊斯兰法庭”藐视最起码的辩护权。在宗教法庭的“法官”看来，被告仅仅因为他们在我统治期间参加了伊朗

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他们无疑就是罪犯。有些人天真地申明自己无罪，还说在整个腐败时期毛拉们也都生活得很好，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重他们的案情。向这些法庭提出证据和辩护是没有用的。

1979年2月初，巴扎尔甘保证，政治被告“将由普通法庭公开审判”，并宣称他本人强烈反对“简便审判的程序”。几天之后，曾担任过国家安全首脑的内玛托拉·纳西里将军在等待受审的监狱中被民兵杀害了。他受到了严刑拷打，2月12日晚间他在电视摄像机前出现时，面部伤肿，缠满了绷带，几乎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可是他确实说话了。在刽子手的包围中，他声明，他没有下令进行任何谋杀，也从未接到拷打犯人的命令。2月16日凌晨，他和另外3个宣布忠于伊朗和国王的将军一起被革命委员会枪杀了。

2月28日，巴扎尔甘威胁说，如果对各委员会的决定权不作规定、不加限制，他就辞职。3月8日，他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坚决的保证”。但实际上，他们在加倍进行逮捕，紧接着行刑队就将被捕的人即刻处决。曾担任过师长的将军几乎都被处死了，因为他们都犯了在我统治时期指挥军队的罪行。一位100多岁高龄的参议员被处死了，只是因为他忠于君主制。还有许多70多岁的被告也被处死。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在公布的被杀害的人名单中有大臣、国务大臣、外交官、议会议员、省长、市长和市法律顾问、许多军队将领和军官，下级军官、普通士兵、地方警官和国家警官、新闻记者、编辑和广播员、地方行政官、律师、宗教领袖、医生、教授、体育界人士以及商人。所有这些人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判罪，并即刻处决的。

成千上万的公民象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一样逃离伊朗，



避免了逮捕和杀害。自从1979年2月以来，甚至一些宗教领袖也遭到杀害和迫害。民兵的恐怖活动使某些阿亚图拉直到现在都不能对所谓的伊斯兰法庭下令进行的大屠杀公开作出严厉的裁决。在革命的痛苦阶段，大量受到威胁的人追随其头目。1979年3月8日，《世界报》发表了巴赫蒂亚尔的儿子致霍梅尼的一封“公开信”，信的部分内容是：

“你需要脑袋，霍梅尼先生，就在我大声疾呼的这一刻，由于你神圣的旨意，许多人已经人头落地，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但是，你以什么名义有资格，用中间人送来的录音带使成千上万的狂热青年高高兴兴地去送死呢？”

“不要指望历史会吹捧你。你妨碍了伊朗实行民主的机会。你要对那么多的殉难者负责，他们永远成不了英雄。”

这封信是在所谓的伊斯兰革命民兵还没有严密组织起来之前写的。许多“嫌疑犯”，尤其是在省里的“嫌疑犯”仍然可以逃脱治安维持会成员的搜捕。治安维持会成员向“伊斯兰法庭”提供材料，或是沉迷于即刻处决，接着他们便可抢掠财物。

在造反者于1、2月份抢劫兵营和军火库期间，这些歹徒帮伙成倍增加了。据我所知，他们没有交还武器。这些治安维持会中最有名、最有权力的是“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至少拥有1万名积极的战斗人员，有关这些人的情况外界一无所知。其中有一个组织叫“革命卫队”，这是一个由易卜拉欣·亚兹迪创建的准军事组织。易卜拉欣·亚兹迪是霍梅尼在诺夫勒·勒·夏托村时的著名顾问——一个拿着美国护照旅行的特殊人物，后来成了巴扎尔甘的代表和外交部长。

在可怕的3月里，还有许多无辜的人受到“审判”并处

死。被处死的人丝毫不知道对他们提出了什么指控；他们没有时间准备辩护；没有律师；审讯秘密进行；不知法官尊姓大名——这些就是所谓的伊斯兰审判制度的新发明。

3月11日，巴扎尔甘内阁发言人埃米尔·恩泰扎姆向新闻界宣布：“政府，特别是司法部对伊斯兰革命法庭的审讯和判决无法实行任何控制。”

巴扎尔甘再次威胁要辞职。但是，他还是留下了。3月16日，巴扎尔甘要求暂时停止对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的审讯。胡韦达曾担任我的首相达13年之久。这个功绩卓著的人只有一个缺点：他过人的勇气使他有些轻率。

有些事情我想在这里澄清一下，这对我来说是必要的。1978年秋天，他们采用了各种方法指责政府，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成了替罪羊。

一个非常巧妙的阴谋策划好了，然而胡韦达（我了解他为人坦诚）没有看出直接威胁他本人的危险。他们答应胡韦达将按宪法和法律程序进行公正的审判，他和其他长期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员都将得到公平的对待。胡韦达是不怕公正的审判的。

他于1978年11月8日被捕，几个月之后发生暴乱他被放出来了。但他并没有逃跑，而是到他的朋友家里给革命委员会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他的下落。他们把他又送回监狱，他在监狱里着手准备一份答辩词。

可是，审判官不让他写完辩护词。他遭到了残酷的虐待。在他再次进监狱之前见到过他的人说，他的体重看上去下降了40多磅。3月15日星期四黎明，他被带上一个自封的“革命法庭”，并被判处死刑，而不给他任何机会就指控的罪行进行辩护。当他被指控“与上帝作战”时，他用下面这些话

斥责了不知名的法官：“我从来没有向上帝宣战——我怎么能同上帝作战呢？——我是教徒，我去过麦加。如果你们已经决定我有罪，那么我就有罪。需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但是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的法律、同样的政治制度下生活……，我们的所有法律都是由议会颁布的，同时也是每一个人同意的。”

4月7日晚上，一个刽子手用机关枪一阵扫射，杀害了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但是，由于他所受到的虐待，看来他本来也就快要死了。

当我获悉他被处死，我一整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为他祈祷。胡韦达之死是暗杀，对此不能掩盖也不能视而不见。自由世界的报刊发出了真正憎恨、愤慨的呼声。西方国家的政府对此正式表示了“他们的悲痛惊愕心情和严重的关切。”在联合国，库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不得不指出：“伊朗新政权对人们要求宽大和公正的呼吁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刽子手们在继续采取行动。4月11日凌晨两点，一个“法庭进行了简短的审讯之后，又将11名官员判处死刑。半小时后，他们都被杀害了。第一名受害者就是侯赛因·帕克拉万将军。他的唯一“罪行”就是15年前曾领导过萨瓦克。他曾以正直和善良而闻名于世。他经常为被法庭判了刑的反对派，尤其是许多毛拉向我恳求宽大。同帕克拉万将军一起被处决的还有另外4名将军。

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法理学家委员会指出，“伊斯兰法庭”在伊朗进行的审讯和判决“是蓄意违反伊朗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霍梅尼先生的答复很简单。5月4日他在库姆宣称：“革命必须砍断腐蚀者的手，流血是必须的，伊朗流的血越多，

革命的胜利就越大。”

2月底，革命军方委员会颁布命令“彻底更新军队”。这就是说，要通过清除那些背景为人们所熟知的指挥官，建立一支名副其实的民众军队。从2月到6月，武力镇压仍在继续，但是，是以更加有组织的方式进行的。在这段时间里，有20多位将军、参谋部高级军官、陆军上校、还有空军和海军军官被杀害。5月8日，在德黑兰一次简易审判后，“革命卫队”杀害了21人。这批受害者包括政界和军界人士。

5月10日，法佐勒赫·纳齐米将军被害，他曾经指挥过一个旅的铁卫军。后来，在克尔曼发生了：“大规模的烧杀”，他们匆忙惩处军官、吉普赛人和妇女。114人被判有“贪污腐化”罪。杀害将军、上校、营长及国家警官的行为一直延续到6月中旬。除此之外，还有250名参谋部军官和各军、兵种的高级军官被监禁、调离或被解职。这样，军队就失去了领导。

9月初，国际新闻界公布了2月16日以来所谓的伊斯兰法庭判决并处死的大约575人的名单。在这个被害人员名单上，没有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人。可是，新闻界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霍梅尼的法庭以“上帝的名义”杀害的只是真正的宗教信徒。各省里的游击队组织和民兵小分队杀害的人数还不得而知。这些造反者曾在1月初抢劫了我们的军火库；他们不仅在德黑兰，而且在各省杀人抢劫，但不受任何惩罚。

3月底，“革命卫队”逮捕并监禁了78岁的退休将军阿米尔·侯赛因·阿塔普尔。他的儿子法里博尔兹·阿塔普尔是《德黑兰日报》的一位编辑。他写了一篇大胆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揭露说：“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至少有2万还被关在临时改成的监狱和拘留所里。”为什么世界对这些恐

怖行动保持沉默不理不睬呢？在我统治时期，所谓的因政治原因而被拘留的人从来没有超过3,200人，而这些人中间大多数实际上都是恐怖分子。自从2月份以来，已经和正在被捕和监禁的男男女女有成千上万，他们常常受到非人的待遇，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有时候他们还遭到严刑拷打。真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监狱里了。

在我统治时期，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可以自由参观我们国家的监狱。我们的监狱一直向所有有资格进行调查的人开放。每个被拘留者的律师都了解被告的案情档案，并有时间准备辩护和传唤必要的证人。最后，被判刑的人还可以提出上诉，请求取消判决。对此，我常常履行赦免权。现在的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这些所谓的伊斯兰法庭污辱了神圣的《古兰经》的崇高准则。

那年春天，他们不许国际红十字会到伊朗访问或者是帮助任何犯人。4月1日，霍梅尼先生曾间接地提到了被监禁的无数男女的命运。我引用一下他的话：“所有这些人从他们被监禁的第一天起就该统统杀掉，不该让他们把监狱挤得满满的。他们不是被控告，而是罪犯的问题。只有那些罪恶昭彰的罪犯才被处死。现在我们是按照文件对这些人进行审判，我们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审判，应该直接将他们处死。承认我们中间盛行西洋化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是可悲的。”

5月13日，法新社发出了这样一条电讯：“德黑兰消息：阿亚图拉·霍梅尼致函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感谢‘他的法国朋友’对他们的欢迎，但是，他对他们为了几个罪犯和小偷而公开向他抛出了人权问题感到遗憾。”

当我听说，人权维护者安德鲁·扬称这种野蛮行径的创造者是“圣人”，我大为震惊。

那么，这个把教士享有至高无上权力写入宪法的所谓伊斯兰宪法是什么货色呢？它的关键性特点就是给予其领导人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与“元首”\*的原则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一点被忽视了？就人权而言，这个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那些维护人权的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正式选出的巴尼萨德尔实际上只是在依照现领导人霍梅尼的意志执政，因为根据这个伊斯兰宪法，伊朗新元首任何时候都有权解除总统的职务。

更有甚者，这场所谓的伊斯兰革命通过采用中世纪当众用刑、公开处死的办法正在残酷地对待其民众。1979年11月4日，霍梅尼从美国使馆抓走了50多名无辜的美国人，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使人民陷入了每天都发生并被奉若神明的恐怖之中。

这位所谓的“圣人”成功地迫使伊朗向他屈服了。霍梅尼的神权政治赋予了政府控制伊朗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无限权力，结果，我们的国家结构崩溃了。他的恐怖而又愚蠢的统治使民众产生的绝望情绪只能导致共产主义。

---

\* 指希特勒。——译注

## 十四、结束语

伊朗是一场反革命的牺牲品。这场反革命已经公开声明，它的目的是消除白色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西班牙宗教法庭消亡5个世纪后，伊朗又生活在残酷得多的本国托盖马达\*的恐怖之下。事实是，西班牙宗教法庭判决有罪的人，如果本人悔改，就可赦免。他们可以为自己提供证据，而伊朗的托盖马达则拒绝给予被告这种特权。

仇恨、报复和互相残杀决不会有助于伊斯兰事业，因为伊斯兰事业的宗旨是教育人们公正、仁慈、宽容和有高尚的道德。因此，这样假借“上帝的名义”发泄仇恨是对上帝和我们宗教的侮辱。我再说一遍，这样做是对伊斯兰教的极大犯罪，就象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对天主教犯下的罪行一样。

就我自己来说，我始终认为，真正的宗教信仰在于尊重和信奉宗教的精神和灵魂，而不是做宗派教条主义的俘虏。它不在于关闭男女混合学校，不在于妇女非要带面纱，或者是剥夺她们与丈夫离婚的权力而必须过妻妾同床的生活；也不在于使她们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才符合伊斯兰精神。恰好相反，真正的宗教信仰在于解放妇女，在于给她们一切可能的受教育机会，在于保障她们享有尽可能高的尊严，还在于使她们在各方面与男子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就是《古兰经》的真谛。

---

\* 托盖马达——1420-1498，西班牙多明我会修道士，西班牙宗教法庭，第一任庭长。——译注

你能想象一个真正的人能够对一个做了坏事的人进行鞭打、用石头砸，或者是砍掉他的一只手，借口是中世纪哈里发统治时期就规定给予这些处罚？用最纯洁的伊斯兰精神与邪恶斗争的方式就是进行教育、提倡仁慈和宽容。

伊朗的旗帜并不是从我们的朝代才有的。许多世纪以来，在这面旗帜下，无数伊朗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现在这面旗帜受到所谓的革命领导人的藐视。各朝国王曾领导波斯在文明世界最美好的历史时期经历了胜利和磨难，而现在他们却遭到库姆的权贵们的恶言诅咒。这样毁灭我们的民族特性，毁灭伊朗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是令人憎恶的。我们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及精神遗产是我们最好的有利条件，是使所有一切失而复得必不可少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就将失去一切。

今天，我们伟大的文明可能要被永远毁灭了。可是我相信，如同在重山峻岭下消失了的大河后来以巨大力量再次出现一样，波斯文化有人民的道德准则、创造性、思想、才智与努力的滋润，它必将再次复兴，人民的努力必将重新取得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胜利。

我们不要忘记，生活在圣人先知出生时代的伊朗人被先知称颂为“寻求真理”的人。我一直在诚心诚意地为我自己，为我的国家寻求真理。在我当政时期，伊朗人并不是追求错误的东西。

我的思想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国家，我的思想仍然在伊朗。我想念我的所有同胞，他们在我父亲和我自己统治时期使伊朗摆脱了黑暗和奴役，并把它改造成了1978年那样的伟大国家。今天，远离我们的祖国，我只能通过唯一的方法向他们表示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坚信，这是所有方法中最有力的一种方法——祈祷。



我为在贫困和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人们祈祷。

我为我们的青年，为受骗上当误入歧途的青年祈祷。

我为默默承受苦难的人们祈祷。

我为被追捕和受诽谤的人们祈祷。

我为受骗而至今仍未醒悟的人们祈祷。愿真主启迪他们，使他们从内心里永远消除仇恨。

啊！万能的真主，我一辈子信仰您。愿真主保佑我们的国家，拯救我们的人民。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